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2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新燕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8.75 印张 166 千字
199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ISBN 7-80023-457-6 / K · 446

定 价: 3.50 元

目 录

文 献

- 为建设一个有高度觉悟的
有高度纪律性的党而斗争…………… 叶剑英(1)

回 忆 录

- 党中央的召唤…………… 傅 钟(11)
中苏文化协会始末…………… 张 震(26)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 熊向晖(56)

专 题 资 料

- 1935 年到 1937 年初的国共关系 …… 李海文 汪新(97)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刘风梅(147)
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策动与夭折…………… 张培林(176)

天津郊区的土改运动

及对全国的影响..... 徐 行(187)

新中国反封锁、反禁运史实述略 林谷良(198)

人 物 介 绍

人民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 杨万青(215)

史 实 考 订

关于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行军

路线的考察

.....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肃北县委党史办公室(259)

小 资 料

中央苏区首次“八一”纪念活动..... 方世藻(269)

读 者 · 作 者 · 编 者

关于张庆孚《我的革命生涯》一文

的补正..... 钱听涛(275)

为建设一个有高度觉悟的、 有高度纪律性的党而斗争^①。

叶 剑 英

目前华南全区的城市、乡村、水上都正在进行反封建斗争，规模很大。在农村开展八字运动^②；在城市开展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和码头街道的反封建把头斗争；水上人民也进行着反封建斗争，要求民主，组织渔民，要求组织水上渔村；这运动大体上在今年或明年搞完。不久在全国便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建设我们的国防、经济、交通、农村、城市，向着工业化的前途迈进。工人领导农民，城市领导农村，首先就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物质力量。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这物质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党的任务是繁重的，时间是紧迫的，党员自己也感到不够，但历史是按其发展规律不断前进的，它不会因为我们还存有若干弱点而停留下来等待我们，因此我们必须跟着前进，必须把党搞好。

① 本文是作者 1951 年 7 月在中共华南区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总结报告的摘要。

② 八字运动的内容为“减租、退押、清匪、反霸”。

怎样把党建设好呢？这就是要全党全力把党建设成一个有高度觉悟、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党。我们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们党30年来艰苦奋斗与今日的成就，人民以及我们自己都不会忘记。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今后的路途还更长远，任务更繁重，若不进一步的建设好我们的党，就不能继续前进。我们党30年来有着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有着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能坚持真理、有组织、有纪律。没有这些，我们党就不可能度过历史上的几个严重时期。今天我们指出缺点，并不影响党的光荣、伟大与正确，问题是要更光荣、更伟大与更正确。因此，就必须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党。怎样才叫做好呢？要有高度的觉悟、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这样才有战斗力。这是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现在分开来讲：

第一、必须有高度的觉悟

党必须有高度的觉悟，这就是说，要有共产主义的觉悟。新民主主义是我党最低纲领，还有最高纲领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党要有共产主义的觉悟。所谓共产主义觉悟，不是讲讲共产党宣言就行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很多人看过，有的看过几遍，但单单这样还不行。提高党性是不断斗争，不断教育的过程，要一天天的积累，一天天进步，一步步提高，不能一步登天。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教育，在每一具体运动中、斗争中得到教育，那里有斗争，那里就有教育。我们要抓住运动中，斗争中暴露出来的优点和缺点，分别给以表扬和扬弃，我们的党和人民了解何者是正确的，何者是错误的，

这样来使我们逐步地提高觉悟，一步步地向前进，一分一寸地向前进。打通思想，只能解决思想问题，要解决实际问题，还必须使思想变成实践，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在实际斗争中考验思想是否正确。我们要教育，我们不忽视它的意义，但若不把教育联系实践，那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才能胜利地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使理论产生物质力量。这就是说，没有宣传教育，不将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是不行的。但必须联系实际。与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工人是集体工作、集体生活、使用机器，有组织、有纪律，有发展前途的阶级，。对他们尚且需要教育，对农民则更不用说了。因此，宣传工作者参加运动，不仅为了运动，也是为了教育，要在运动中采集素材，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再据此以进行教育，又再经过教育，把运动提高一步。这样不断地长期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将他们的觉悟一步步提高。同时在教育他们的过程中，也就改造了自己。中心工作与部门业务的矛盾，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今天农村中八字运动是主流，大家要参加八字运动，重视中心工作，将宣传、组织、纪律检查、财经等工作和土改工作结合起来，各人在总结中心工作之外，也总结一下自己部门的工作，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暴露问题，解决问题。

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决议中，有一条说宣传工作要有经常性。我以为只要宣传工作与运动相结合，就必然会有经常性，因为运动是经常的。一切东西都是运动的，而且是经常运动的，各个运动又是相互结合的，各方面配合，才能战胜

敌人，“单打一面”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要结合运动，学习也是一样，要与运动相结合，这样学习才能经常，才能学得好。避开当前工作，脱离当前运动，单纯谈学习是不行的。我们永远要工作，因之也永远要学习，学习而后才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列宁在工作中常常翻书和马克思商量，我们也应该学他，在工作中多翻阅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和他们商量，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学习。有些同志强调要学习非到马列学院去学习不可，否则就不能提高，这是不完全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学习。

如何提高觉悟？要学习，但学习必须与实践结合，同时要奋斗。少奇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讲得好，要提高思想觉悟，一定要进行思想斗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要打倒和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孤立、批评资产阶级思想，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宣传正确的东西，而且要批判不正确的东西。因此运动中必然产生思想斗争，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脱离实际，那就是主观主义的宣传。领导者必须经常具体地分析问题，并在全面分析以后，抓住重点，把力量布置到最重要的可能方面。这是毛主席经常教训我们的。前些时在斗争中发生了吊打现象，这些现象有些是由于干部出身不纯产生过“左”偏向，有些是由于领导上掌握不紧或无领导，农民乱搞出来的；有些则是反革命分子企图制造混乱。台山就发现了敌人利用我们的弱点，造成混乱来破坏。因此我们要全面而具体地分析，

如果干部搞错了，领导上要负责，要加强教育，并把责任担负起来；如属政策交待不清，领导上也应负责。但如果是敌人有计划的破坏，我们同志也很“勇敢地”担负起来，则不能教育群众，不能分清敌我。我们作战必须有敌情观念，有些同志敌我不分，把敌人当“死猪”，其实敌人并不是“死猪”，他们至死还要抵抗破坏。土改中一些干部自觉地或盲目地包庇地主，在对敌斗争中没有敌情观念，闭起眼睛来发号施令，对这些干部给予适当的处分是应该的。有些同志说，分局对下面的工作，批评多于鼓励，这也对。我们着重说缺点，可以减少以后的错误；当然发扬成绩，也是必要的。用正确的例子来说服不正确的是完全需要的。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有时多批评，有时多赞扬。

少奇同志指出宣传部是党宣传工作的指挥部，宣传工作要全党来做。这样就将宣传部门的重要性和宣传机构的系统说清楚了，我们将根据少奇同志指示，把我们的宣传体系建立起来，这样今后宣传工作一定可以开展。宣传部门要有干部才能工作，又必须结合运动才有“原料”。宣传部要指挥宣传，大家宣传，把宣传工作做好了就为运动扫清了道路。

少奇同志说，时事政策宣传是必要的，但还要宣传基本理论。目前我们虽因任务紧，不能全面全力开始理论学习，却要作准备，如宣传员，讲师等。准备得好，明年便可开始，如何准备干部？要在运动中发现人才；不经运动，暴露不出来，暴露出来，便要抓紧。两年来我们还是两手空空，只说干

部少、弱、难，这就由于我们不善于从运动中去发现和去抓的缘故。

第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

目前我们党内组织状况，思想状况严重不纯，但我们党的领导骨干是坚强的，是能坚持中央的政策。因此，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游击战争，并于最后配合大军解放华南。这样提法，我想是比较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否则将逼迫我们做另一个结论：“坏人会做出好事来”。

但由于我们任务将更繁重，而且我们的干部情况是少、弱、难，若不加整顿，就不能完成任务，因此就需要整党。而因为我们党员还少，所以一方面要整党，一方面还要建党。目的是一个，便是把党变成为更有觉悟、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壮大和能担负更繁重任务的党。我们任务所以繁重，就由于我们必须从落后的农业国进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机构是复杂的，经济构成有五个部分，没有党的巩固与壮大，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就难于完成。苏联经验告诉我们，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些资本主义还容许其存在，但又要经过竞争（谁胜谁）消灭他们，这便要好好注意。当然，既然在经济上容许他们存在，在社会思想上不能不容许其存在。但在我们党内，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则是非分明，不许存在的，必须做思想斗争。如何消除呢？不是在战场上，而且在思想上消除它。我们目前和资本主义作斗争是很复杂的，要限制与约束它，但又不能一下子把它限制死，这就很难搞。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若要建设好，而没有有高度觉

悟，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党，那是绝不可能的。同志们不要以为没有困难，困难很多。苏联经验告诉我们，教育农民走向集体化，就很要费一番大力。

同志们提得很好，整党分初整、深整两步骤。初整是分清敌我，深整是分清党群。现在我们党就有敌我不分，党群不分的情况，因此整党中要严格清洗一些坏分子，教育、改造、提高不够条件的党员，以巩固与提高党的组织。我们整党要严肃、谨慎：严肃到不使一个坏分子存在党内，谨慎到不清洗一个好党员到党外。我们要将这工作交给负责可靠的干部去做，并且要严格请示报告制度。

发展党也是重要的工作，今后必须在整党的基础上来发展党。发展党要着重发展产业工人，这很重要。过去我们在农村中，不可能这样做，今天已具有条件，因此今后我们一定要加强发展工人成份的党员，加强无产阶级骨干。去年人代会提出：“巩固城市，依托农村，面向海洋”，这样提法，有些同志想不通，为什么不依靠城市，却依托农村？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已经取得领导，因此，工人阶级自己必须要巩固城市，同时依托广大农村。不依靠农村，是不行的。毛主席说：“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的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这个团结农民与教育农民的问题十分重要。

为了巩固党的内部和巩固人民内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审查干部。在审干中我们要洗刷坏干部，保护好干部，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培养提拔女干部，团结改造

旧人员和技术干部。对于老干部只要他们在敌人面前是坚强的，我们就必须保护他，不能因为他有些坏习气而将他抛弃。当然，所谓保护干部并不是“姑息养奸”，而且要从思想上，政治上以至身体健康上来爱护他。至于非党干部也要加以保护，尤要注意发现好干部，这是审干中应加以注意的。安子文同志报告中提出今后干部要专业化，但今天，我们许多干部却是“万金油干部”，因此在审干中，必须同时注意适当调整干部，按专业化方向调整，使干部各尽其才，各得其所。

我们要整党，来巩固党的内部，也要调整干部和整顿基层，来巩固人民内部。许多人反映“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从基层不纯方面来说，这话多少有点道理。一年来我们公布了许多政策，有些贯彻不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基层不纯。虽然各地也完成了一些任务，有其可表扬之处，但由于基层不纯，政策交代下去以后，他们不按你所交代的去做，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做法去做；有些人表现得特别积极，很快地完成任务，原来是想借此以取得信任。结果产生了“胸前戴红花，后面打屁股”的怪现象。还有比此更坏的，就是敌人冒戴了红花。方方同志到粤中和珠江去，就了解到这些问题，如新会的“特等功臣”就有三分之一是敌人冒充的。所以基层一定要搞，否则政策就不能贯彻，必须认清，这是对敌斗争的问题。我们这里与华北等老区有基本上的区别，他们那里经过长期的斗争，坏分子已消灭殆尽，真正反革命分子钻进去比较少，有些错误是干部自己弄出来的。因

此,处理时就要多教育,思想上要严,组织上要宽。我们这儿是新区,有些地方甚至从未有干部下去过,敌人到处钻。也许我们对敌人估计过高,但基层不纯是事实。因此,这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对敌斗争的问题。我们常常敲警钟,提醒大家要注意敌情变化,敌人是不会束手待毙的,敌人不断地钻进来,杀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是原有的,有的是再进来的,难道这些情况我们不应加以估计吗?

钱部长(指钱瑛,时任监察部长——编者注)告诉我们在农村中整顿农会和整顿支部应有区别,这很对。过去老区“搬石头”的偏向不可重复。在多少年的对敌斗争中能坚持下来的支部就不会一个好的都没有,否则就不能存在。既然还有一两个好的,我们就不能一脚踢开。正如我们给小孩子洗澡,不能连小孩和污水一起都倒掉一样。所以我们要有所分别,要具体分析情况,弄清是新区还是老区?有若干好的或是没有?然后清洗坏分子,保护好干部。有些地方敌人组织了一套来对付我们,如粤中有一个地方,敌人建立了32种组织,对于这些组织我们当然要解散、处理,因为它们都是伪的。但我们要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作具体的分析,要有正确的估计,不要自己主观搞一套,一脚踢开的态度是不对的。

第三、必须有铁的纪律

我们要加强纪律,各地党委必须在工作中强调纪律,经常检查纪律,使运动与工作有纪律保证。而为了加强纪律,我们必须经常地发扬党内民主。毛主席告拆我们:脸要天天

洗，地要天天扫。有些地方没有这样做，让干部坏下去，一算帐就有一厚本，这就不好。纪检会一方面要积极教育，一方面要开展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民主是不行的，谁犯纪律就要受上下、内外的批评，就要受党的处罚。这样才能使错误得到及时的暴露与纠正，也可使犯纪律的减少些。

一个运动来了要有宣传员、组织员都是对的，纪检工作也可以结合这来做，运动中大的方针和具体工作都要有人负责。如何与中心工作结合呢？中心工作要压倒一切，同时也要有不可分割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一个面团，混而不分，也不是一大堆铜钱没有线去串，中心工作是一条线，结合串起各种工作。所以各部门要在共同的中心工作中合力下去做中心工作，同时注意结合做各部门的工作。中心工作完成后，再检查各部门的工作，并将经验总结出来，开办各种训练班，处理纪律问题等等。纪检工作可以经常检查，向分局纪检会报告。我们这样做工作便是一条锁链的结合，并且有中心。这样互相结合的做法才能集中全力打垮敌人，把运动搞起来，并在运动中做好各部门的工作，否则运动搞不起来，各部门的工作也是空的。

为完成今后任务，组织、宣传工作都要有计划地集中到一个焦点，就是要建设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这个党有高度的觉悟、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这样，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走到我们要达到的共产主义社会。

结论就是这样简单，供同志们参考。

党中央的召唤

傅 钟

1935年11月，翻过夹金山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含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右纵队由倪志亮同志率领，夺取天全县城后继续向荣经、汉源、泸定进攻；中纵队由王树声，李先念同志率领，于12月占领芦山县城后，乘胜向雅安、名山挺进，夺取了重镇百丈；左纵队由陈海松同志率领，一部防守懋功、达维，主力则扑向川西的大邑，邛崃。此时，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叩响“天府之国”的首府——成都的大门！但是随后，部队在百丈关与超过自己十几倍的敌人苦战七天七夜，受到了严重损失。从此，全军转入防御作战，面临敌人的重兵进攻。这时，芦山县城居于中心位置，成了红军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和临时建立的四川省委、省苏维埃的所在地。

芦山县城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史籍记载该城为三国时蜀国大将姜维设置，城当中建有纪念姜维的“姜公庙”，北街上还有座纪念姜维妹妹的“县主庙”。县衙门也在此街，省苏维埃各机关住在了里边。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驻于北街的“县主庙”，方面军政治部下属的工农剧社则住进了县城南街东岳庙里；保卫局、四川省委、芦山县委等单位，

也分住在西街的几处大院子里。红军招待所、红军医院、红三十军政治部等单位，住在东街上和东门外。县城改称芦阳市，整个城区由芦阳市委和市苏维埃管理，设立了工农医药社、工农完小，识字班以及面馆、盐店等等，一时之间，芦山县城成了个十分热闹的红军重镇。

我当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随朱德、刘伯承、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住在城外十多里的任家坝，但天天要到城里工作。驻芦山城里的四川省委，是四方面军在四川建立的最后一个省委。最早的一个，是1933年在通南巴建立的川陕省委。1935年春天长征以来，在阿坝改成了川康省委，仍由周纯全任省委书记。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擅自率军南下之后，在金川（绥靖）建立了大金省委，邵式平任省委书记。这个省委一直坚持工作到1936年7月。

在四川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天全、宝兴、芦山、雅安、右平、荥经等六个县委。各县委的工作人员，是由部队的地方工作部和政治机关派出来的。他们广泛宣传党的土地革命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发动劳动群众组织起工会，农会和妇女、青年，儿童等革命团体，建立区、县游击队，平分土地，推倒地主、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成立村、乡、区、县苏维埃，并在群众斗争的积极分子中进行发展党的工作。而这一切活动的中心所在是动员和组织群众送粮食，送弹药，抬担架，支援红军作战。南下红军正是依靠这个新苏区的万千群众，度过了严冬，坚守了阵地达四个来月。

领导地方工作，四方面军中最有经验的要数吴永康。他入党多年，曾在东京攻读经济学。川陕省委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靠他主持的，但这时他留在了大金省委。和我在这里的尚有四方面军地方工作部的李中权和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他们分别担任了天全、芦山县委书记。在省委和各县委里，更多的是原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九军团地方工作部长、政治部主任朱明，担任了省委组织部长；王全媛担任了省委妇女部长。还有刘少文、赖毅、方强、杨梅生、张令彬等同志，也在县城里常见面。我喜欢同他们在一起。我和陈赓都是1931年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的，他任十二师师长，我任师政委；1935年我俩在川西重逢时，他告诉我，他的爱人王根英、我的爱人刘筱圃，都被关在国民党监狱里，这是我离开上海后第一次听到家人的消息，所以对他的谈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谈到张国焘时，我说了张还是不搞党的建设。陈赓也基于他在两个方面军里都工作过的亲身经历评论说：四方面军的长处是战斗作风勇猛、顽强，很能打仗；一方面军除了打仗好，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比四方面军要强。彼此间说说长短，对于来自不同方面军经历不同的同志，本来是互相交流经验和学习的平常事，但到了毛儿盖，张国焘却在高级干部中散布流言，说中央对徐向前不信任，要撤换四方面军的所有干部，让陈赓来改造四方面军，等等。由于张国焘的挑拨离间，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之间的团结友爱关系遭到了破坏，以至由此开始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裂痕。通过在芦山和一方面军的

同志共同工作，我确实看到一方面军同志政治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四川省委，省苏维埃能在艰难困苦当中完成任务，和他们的优良作风与出色的工作分不开。

地方工作最繁重最艰难的任务是筹集粮食。因为这里的产粮区毕竟有限，供应这样多部队，短期内尚可维持，长期坚持就难于做到了。当然同康定、泸定地区相比，这里的条件算是好多了。部队能够有这样的立足点，也首先是经过同张国焘斗争才争取到的。张国焘素来行无定则。10月下旬，部队已开始执行向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进攻的《战役计划》，他却突然改变主意，要部队停止在夹金山以西，向人烟稀少的偏僻闭塞的康定、泸定地区发展。朱德、徐向前等看出了那里是个陷阱，有可能使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困死在西南一隅。于是，坚持执行原计划，挥师向东，翻过夹金山，向人烟稠密的川西平原进攻，为南下红军夺得了这块立足生存之地。但是待部队顽强拼杀，夺下了芦山县城后，张国焘又趾高气扬起来，当天即以自封的“中央”名义向陕北发电，宣称他的“进攻路线”的“正确”和“胜利”。党中央随即回电，不准他冒用“中央”名义，并对四方面军的作战方针作了指示，明令四方面军应坚决向天、芦、邛、大、雅地区发展，消灭刘湘、邓锡候、杨森的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缝隙，就照亮整个原野。”党中央的来电就是这样的真理之光，不管张国焘怎样封锁它，高级干部们还是由此看到了希望和方向。

大家开始更深地思考，更大胆地议论：北上是正确的，道路走得通！向天全、芦山方向打是对头的；以后行动和工作的中心是巩固部队。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徐向前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心和党中央是息息相通的。战役开始后，刘伯承针对川西南的地形特点，为部队打好隘路战斗提出了 19 条计策，尤其是让部队把随地可以找到的麦秸、稻草掺上牛粪点燃做烟幕，为晴天掩护部队运动减少伤亡，起了很大作用。战役进行中，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及时调整部署；朱德更是积极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同指战员一起总结战斗经验，表扬模范战例，指明失策之处，具体指导部队提高战斗水平。他们的活动有力地稳定了部队思想和士气。在四川省委工作的每个同志，正是以他们为榜样，把为巩固和壮大红军而苦熬苦干看作是自己崇高的职责。

这时，大家对于唯一能够和党中央保持联系的无线电台，都极为关心并大力给予支持。部队打下的国民党飞机，落在芦山与雅安之间的飞仙关一带，电台负责人王子刚立即赶去拆卸飞机上的通讯器材，用来装备自己。这时的电台，不仅有许多部用于作战侦察和指挥作战，还有几部是专收国内外新闻的，并且有了一架功率较大的收音机，徐向前也去听过。被张国焘关押在保卫局的廖承志，罗吉文、朱光和徐以新，由于朱总司令的关怀已有一定的自由，遂担负了抄收新闻的工作。他们都懂外语。水平最高的是廖承志，日、英、德、法语言都精通。所以油印的《红色战

场》杂志上，不仅刊登陕北“红色中华社”报道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的胜利消息，还刊登了他们编辑的评述。评述引用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话，如“陕北红军的发展有莫大势力”，“延安被共匪围困五日”，“毛泽东、彭德怀二部仍盘踞于瓦窑堡”等，从而有意透露出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行踪。对于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火车站和北平的丰台火车站等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封锁的消息，也都是廖承志他们从莫斯科、伯力广播的英语新闻中，东京广播的日语新闻中，西贡的法语，德语新闻中抄收翻译出来的。这些消息的传播，给部队进行政治时事教育，提供了生动材料，使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受到有力的冲击。张国焘得知我给干部讲了“一二·九”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和意义后，曾严加指责。但没有人被他吓住。凡是电台乃至白区报纸上的国内外新闻，在省委机关干部中仍是“不翼而飞”的。大家听得多了，眼界开阔了，对于北国山河遭受日军的蹂躏，北方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自然就产生强烈的共鸣，并进而想到自己的责任，更愿听从党中央的北上召唤。

首先引起深刻反响的，是党中央提出并阐明“抗日反蒋”方针的两个宣言。一个是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的宣言》，一个是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署名的《抗日救国宣言》。两个宣言时隔半个月，一个在直罗镇战役之前，一个在直罗

镇战役之后。许多同志在想：党中央已把“抗日”摆在了“反蒋”的前面，指出这是“全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还批驳了“先反蒋后抗日”口号的错误，真是一个重大变化；四方面军长征以来，沿途留下了许多书写的或石刻的抗日救国标语，如：“消灭阻止红军抗日的国民党军阀！”“红军决死消灭刘湘，为的是不亡四川，不愿咱们弟兄当亡国奴！”“蒋介石把中国出卖了一大半，要不当亡国奴，只有打蒋介石！”等等，现在，中央已将战略口号明确为“抗日反蒋”，显然是随着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形成和发展在战略方针上作出的重大调整。大家对此心领神会。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促使张国焘一改消极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同意了组织显示统战精神的“抗日救国军”，以在四川有广泛影响的王维舟任总指挥，一方面军的杨梅生任参谋长。总指挥部设在芦山的天主教堂，并很快在此举行了成立大会。到12月下旬，四川省委又召集各县委书记开会作出决定，把解决“抗日反蒋运动在赤区的组织问题”列为当前首要任务，并指明：各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协会、少先队等团体，均加入“人民抗日救国大同盟”，还立即用木版印刷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军民中广为散发。

11月底，国民党军队攻占了荣经、汉源，我军撤到天全一线防御，芦山县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但我们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对白军的宣传工作，仍然搞得十分活跃。各部宣传队和总部的鑿花队，在临大路的石壁上，旧石碑上，

凿刻了许多醒目的标语：

“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主张，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战斗！”

“中国快要亡了，中国人不打中国抗日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

“红军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反蒋协定、救国救民！”

“不愿当亡国奴的任何武装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

有的部队还组织战士找木板或竹片，在上面写上标语或红军的胜利消息，放入河道、溪流里，让它漂到下游（俗称“水电报”）给白军和白区群众看。

为了使党中央的精神深入人心，李伯钊等同志领导的剧团，编了许多歌曲到部队教唱；还编了新唱词、小曲在街头、阵地演出。有一首《抗日反蒋歌》老人、小孩都唱得下，歌词是这样的：“可恨日本狼野心，强占我东三省，东北被全占尽，匪首蒋贼真狠心，不打日本打红军，专门屠杀我穷人！中国人民快觉醒，一致团结来革命，努力向前进！抗日反蒋最迫切，驱逐日寇把蒋灭，独立我中国！”。流传广的还有《拿把小胡琴》的小曲，是向白军和白军家属作宣传的。情深意切，很感动人。曲中唱道：“白军弟兄们！你们的家中住下日本军，你们老小姐妹们，遭蹂躏，被欺侮，你们心何忍？工农都是一家人，你们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你们！我们再打下去，就是打的卖国仗，自己中

国人打中国人。当了亡国奴，被日本侵略军来欺侮，当牛做马不做人！弟兄们！大家快起来，联合一条心，一同去打日本兵”。后来从俘虏中得知，这些歌子他们在战场里听到过，有的人还会唱了。

朱总司令也非常重视对白军官兵的宣传工作。天、芦、名、雅战役一开始，他就以个人名义发布了《告川军将士书》。攻克芦山之后，一见到由毛主席和他联名附署、代表党中央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就亲手书写了《努力争取俘虏兵参加抗日反蒋战线》的指示，并随即下达给红四方面军。指示指出：“绥崇丹懋、天芦名雅两战役中，捉获了大批俘虏。刘文辉、杨森两部的特别不愿打仗，自动缴枪的不少，自愿加入红军的也有一大批。天芦战役有一部分就参加了战斗，很勇敢的去冲锋，还有缴得轻机关枪回来的”。为什么会这样？他在指示中分析说：这是因为“蒋介石的卖国投降”，“觉悟的士兵不愿再帮他打仗了”。根据这新的变化，他明确提出：凡俘虏兵自愿参加红军的，可“加入红军”；愿意回白军当兵的，可动员他做兵暴工作，“领导士兵参加红军或抗日救国军，或自己成立抗日军”；对愿意回家的，在提高他们的觉悟后，也可动员他们回去成立游击队或抗日义勇军；就是对那些以兵为职业的“营混子”，也要使他们懂得红军和苏维埃一切法令，才放他们出去。朱总司令的这个指示，对于瓦解敌军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他还亲临芦山东岳庙，向俘虏讲话，教育俘虏；并亲手给愿意回家的俘虏发放路费。

在芦山，虽然成立了“抗日救国军”，但张国焘却反对争取川军中的上层人士。朱德、刘伯承不顾张国焘的反对，利用他们在川军中的威望，积极主动地对川军将领开展工作，宣传党的统战方针。12月25日，朱德给川军将领写了著名的规劝信。指出：阿比西尼亚人为了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战斗已经两个月。而我们中国人拥有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四亿人口，国民党政府却始终不发一枪抵抗日本侵略者，反而不断地向日本割让领土。我们大家生于斯，长于斯，我们怎能奴隶成性，而根本不考虑挽救自己的国家以免毁灭呢？在后来重新北上的途中，刘伯承又给川军驻防川边的军长孙震写信，晓以救国救民的大义规劝孙震：“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朱德、刘伯承努力贯彻党中央统战方针，给广大干部、战士做了榜样。指战员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红军应该开到抗日前线去。1936年1月下旬，四方面军召开了任家坝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这一决议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红军实际，高瞻远瞩，反映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现实意义。

瓦窑堡会议决定的军事战略提出：红军总的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红军要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锋队和全国抗日军队的模范。具体部署是：陕北的一方面军向东、向北发展，准备（1936年）下半年在山西、察哈尔、绥远境内直接对日军作战；南方的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对于牵制并削弱国民党军队

阻拦红军对日作战“有很大战略上的作用。”决定还细述了战略防御时和战略进攻时的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及一般原则，使到会同志大开脑筋。党中央对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重大战略作用的肯定，显示出党中央统驭全局的政治远见，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并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大家对一方面军那种准备要直接对日作战的凛然正气和一往无前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创精神，十分钦佩和向往。因此会上形成的人心向北，人心思归党中央的局面，使张国焘的反党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他对党中央深怀敌意的嘲讽与挑拨离间，也丧失了市场。张国焘终于被迫承认川西不是久留之地。对党中央提出的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等重要方针，也不得不表示“原则同意”。

任家坝会议后第二天，是上海“一二八抗战”四周年，部队在举行纪念活动中进行抗日反蒋教育。张国焘到芦山县城召开各机关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更多的人从中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日益严重，平、津等城市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向广大农村发展，陕北红军有了一二十个县的根据地，二、六军团在黔西打垮了敌人好几个师，正在毕节、大定一带建立根据地等情况。在谈到目前党所采取的联合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抗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今后不再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要以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

族工商资本家这一策略路线时，张国焘却故意不说这条新的策略路线是瓦窑堡会议决定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去年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制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合乎逻辑与历史进程的重大发展，只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共产国际“根据中国情况的转移来给予我们适切的指示”。但是，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浩，在他拍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明明白白讲“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的路线”，并没有说中央的路线是共产国际制定的。任家坝会上，朱德同志劝他老实承认毛泽东、党中央有能力独立提出合乎国情的策略，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他企图用编造谎言的方法来把自己打扮成直通共产国际并力行国际路线的“正确代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其反党反中央的立场，继续进行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活动。

自1月中旬在芦山县大板桥村开过四川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各县苏维埃政府为完成扩大红军六个团的任务，用尽了力气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这里的人口有限。芦山县的户籍簿上缺两个不到3万人，最大的天全县也不过八九万人。所以除了开始自动参军和支前的，再难动员出青壮年了。任家坝会议后，四川省委为了调动群众的革命热忱，决定开展“重新分配土地的十日运动”，为此，编写了《对工农群众的五分钟讲话材料》发给各县，并和省苏维埃联合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改变原来“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采用“提取地主阶级土地来分给劳苦工农”的口号；对富农耕种的土地和财产，“一概不没收”。

分田后召开群众大会庆贺分田胜利，同时进行春耕生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这期间，总部已决定回师道孚一带休整部队，中心工作随即转到组织群众由飞仙关到夹金山下（最远至懋功新街子）的运粮任务。运粮的可以得到一定报酬，男女劳力都愿参加。他们从芦山出发，头天住灵关，二天歇宝兴，顶寒风，翻雪山，一站接一站，为部队北进备下粮秣。在总部机关纪念“二七罢工”13周年的会上，徐向前明确提出北进准备工作的具体要求之后，人们开始装米袋子、打草鞋、搞脚码子、缝制避寒的棕背心，有条不紊地做迎接新出征的准备。四川省委、省苏维埃也着手收拢工作，人员逐步归队回原建制。

徐向前等拟好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之后，总部机关转移到灵关。党在这里有坚实的基础。去年陈云就是由这里的席懋昭、陈梁两位党员护送到白区转赴上海的。我们到达后，接到了党中央从陕北发来的对南下红军和二、六军团下一步行动的电报。随即举行了灵关会议，讨论党中央提出的三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四方面军东渡岷江，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在川北会合后北进陕甘。这是上策。但实际情况是：东面刘湘、杨森的部队已压过来，四方面军东渡已不可能；大家估计，二、六军团由原区北渡也难实现。第二方案是：四方面军进入岷江、沱江之间即宜宾、泸州山区（朱德、刘伯承同志当年曾在那里作过战，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与二、六军团占领的毕、大地区靠近，毕、大以北还有支中央红军留下的川南游击队在活动，可以起

到相互配合的作用。但进军宜、泸的通路，以红军现有的兵力是难以打开的；而且宜、泸与毕大两区有长江相隔，江北的区域狭小，主力红军不可能在那里立足。第三方案是：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在云贵川边转战、发展，但面临的敌我态势是：薛岳的6个师（20多个团）正向北猛攻我军阵地；红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已撤出天全、拓阳，国民党五十三师李韞珩部正由康定向丹巴进攻；我军无论向西、向南都无法再过大渡河，同二、六军团在云贵川边会合也难实现。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只有按原拟的康、道、炉《战役计划》行动，在道、炉地区迎候二、六军团，两军会合后共同北上陕甘。这就是说，按照具体情况，坚持党中央提出的上策，贯彻要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协同行动，共同北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不走东路走西路的方针，完成党中央的战略计划。这次会议开得顺利，朱德、刘伯承同志发言最多，分析、说理十分透彻。张国焘迫于形势没有节外生枝，顺从了大家的意见。

灵关会议刚开过，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来了。朱德、徐向前立即到了他那里。程世才对前一段的领导很有意见，大声说：“这样拖来拖去，还要不要部队？！”朱德同志知道他的气是冲张国焘来的，温和地说：“你们打得顽强，打得好！告诉你，现在有了喜事，要北上了！张国焘也要北上了。”程世才讥讽说：“北上不是‘机会主义’吗？早点当‘机会主义’部队不至于伤亡这么大，减员这么多。”徐向前对

他作解释后，程世才才慢慢消了火气。朱德总司令接着告诉他：“二、六军团也要北来了，双喜临门！”随后他又接着说明了北上的部署：“由八十九师作先头部队，刘伯承任先遣司令，徐向前任总指挥。你们要组织好，给全军打开通路！”

2月下旬，南下红军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浩浩荡荡的队伍迎着寒风，象重新回到大海的蛟龙，向着来时的道孚、炉霍前进。到夹金山下，传来了党中央的电讯：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组成的红军抗日光锋军，打响了“东征战役”，渡过黄河的部队已在山西的中阳县、孝义县一线站住了脚跟。人们听到这胜利消息，倍感快慰，心头的乌云象是一扫而光，脚步也觉得轻快了好多。但畏敌如虎的张国焘却惶惶然向陕北发电，要东征的红军停下来立刻回返河西，不要“冒险”。

北进的红四方面军和东征的红军虽然相隔千万里，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旗帜下，无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还是国民党的千军万马，都阻挡不住红四方面军向着北方抗日前线前进的步伐。

中苏文化协会始末

张 震

中苏文化协会(总会)1935年10月25日成立于南京。抗日战争时期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复员南京,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自行结束,历时13年有余。中苏文化协会长期从事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友谊,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宣传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进步的工作,是国民党统治区一个有影响的进步团体。

一、协会成立初期

1932年12月,中苏两国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互派了大使。

1934年夏,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应苏联邀请,赴莫斯科举行画展,画展结束,徐将画作赠苏方。苏方回赠给徐苏联新旧两派画家的代表作品,并表示希望以此为起点,进行中苏文化合作。同年7月,苏联名画运到上海,再由苏联驻华大使馆转交。为此,徐悲鸿宴请苏联首任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并邀请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名流朱家骅、王世杰、罗家伦、徐谟、张道藩、张西曼等作陪,席间又交谈了中苏两国知识界的合作问题。1935年初,苏联对外文化

协会邀请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访问苏联。苏联文化界并组成接待委员会热情接待,和安排梅兰芳在苏联访问演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

在此背景下,1935年夏,张西曼、王陆一、雷震、张炯等,为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邦交,发起筹组中苏文化协会,召开了发起人会议,推定张西曼、徐悲鸿、张冲、西门宗华、于国桢、段诗国,骆美奂、何汉文,以及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沙拉托夫采夫等九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并于7月间开了几次筹备会议。与此同时,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等也在酝酿筹建中苏文化协会,遇到了阻力,遂由王昆仑、许宝驹找了孙科,请孙科出面组建。孙科同意后,于1935年10月25日出面召开成立大会,正式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中苏文化协会章程,以研究和宣扬中苏文化,促进中苏两国人民之友谊为宗旨。规定凡赞成本会宗旨者,经本会会员三人介绍,提请理事会通过,得为本会会员。成立大会适选出孙科为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颜惠庆、苏联科学院院长卡尔品斯基为名誉会长,梁寒操、王陆一、傅秉常、徐悲鸿、徐恩曾、张西曼、张冲、于国桢、沙拉托夫采夫、王文山、何汉文、周明、骆美奂、苑明、吴经熊等15人为理事;理事会推定张西曼为常务理事。会章规定,协会的经费,除会员缴纳的会费及其他捐助外,接受中苏两国政府及两国文化机关团体之补助,由理事会推定负责人

经管，这个章程是参照先于它成立的中英、中德文化协会的章程制定的，故其内容除国别外，几乎与其他对外文化协会的章程相同。

成立大会后，孙科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希望得到赞助。苏方迅即复电祝贺，表示愿意赠送苏联报刊和文艺作品，并希望两国文化界密切合作，共同发扬和巩固中苏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

1936年3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宣告成立。黎照寰为会长，潘公展、李公朴、褚民谊、王晓籁、杜月笙、张寿镛等11人为理事，黄炎培、周剑云、陆翰臣、陈鹤琴等6人为候补理事。

1937年3月28日，中苏文化协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年会）。

1938年12月25日在重庆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讨论通过了新的会章。选举孙科为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为副会长，梁寒操、傅秉常、张西曼、张冲、徐悲鸿、徐恩曾、吴尚鹰、段诗国、郭瓦略夫（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邓文仪、郑彦棻、吕超、田汉、吴玉章、陈豹隐、王昆仑、胡愈之、梅汝璈、陈希豪、楼桐荪、卜道明、沈志远等35人为理事，邓公玄、刘舫西、李孟达、袁孟超、王平陵、盛成、曹树铭、姚蓬子、戈宝权、沈兹九、曹孟君、陈铭德、胡风、曹靖华等19人为候补理事。中苏文化协会第一届理事中，主要是国民党党政机关的代表人物，包括CC分子，个别是文化界人士。第二届理事大都仍是国民党党政机关

的人员和 CC 分子，但增加了一些国民党左派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以及少数公开活动的中共党员。

二、中国全面抗战、中苏邦交增进、中苏文化协会得到发展

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苏联政府即于 1937 年 8 月 21 日与中国政府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立即给予中国道义上、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和空军志愿队援助中国政府抗战。苏联政府还依据平等互利原则，于 1939 年 6 月 19 日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商约，打破了日帝对中国的封锁。正如 1939 年 9 月，苏联驻华大使、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潘友新在其呈递国书时的致词中所指出：“中国人民及其政府深悉，在其为民族自由和独立的英勇斗争中，苏联方面所给予的援助，不是口惠而是事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之际，苏联政府又根据苏美英三国雅尔塔会议决定和波茨坦公告，于 1945 年 8 月 9 日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一举歼灭了日寇精锐关东军。接着中苏两国政府又于 8 月 14 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时期，中苏两国的邦交，逐步增进。总的说来，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中苏两国邦交的逐步增进，为中苏文化协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苏文化协会适应这种局势的发展，迅速发展了组织，逐步充实了活动内容，先后在长沙（后沅陵）、重庆、成都、广州（后曲江）、桂林、贵阳、昆明、西安、迪化（乌鲁木齐），以及延安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分会，大量发

展会员，编辑出版书刊，宣传介绍苏联各方面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促进国内团结抗战，增进中苏友谊。1937年3月中苏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时，有会员485人。1939年12月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时，会员增至808人。1940年5月第三次会员大会时又增至1030人。到抗战后期，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员发展到了5万余人。

随着中苏文化交流的开展和中苏友谊的增进，中苏文化协会总会和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西安、兰州等地的分会，都创办了俄文专修学校或俄文学习班，积极推进学习俄文。各地报名参加学习俄文的人极为踊跃，在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习俄文的热潮。

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1938和1939年两次奉命出访苏联，受到苏联朝野热情欢迎，对促进中苏邦交和两国贸易的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在协会成立初期，由于受当时政治局势和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中苏两国关系冷淡。更由于中苏文化协会各机构掌握在国民党的CC分子手里，进行的工作和活动极为有限。孙科在1938年12月中苏文化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不得不承认，“回顾过去本会成立之后的情况，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重大工作；对于一切计划，不能圆满充分执行；在中苏文化沟通和增进中苏关系上，还需要更加努力；希望本会现在的工作比过去所做到的效力要更伟大，希望本会

同志共同努力，使本会的任务能够逐渐完成”。^①

1940年5月，中苏文化协会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讨论了协会一年多来的工作报告。这次大会没有讨论和制订新的会章，也没有改选理事，会后只增补了何应钦等个别名誉会长和常务理事。孙科推举了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担任常务理事，加强了他在协会的地位。此后，常务理事有：王昆仑、许宝驹、周一志、钟天心、梁寒操、张冲、卜道明、西门宗华、张西曼、徐悲鸿、曹靖华、葛一虹等。

1940年5月，中苏文协副会长邵力子奉命出任驻苏大使。为了适应中苏关系增进的形势和加强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的需要，孙科指定王昆仑以常务理事名义，代表他主持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务。王昆仑乘此机会，对中苏文协的工作机构进行改组，增设了新的工作部门，重要会务由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各工作部门，可依据协会的宗旨，自行开展工作。中苏文化协会从此形成了如下一套工作机构和领导班子，使协会的工作得到了发展。

秘书处：主任秘书（相当于秘书长）原由CC分子洪钊担任。1940年第三次年会后由屈武担任。1945年6月由刘仲容继任。其任务是负责主办协会主体性的活动，及处理协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

《中苏文化》杂志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昆仑、副主任委员侯外庐。编辑出版会刊《中苏文化》。下设编辑委员会，

^① 见1939年1月《抗战特刊》第3卷第4期。

主编候外庐，副主编翦伯赞。

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副主任委员阳翰笙、葛一虹。研究、编辑、出版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图书资料；举办文化讲座，介绍苏联各方面的现实情况。

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西门宗华，副主任委员曹靖华。编译出版苏联文学名著、苏联社会科学和文艺丛书。

妇女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德全、副主任委员曹孟君、谭惕吾、傅学文。负责推动中苏妇女与儿童之间友好活动的开展。妇委会还附设儿童之家，开展中苏儿童友好娱乐活动。

俄文专修学校：校长张冲。1941年张冲病故后，由卜道明继任。主办俄文专修学校，开展学习俄文的活动。

财务委员：阎宝航、王炳南。监督审查协会的经费收支。

协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和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具有统一战线的特点和相当的代表性，有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有中共和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由于他们都是兼职的，协会各工作部门又分别配备了秘书、助理秘书和干事、编辑、助理编辑以及研究工作等专职人员，开展日常业务工作。

为了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开展中苏妇女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根据邓颖超的倡议，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于1940年成立。除主任、副主任外委员还有：邓颖超、张晓梅、史良、劳君展、刘清扬、胡子婴、刘王立明、黄静

汶、陆晶清、邓季惺、胡绣枫、郑瑛、倪斐君、张启凡、陆慧年、彭子岗、谭得先、于立群、浦熙修等。她们都是重庆妇女界的知名人士。该会实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团结各界妇女开展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9年改组后的《中苏文化》杂志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王昆仑，副主任委员侯外庐未变。委员有：郭沫若、梁寒操、何汉文、陈希豪、邓初民、翦伯赞、沈志远、戈宝权、洪瑞钊、曹靖华、西门宗华、郑伯奇、程元斟、狄超白、韩幽桐、林苑文、李陶甄、赵志昂、葛一虹、叶兆南、潘天觉等。他们都是知名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工作者。

中苏文化协会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和活动，其内容不仅仅限于一般性的中苏文化交流，往往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妇女儿童等各个方面，并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相联系。工作和活动的方式，则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除必须用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单独举行外，常常联合或配合有关社会文化团体共同举办，邀请各党派代表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并尽量吸收群众参加，因而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中苏文化协会开展的活动，主要有这样几种形式：

1、**集会活动**：每逢十月革命节、苏联红军节和中苏友好节日，都举行庆祝会或纪念会，邀请国民党党政要员、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由于集会隆重，有重要人士演讲，影响广泛。1944年举行的十月革命27周年紀念会，到会者达2000人，陪都青年馆礼堂

正厅两旁和后面的走廊都挤满了与会者。于右任和郭沫若相继发表演讲后，与会者情绪高昂，又纷纷鼓掌欢迎宋庆龄讲话，她因当天嗓子不爽而未能发言。会后演出了文艺节目。

遇有涉及苏联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中苏文化协会都举行座谈会，邀请各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听取和交换意见，以便进行宣传解释，增进中苏友谊。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重庆舆论界对此极为关注，各阶层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面对世界局势风云突变，对苏舆论十分混乱的时刻，中苏文化协会邀请各党派代表，各界知名人士座谈，听取对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会不会参战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中苏文化》据此拟于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日出特刊，集中进行宣传解释，但感到难度很大，力不从心，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权威意见才好，特请毛主席为《中苏文化》写文章澄清舆论，引导人们有正确的看法。据此，周恩来同志去电延安请示党中央，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很快得到延安回电说，迅即告知中苏文化协会，毛主席文章已写好，即用电报发稿到重庆，嘱《中苏文化》按原定计划，在十月革命节发表。毛主席的这篇文章题为《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开头就指明：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接着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逐条解答当时国内舆论界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也给兴风作浪、挑拨中苏感情的反苏逆流以有力的打击，起到了维护中苏团结的作用，消除了对苏持怀疑态度人们的疑虑。毛主席特为国统区的一个文化团体的刊物撰写文章，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中苏文化协会这个宣传阵地的关心和有力支持。

1944年10月1日，孙科、邵力子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会，邀请苏联在华友人和重庆各党派各界人士参加，座谈如何增进中苏邦交、沟通中苏文化交流。到会的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莫德惠、褚辅臣、冷御秋、许德珩、黄炎培、江一平、荣照、胡秋原、陈博生、中共参政员林祖涵（伯渠）、董必武；有苏联大使馆、商务处、武官处、新闻处、塔斯社的负责人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还有中国各宣传部门和新闻界的梁寒操、王芸生、萧同兹、陈铭德、潘梓年、周钦岳、刘尊祺，以及中苏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和各部门的负责人王昆仑、张西曼、李德全、屈武、卜道明、曹靖华、曹孟君和孙科夫人等。与会者积极发言，一致赞同国民参政会组织访苏代表团以加强中苏邦交的提案。大家认为，中苏关系如果不如英苏和美苏那样发展得好，那就是我们没有尽到努力，而中苏关系的加强是我国获得胜利与和平的关键。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也表示，希望今后两国有更多的来往，林祖涵则在发言中指出，中苏邦交在过去是有许多不友好的地方，现在应开始走上新阶段，延安中苏文化协会分会会长吴玉章托我带信给重庆总会，希望取得工作上的联系和协助。并指出，加强中苏邦交和文

化交流，必须从具体事情上着手。最后是孙科在会议结束时发言，他说：“中、英、美和苏联的关系，好象赛马一样，开始是中苏这匹马走在前面，后来落后了。现在我们要打马加鞭，赶上英美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至少应该和英美齐头并进。”

1945年9月2日，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的到来，中苏文化协会特别举行庆祝欢迎酒会。毛主席正值参加国共谈判来渝，也应邀参加，更使这一酒会盛况空前。酒会请柬发出后，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徐冰同志给协会秘书处打电话，希望增发请柬，这个情况过去从未有过。出席酒会的有会长孙科、副会长陈立夫、邵力子，名誉会长冯玉祥；有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和武官罗申等苏联友人；有宋庆龄、翁文灏、覃理鸣、张治中、陈诚、朱家骅、吴铁城、王世杰、鹿钟麟、贺耀祖、梁寒操等很多国民党要员；有中共和各党派的领导人以及社会著名人士沈钧儒、郭沫若、马寅初、谭平山、左舜生、王芸生等；还有中苏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及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昆仑、李德全、许宝驹、刘仲容、阳翰笙、阎宝航、王炳南、曹孟君、谭惕吾、曹靖华、傅学文等近400位来宾应邀出席。协会二楼几个会议室和办公室联成的会场都挤满了来宾。

当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的陪同下应邀前来参加时，刚一进会场，来宾们便纷纷鼓掌热烈欢迎，争相上前同毛主席握手，举杯向他敬酒。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也在会场巡历一周，举杯一一应酬干杯。渐渐的毛主席面色有点红润了，周恩来同志便代他饮下一杯杯盛情难却的酒。毛主席不断地同来宾们友好交谈，表明中共主张民主、进步，团结一致、和平建国的诚意和决心。一些久别重逢的旧友和初次见面的新朋，以及赞同毛主席主张的人，心中有多少话想要向他倾吐，但此时此刻，一言难尽。有的人就握着毛主席的手久久不放，冯玉祥、谭平山、覃理鸣几人对毛主席说，让我们为孙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能够实现干杯吧！别的话一时说不出，已激动得热泪盈眶了。毛主席一时成了会场的中心，庆祝酒会实际上形成了欢迎毛主席的盛会，陈立夫、陈诚等国民党高官显宦则被冷落在一旁，人心向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佇立在协会外面马路两旁的群众，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内有重要集会，有毛主席参加，人们便越聚越多，争相以一睹中国共产党主席的丰采为快。晚7时后，毛主席告辞离开会场，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等同志紧紧陪同毛主席步出协会，到马路边上车。等候已久的群众中突然出现了欢腾的热烈场面，一片鼓掌声，欢呼声：“毛主席，欢迎你！”“毛主席你好！”人群把毛主席的汽车围得一时不能开走，维持交通的警察纷纷赶来劝导群众让路，直等到毛主席的汽车慢慢开走后群众才逐渐散去。

毛主席在国统区出席一个文化团体的庆祝酒会，重庆的群众自发在街头形成热烈欢迎欢送毛主席的场面，是重

庆一次空前的盛况。周恩来同志当即嘱咐夏衍同志撰写了毛主席参加中苏文化协会的酒会，同各方面人士进行历史性会见的特稿，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这一空前盛况，却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的震动和忌恨。据刘仲容事后说，蒋把邵力子叫去申斥了一顿，以泄私愤。

为了密切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和会员群众，共同努力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友谊，中苏文化协会经常举办各种联谊会、文娱晚会、会员同乐会、苏联电影放映会等活动。1940年12月举办的一次中苏文化界人士联谊会，生动活泼，热情友好。参加的有苏联大使馆和苏联驻华各单位的友人。中国方面有郭沫若、沈钧儒、茅盾、陈铭枢、章乃器、沙千里、洪深、阳翰笙、侯外庐、应云卫、艾青、沙汀、宋之的、马彦祥、胡风、赵望云、贺绿汀、姚蓬子、凌鹤、舒秀文、徐迟、陈烟桥、罗荪，还有潘梓年、胡绳、许涤新、吴克坚等，共有100多人。当时在渝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能来的几乎都来参加了。联谊会由郭沫若主持，他特地写了一首诗，亲自在会上朗诵，作为欢迎词。苏联友人和茅盾分别讲话后，与会者纷纷即席表演节目助兴。田汉、王昆仑、洪深唱京剧，老舍唱昆曲、沙梅唱川剧，由著名琴师操琴伴奏。盛加伦、黎莉莉、王金陵等唱歌曲，会场始终充满友好、活泼、欢快的气氛。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也抓紧时间拍下不少会上生动欢乐的镜头。

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也常常举行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中苏妇女和儿童联谊会，邀请苏联在华妇女儿童同

中国妇女、儿童联欢，共同表演节目。1943年11月举行的一次中苏妇女联谊会，还邀请了著名的宋氏三姊妹孙（宋庆龄）、蒋（宋美龄）、孔（宋霭龄）三位夫人参加。

纪念中苏文化名人也是中苏文化协会沟通中苏文化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为此，中苏文化协会常常单独或联合有关文化团体举行苏联文化名人高尔基、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柯夫斯基等和中国的鲁迅、屈原等文化名人纪念会，《中苏文化》同时出纪念专刊或特辑纪念。

每逢中苏两国新任大使履新，如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来华，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傅秉常赴苏，以及中国名人郭沫若、丁西林应邀访苏，参加苏联科学院建院纪念活动，中苏文化协会便举行欢迎、欢送会。

2、举办展览会：每逢苏联重大节日或纪念日，中苏文化协会即举办有关的展览会，介绍苏联各方面的情况和建设成就。每次展出，观众非常踊跃，反映热烈，人数往往几万，甚至一二十万。有的展后还将图片或展品分发各地分会展出，影响非常广泛。1940年3月举办的《苏联红军》展览，出席开幕式参观的除会长孙科、邵力子外，有苏联驻华大使等苏联友人，有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冯玉祥、李济深、张继、刘峙、吴铁城等，还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以及华岗、吴克坚、许涤新、钱俊瑞、陈波儿等文化界人士。1940年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举办的一次“中苏儿童作品展览”，巧逢孙、蒋、孔三夫人由港来渝，行装甫卸，即来参观。1943年举办的“苏联

建国 25 周年展览，在重庆展出仅半个月，观众即达 15 万余人。中苏文化协会也经常展出中国的绘画、版画、漫画、木刻和中国近代画家精品，以及延安生活艺术等作品。同时，中苏文化协会也组织中国艺术品、中国版画、木刻等展品赠送苏方展出。1940 年冬送去苏联展出的中国艺术展览，展期延长到次年春季，博得苏联文艺界对中国新旧艺术的欢迎和好评。

中苏文化协会还组织中苏两国相互广播名人讲演和两国有代表性的音乐节目。1940 年春，在孙科主持的第一次对苏广播中，即有马思聪指挥的乐队演播的节目。

3、编辑、翻译、出版关于苏联和中苏友好的书刊：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刊《中苏文化》，以“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邦交”为宗旨，经常载文宣传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报导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既邀请毛泽东、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写文章，也请国民党元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撰文，宣传进步思想，宣传中苏友好和国内团结，抗战、民主等，成为国统区一个进步的宣传阵地，起到了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互相呼应配合的特殊宣传作用，以致国民党右派视《中苏文化》为“赤化”，攻击它宣传苏联太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进行抗战有赖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中苏文化协会出面的领导人是国民党的官方要员，不能随便查封中苏文化协会和禁止其会刊的出版，因此，《中苏文化》得以利用中苏文化协会的存在这个特殊条件，公开合法地进行进步宣传。它从 1936 年 5 月 15 日出

第1卷第1期到1949年5月1日的第20卷第5期止（其间自1938年第3卷起，曾改出一年半月刊《抗战特刊》），从未中断过。与此同时，还在中苏重大节日、以及中苏文化名人纪念日时，另外编辑出版特刊、特辑或专号，集中宣传报道，表示庆祝和纪念。

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和编译委员会，还分别编译出版“苏联社会科学丛书”，“苏联研究全书”、“苏联建设丛书”“苏联文艺丛书”和各种研究资料，以及若干苏联文学名著；并定期举办“苏联文化讲座”，举办苏联问题报告会等，请有关专家和权威人士莅会讲演或作报告，以介绍苏联各方面的状况。

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除举办中苏妇女儿童联欢会等友好活动外，还创办了“儿童之家”；每天开放，接待儿童来协会娱乐、阅读中苏儿童读物，并举办故事会等儿童课外活动。

中苏文化协会还利用它特有的条件，在协会内设立了售书亭和图书阅览室，供读者前来购买和阅读苏联出版的俄文、中文、英文图书报刊和中苏文协编译出版的书刊。当时中国读者要往苏联外贸机构驻渝办事处购买苏联书刊很不方便，易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中苏文协以沟通中苏文化为由，设立了售书亭，廉价代售苏联书刊，这就大大方便了读者。

4、为各界、各社会进步团体提供活动场所：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

会及其举行座谈会、中国文艺协会总会中国抗敌协会全国戏剧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和时局报告会、重庆文化界在皖南事变后举行的有周恩来参加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集会，以及陪都各界 23 团体为较场口血案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和陪都青年团体重庆各报社记者为较场口血案举行的表示愤怒声讨的座谈会等等活动，都是假中苏文化协会会址举行的。此外，还有一些未被报刊报道的集会活动。

中苏文化协会还附设有“文化之家”（文化沙龙、文化餐厅），为各界人士到中苏文协参加活动提供聚会、休息、就餐等方便。协会还为一些进步团体或个人提供工作和活动场所。张西曼主编的《民主与科学》杂志，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其编辑部均设在中苏文化协会。《现代妇女》是根据邓颖超同志倡议于 1942 年创办的。但为了刊物工作方便，没有用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的名义出版发行。后该刊迁到上海后又与中共上海工委建立了经常联系。进步青年团体中国民主实践社也经常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进行秘密活动，如召开会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呼吁“大家起来制止内战”，以及为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四·八遇难烈士召开追悼会作准备工作等。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的一些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在协会进行某些政治活动，如候外庐等 20 余人联名公开致电中共代表周恩来对四·八烈士表示深切悼念；全国内战爆发后，为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反动派

指使的暴徒殴打，他们又联名发表慰问电，表示义愤，愿作后援。

中苏文化协会地处重庆市中心的中山一路黄家垭口，交通便利，而且座落在一个巷子里，是一幢西式二层楼房，加上附设的“儿童之家”、“文化之家”、售书亭等一些临时性的建筑，形成一个独立的院落，闹中有静。前来协会的群众，有的参加在协会举办的各种集会活动，有的参观展览，有的购买或阅读苏联和中苏文协出版的书刊，有的则是到“文化之家”休息，吃俄式西餐。因而协会每天门庭若市，非常热闹，进进出出的人，终日络绎不绝，数以千百计，成为抗战时期重庆一个进步的宣传阵地和政治文化活动中心。

三、在斗争中前进

处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中苏文化协会，外部受到国共两党、中苏两国关系、国际政治局势等因素的影响，有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扰和破坏；内部又存在左和右、进步与反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领导协会的进步力量，同协会的CC派势力进行了复杂的斗争，帮助和推动中苏文化协会不断前进。

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亲苏的。他们主张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政府抗战，故希望中苏文化协会多做点勾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邦交的工作。抗战时期，孙科、邵力子常在协会的重要集会上讲话，并在会刊《中苏文化》上发表，扩大其主张

的政治影响。另一副会长陈立夫，当然也关注中苏文化协会的动向，但他未出面直接主持协会的会务，因为协会内已有他的代理人。协会成立初期，理事会、工作机构秘书处和会刊《中苏文化》即被他的CC分子所掌握，表面上也进行了一点沟通中苏文化的有限工作，实际上起着阻碍和遏制的作用。在协会的工作和人事安排上孙科与陈立夫CC派之间一向存在矛盾。孙科为了改变协会领导人员的状况，推举王昆仑、许宝驹、钟天心、周一志（孙科太子派）担任了协会的常务理事，加强了他在协会的地位。1940年邵力子出任驻苏大使时，孙科又指定王昆仑以常务理事的名义，代表他本人主持协会的会务。王昆仑于1939年对会刊《中苏文化》进行了改组。1940年夏“小民革”成立时，经核心成员研究后，汇报周恩来征得同意，配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王昆仑又改组了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机构，增设了研究委员会，还根据邓颖超的倡议成立了妇女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为了在国统区斗争的需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需要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这个合法的阵地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提高国统区人民对苏联的认识，抵制国民党的反苏宣传，增进中苏友谊，宣传团结、抗战和民主。

1940年夏，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直接领导下，由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酝酿成立了“中国民族革命同盟”，一年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它与1948年成立的简称为“民革”的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是两个组织，所以又称“小民革”）。“小民革”是国统区中共领导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着重在国民党内部秘密进行革命斗争。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国民党的上层左派，各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和社会知名人士，还有不少是中共秘密党员。领导核心成员有王炳南（代表中共，负责与周恩来联络）、王昆仑、许宝驹、屈武、阎宝航、曹孟君、刘仲容、阳翰笙、谭惕吾、侯外庐等。周恩来指示王昆仑做孙科的工作，屈武做于右任的工作，刘仲容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赖亚力做冯玉祥的工作，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亲自领导民革的核心成员，掌握中苏文化协会，推进中苏友好工作。1940年中苏文化协会改组时，为更好地利用中苏文协开展对苏友好工作，“小民革”的核心成员们商定，尽量排除协会的CC分子，与郭沫若、李德全等一起全部掌握中苏文化协会各工作部门的领导职务，从而掌握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的实际领导。

秘书处原主任秘书（相当于秘书长）洪钊，是CC分子，与王昆仑等进步力量对立，觊觎协会的领导权，干涉协会各部门的活动，因而发生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他在协会的第三次会员大会上，又出面攻击《中苏文化》“赤化”，宣传苏联“太多”，宣传中国“太少”（指宣传国民党的理论、政策），对此，协会进步力量予以反击，导致了一场争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对洪钊的言论也表示不满。经孙科出面圆场平息事态后不久，洪钊被孙科调离中苏文化协会。王昆仑便向孙科提议由屈武继任协会主任秘书。屈武是中

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于右任的女婿，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留苏时与蒋经国是同学关系，又熟悉苏联情况，CC方面不好抵制，就这样经孙科和冯玉祥推举，屈武继任为协会主任秘书。

秘书处是处理协会全会性活动和日常会务的工作单位，因而协会内两种力量都想要加以掌握，成了协会内部矛盾斗争的焦点。主任秘书是兼职的，故配备专职秘书作为助理。原秘书孙慕坚是洪钊的亲信，在协会不起好作用，被迫随同洪钊离去后，CC方面不甘罢休，又搞来了一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的少将俄文翻译钱乃治当专职秘书。名为协助，实为牵制屈武。钱乃治何许人也？他在顾问事务处与另一个少将俄文翻译党必刚（也是中苏文协的理事）是两个特殊人物。顾问处知其情的人，在他俩姓名前各加了一个字，便成了一付对联，叫做“务党必刚、有钱乃治”，暗中流传，把他俩的政治本质和活动形容得淋漓尽致，嘲讽得入骨三分。后来经屈武活动钱乃治又被调回了顾问事务处，乃由王昆仑、曹孟君与中共南方局联系，南方局推荐张震到秘书处接替钱乃治，蒋燕到妇女委员会工作。1945年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迫撤销时，党又推荐了该会的几位同志到中苏文协工作。先锡嘉和一位姓雷的同志到协会秘书处，霍应人、朱海观、李平到研究委员会工作，加强了协会的进步力量，但好景不常，斗争不止。1945年初夏，蒋介石忽然召见屈武，把他调去西安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当时，陕西省谈不上有什么建设

任务，明明是要屈武离开当时的政治中心重庆和中苏文化协会，不让他进行政治活动。屈武便托蒋经国转圜免调。蒋经国才告知屈武，有人向蒋介石告了密，说屈武参加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本有加害之意。并说，蒋调你去西安是命令，不好改变。劝屈武还是服从命令，去西安为好。屈武遂不得不于1945年6月离开重庆去西安。屈武到西安后，受到当地警特部门的暗中监视，经过种种努力，后来才转移到张治中掌握的新疆，担任了迪化市市长。

中苏文化协会主任秘书这一职位一空，CC方面当然要抢占。有鉴于此，“小民革”立即研究对策，汇报周恩来同意后，提名刘仲容继任。刘仲容当时在白崇禧处任高级参议，算是白的“亲信”。“民革”核心成员估计CC方面要考虑到它与桂系的关系，不致出来抵制。白崇禧则想要分得一点苏联给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物资，愿意刘仲容到中苏文化协会，以便与苏联拉关系。因此，白崇禧同意了对刘仲容的安排。于是由王昆仑、屈武联名向孙科推荐，得到同意，刘仲容便继任了主任秘书一职，度过了这次人事风波。

中苏文化协会的处境，与国共两党、中苏两国关系的好坏息息相关。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苏关系增进时，中苏文化协会及其工作得到发展。可是抗战一胜利，国民政府便在美国支持下，执行反苏反共政策，全面进攻解放区，破坏国内和平，大量增兵东北，攫取抗战胜利果实，掀起了反苏运动，破坏中苏友谊。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和活

动，从此屡遭打击和破坏。

1946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日。国民党反动派蒙蔽真相，欺骗舆论，利用青年爱国热情，通过三青团煽动重庆学生举行了反苏游行。这一天，中国文化协会受到冲击，《新华日报》门市部和民盟的《民主报》门市部也遭暴徒们袭击破坏。新华日报门市部被破坏得尤为严重，并有多人被打成重伤，因而那天新华日报没有记者来中苏文协采访。第二天，中央社发的本市消息竟说：“在中苏文协巷内因贴标语问题，一部分学生与该会内一人起小冲突”，“学生游行秩序良好”。

1946年国民党政府机关和苏联驻华大使馆返回南京后，中苏文化协会也需随同复员南京。协会常务理事会决定，派侯外庐和先锡嘉先往南京筹备新会址。5月，侯到南京后，按理要去拜候孙科、邵力子和陈立夫。鉴于协会领导的历史情况，侯外庐先去拜候了邵力子，向他报到，请他对协会的复员工作给予指示。出乎意外，一见面邵力子就对侯说，孙会长近来很忙，暗示不必去找孙了。而孙科到南京后即消极起来不再过问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务。在伪国大召开前，孙科为要取得副总统候选人的反共资本，更公开发表反共言论。邵力子本人虽还有让中苏文协办下去的意愿，但对当时协会的会址、经费等问题，表示一概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只能给点道义上的支持。正在此时，过去从未出面主持中苏文协会务的陈立夫，却一反常态带信给侯外庐表示“关心”，准备“过问”协会了。在陈立夫要

插手协会会务的情况下，侯外庐便去梅园新村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指示侯，刘仲容适合担任中苏文协主任秘书这一职务，要督促刘尽快到南京来，以主任秘书名义主持协会工作；还是要加强孙科的地位，抵制陈立夫的势力；一定要设法维持协会内左右两派的现状。^①

中苏文化协会的经费，根据会章规定，可向会员征收会费。协会会员人数虽多，但在抗战期间收费困难，故从未向会员收过会费。协会成立初期，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教育部、财政部以及资源委员会等几个政府机关，每月各资助协会一二百或三四百元。随着国统区经济情况的恶化，物价不断上涨，法币日益贬值，原定那点资助费，却从未增加过，协会又不能不按月去领取。抗战后期，到郊区的教育部等单位领取一二百元资助费，还不够支付人力车费。因此，协会的经费只能主要依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资助。每举办一次纪念庆祝活动，每编译出版一本书和一期刊物，都得请苏方资助。协会专职工作人员的薪金，非常微薄，只够个人一个月低标准的伙食费，以致有家庭负担的人就要从事业余翻译，取得稿费，弥补家庭生活开支。复员南京时，协会不但租用新会址的费用无着，连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于是采取了停薪留职的办法裁减部分工作人员，有的到了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去工作，只留下少量工作人员。协会经费的困难情况，邵力子和财务委员阎宝航、王

^① 见侯外庐著《韧的追求》第182至184页。

炳南都了解。有此情况下，侯外庐根据会章的有关规定。拜访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傅结清（Biagbikuh），与之当面商谈解决困难办法。傅代表表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愿意协助解决协会到南京后的经费困难，并当即资助了4600美元，作为租用协会会址及开办费用。经费问题得到解决后，侯即请邵力子转告陈立夫，协会复员南京的一切困难问题已得到解决，请他“放心”。旋即租用了南京汉中路牌楼巷51号两幢中西合璧的平房建筑作为新会址。

南京虽是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是国统区的政治中心，但经济、文化中心则在上海，故当时南京与重庆的情况迥然不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特别是文化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大都去了上海，有的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中苏文化协会和“小民革”的许多领导人员，如郭沫若、李德全、王昆仑、许宝驹、阳翰笙、曹孟君等都在上海、或者去了香港和国外，在南京的只有邵力子、张西曼、谭惕吾、傅学文和曹靖华等少数人，协会常务理事会都难于召开。刘仲容则要随同白崇禧行动，经常不在南京，不能来协会，以致协会的日常会务，没有出面的主持人。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便随意封闭中苏文化协会，就采取两手作法，一手是指派特务暴徒，从外面破坏、打击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另一手是派人打入协会，企图从内部左右协会。1947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协会妇女委员会争取做点工作，遂由谭惕吾和傅学文主持，得到邵力子同意，准备了一套政治色彩淡薄的“苏联妇女儿童生活”图片展览，

假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新街口服务部展出。一经展出，便吸引了很多观众，但这也为反动当局所不容。一帮暴徒突于某日下午闯进临街的展览室，一边谩骂，一边动手撕毁了全部展览图片，然后扬长而去。当天，邵力子也来参观，看后还未离去，在服务部里面的茶室休息。协会工作人员去向他汇报展览被破坏的情况时，他低头苦笑不语，显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情。第二天，中央社和南京各报当然不给报导，苏联驻华大使馆则就苏联图片展览被破坏，当局不加制止，又一次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出了抗议。

1947年秋后，协会再次发生了人事危机。国民党反动派借口刘仲容不在南京，主任秘书形同虚设，便策划通过邵力子，要将伪总统府秘书荆有麟派到协会担任主任秘书。事先，协会进步力量对此事一无所知。一天，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傅洁清电话约张震前去面谈。见面时告知张震，邵会长昨日请他吃饭，协会只有曹靖华一人作陪。席上介绍认识荆有麟时，说荆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文学颇有造诣，现任总统府秘书，因刘仲容不在南京，想请他来协会主持会务，有助于协会开展工作，并征求苏联傅代表有何意见。傅答以容后答复。为此，特向张震了解荆有麟的政治背景情况。张便向阳翰笙同志了解荆的底细。阳说，荆是个文化特务，曾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某编辑部占过一个职位，起了坏作用。必须设法抵制荆来协会。后邵力子在协会召开的一次常务理事和主任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想请荆有麟到协会担任主任秘书时，对此，张西曼、谭惕吾和由上海

赶来参加会议的阳翰笙等一致表示，协会目前工作不多，刘仲容不在南京，一般日常事务已有张震在进行，不必再请新人来协会，张西曼发言更是尖锐，直率表示反对说，荆有麟是什么人，难道还不知道吗？把他搞来协会，会搞成什么样子？在南京的“小民革”成员、立法委员于振瀛、陈建晨等也在幕后劝说邵力子此事作罢。更重要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傅洁清向邵表示了协会目前工作很少，不请荆有麟来协会为好的意见。邵力子理解到协会进步方面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持反对意见后，此事遂作罢论。国民党CC方面要派文化特务进协会的阴谋策划，终于被抵制了。

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再派人打入中苏文化协会，有关人士曾动员了一位政治上持中间态度的立法委员、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俄语组主任姜寿椿来协会担任主任秘书。他鉴于当时中苏关系微妙和了解到中苏文协的复杂情况后不来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复员到南京后的三年间，主任秘书一职名义上虽由刘仲容担任，但他一直未能到职，故围绕这一职务发生了复杂尖锐的斗争。

中苏文协复员南京后，处境恶化，不能开展正常的会务活动。但中共指示协会中的秘密党员，尽量坚守工作岗位，非不得已不自动离去，免被国民党反动派乘机派人进入协会，搞破坏活动。参加政治活动比较明显的秘密党员，一有国民党反动当局要采取查户口等方式进行搜捕的信息，即避一下风，或转移到上海。在此政治环境下，《中苏

文化》杂志仍坚持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则由郭沫若、阳翰笙主持，在上海继续编译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地理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苏联研究丛书”，直到上海解放。

中苏文化协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大都是“小民革”的核心成员——国民党左派和社会知名进步人士，他们中有的很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也与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周恩来虽不便参加“小民革”领导层的会议，但由王炳南代表参加，负责同他联系。周恩来也与王昆仑、屈武、许宝驹、曹孟君、阳翰笙、刘仲容、侯外庐等保持着个别联系，采用各种隐蔽方式进行政治领导。另有一批秘密党员在协会专职做实际工作。这些党员则分别与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邓颖超、徐冰、张晓梅、华岗以及冯乃超等同志保持单线联系，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根据党在国统区秘密工作的原则，中苏文化协会内没有中共党的组织，党员之间更无横的组织关系，彼此不知谁是党员，只能凭各人平时的工作态度和在政治活动中表现的思想、观点和作风，暗自分析判断，谁是进步分子，可与合作；谁是中间分子，尽力争取；谁是特嫌分子，要提防警惕。直到解放后，各人公开了党员身份，才知中苏文协的每个工作部门都有中共的秘密党员，党员人数超过协会全体工作人员的1/3，加上进步分子，占了协会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由此可见，中苏文化协会虽存在于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南京，由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出面领导，但实际上是由中共中

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等直接领导并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支持的一个有影响的进步团体。

四、继往开来，空前发展

北京解放后不久，即在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开始筹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宋庆龄、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担任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东北和上海等各大城市，一解放也由当地党委领导，先后筹建省市中苏友好协会分会。过去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的秘密党员，当南京解放之后，有的到北京参加中苏友协总会的筹建工作，有的到上海参加筹建中苏友协上海分会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旋即于10月5日正式成立，刘少奇被选为会长。中苏友好协会的宗旨是：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由于中苏友好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在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友谊方面宗旨是共同的，故有连续性。过去担任中苏文化协会领导职务或热心支持中苏文协会务活动的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郭沫若等均顺理成章地成为中苏友协总会的副会长。1954年，宋庆龄继刘少奇担任为总会会长，随后李德全同志也担任了副会长。过去担任中苏文协理事或领导职务的邵力子、王昆仑、许宝驹、徐悲鸿、王炳南、阎宝航、曹孟君、谭惕吾、曹靖华、戈宝权、沈志远、翦伯赞、沈兹九等许多同志则担任了中苏友协总会理事会的理

事、干事会的干事及其他领导职务。沈钧儒、阳翰笙还先后率领中苏友协总会代表团，应邀访问苏联，继续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力量。1965年，中苏友协总会的工作机构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并。“文革”后，屈武担任了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戈宝权、傅学文、张震等为理事。王炳南则担任了包括中苏友好协会在内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

——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
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

熊 向 晖

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一些文章对此有所提及，但与事实颇多出入。作为知情者，现写出这段史料，以免湮灭。

一、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论断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不但毫无松动，且如雪上加霜，仅举三事为例：（1）1月27日，尼克松举行就任后首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是否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尼克松在叙述了不少中国对美国的所谓“敌对行动”之后说：“在他们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任何改变。”（2）2月19日，

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前中国驻荷兰外交官廖和叔叛逃，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送往美国一事，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并且继续诬蔑中国。”“这一切再一次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看清了美国尼克松政府继承美国历届政府的衣钵，悍然与七亿中国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中国政府认为，在目前这种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反华气氛下，按照预定日期在2月20日举行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显然是很不适宜的。”（3）美国侵越战争继续扩大。在尼克松上台后的头三个月内，在南越的美军由50万人增至54.3万人，接近约翰逊政府规定的最高限度。美机、美舰仍不时侵入我国领空、领海，我外交部发言人照例提出严重警告。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更加恶化。3月2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但苏联政府硬说珍宝岛属于苏联，反诬中国边防军侵入苏联领土，抢先公布了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苏方还动用舆论工具，向国内外大肆宣传中国军队“越过苏联合国境线”，向“警卫”苏联领土的苏军“挑衅袭击”，苏驻美大使还找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介绍“详细情况”。对此，中国从3月3日至12日，有29个省市自治区举行了“声讨苏修武装挑衅”的示威游行和抗议集会。参加的军民群众达四亿人次以上。苏联则在18个城市举行反华游行，在莫斯科10万人冲砸了我驻苏

使馆。我方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15日，苏武装部队又一次侵入我国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我政府向苏政府提出紧急强烈抗议。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次日，我国政府用备忘录复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正当中苏边境冲突白热化之际，尼克松3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指美国一编者注）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为此，他已决定用六七十亿美元建立“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潜在威胁”。他还说，“苏联象我们一样，不愿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中国共产党潜在的威胁之下”，苏联部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雷达“也是对准共产党中国的”。3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在参议院作证时竟说，中国“仍然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潜在威胁”。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九大”）于4月1日在北京开幕。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九大”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称，这个政治报告“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经“全体代表认真的逐段逐句地反复地讨论”，于14日一致通过。24日“九大”闭幕。28日全文公布了“九大”政治报告，其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

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段论述：

(1)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里提到的“敌人”，指的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而“美帝国主义”又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则是指“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

(2)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3) “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

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

(4)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起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

(5)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很显然，从上述事实和“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中，根本无法找出中美关系有可能打开，及发生突破的任何迹象。

二、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师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自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以来一直靠边站的四位老师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

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帅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周恩来总理进行周到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并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然后向各厂负责人就四位老帅“蹲点”时的劳动、休息、饮食、安全及职工应持的态度等作了细致交代；他让四位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三天，——陈总在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叶帅在新华印刷厂，徐帅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帅在化工三厂。其余时间由老帅自行支配，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再由陈总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四位老帅很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会不会被认为是同“九大”政治报告唱反调？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

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总找我谈话，告诉我上述情况。陈总说：我们四人带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总理就讲这么几句，我一听就明白他的心意。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又要惹祸。我们的秘书不外传，晓得哪天再有风吹草动，别个派红卫兵把他们揪走，勒令他们揭发检举，不得下台。不让他们参加，免得他们遭灾。于是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我说，好，赞成，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

以不可以？忙不忙得开？

我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师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师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陈总说，这个意见好，我就报告总理。

几天后，陈总告诉我，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同志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

随后，我便着手准备材料，特别整理收集了以下几则材料：

（一）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申述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声明中指出：（1）“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挑起的”，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以便进一步联美反华”；“苏联政府通过这一行动告诉美国，中国是美苏的共同敌人”。“苏联政府还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游说，乞求支持。”（2）“苏联政府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声明中，一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一面又极力否认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什么好谈的”，“同时苏军继续向中国境内纵深进行射击，至今未停”。“苏联政府在四月十一日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四月十五日就在莫期科开始‘协商’，并且不等中国政府

答复，就在第二天公布了照会，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至少是极不严肃的”。(3)“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4)“苏联政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发出战争叫嚣，向中国挥舞核武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这就是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战争政策和核讹诈政策的回答。”

(二) 6月2日，新华社发出电讯，对苏联“加紧对我侵略威胁”作了详细揭露，其中包括：(1)“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不惜人力物力’加强‘国防’。其一些军事头目也接连叫嚷为了对付中国，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分秒必争的战斗准备’，‘不容许有丝毫的缓慢’。”(2)“他们把煽动反对中国说成是所谓‘保卫祖国’，甚至无耻叫嚷‘中国的边界在离北京不到一百公里的长城’。”(3)“他们大大增加了军费，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了一系列的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他们大量增加了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

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4）“对我国进行核讹诈。他们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设在后贝加尔湖和中蒙边境的核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以‘毁灭性的核回击’来对付中国。”（5）他们“如此丧心病狂，绝不是偶然的。”是其“梦想用武力来实现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建立世界霸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6月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使馆。照会说，苏联政府“加紧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并且把武装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挑起了一系列边境事件。”照会详细列举了从3月15日到5月31日“苏联政府蓄意侵犯中国领土，对中国人民进行猖狂挑衅的严重事件”，指出这是“苏联政府加剧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严重步骤，是苏联政府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新罪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且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

综合这些材料，令人值得注意的是：（1）“九大”政治报告中，曾提出美帝和苏修“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但在“九大”闭幕后，我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以及宣传报道中，不再提美苏“争夺”，而突出美苏“勾结”，特别强调美苏勾结共同反华。（2）苏联动用宣传工具，大肆造谣，说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对此，我方却长期未作报道。

三 陈总主持“国际形势座谈”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师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同志和我列席。

陈总讲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做第一回。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

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不拘体、不限韵，鸣放一通。可以插话，可以打断，可以质问，也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总讲完“开场白”，四位老师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讨论的次数也超过了预先计划的次数，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从6月7日至7日10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并写出了第一次书面报告，由陈总定稿，上报总理。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 继续揭露苏军入侵我国领土, 如:

(1) 6月11日头版标题是:《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侵入我新疆巴尔克鲁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2) 7月8日头版标题是:《苏修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二) 更加强调苏美以反华为重点的勾结, 如:

(1) 6月7日以《苏修加紧同美帝进行反革命全球勾结》为标题, 指出:“苏修同美帝勾结的一个突出表现, 是加紧拼凑反华包围圈和组织反华‘神圣同盟’”。“苏修叛徒集团在其他方面同美帝的反革命勾结也在加紧”。

(2) 6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综合报道, 指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正在加紧勾结, 狼狈为奸, 妄图重新瓜分世界”, “正在结成事实上的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 共同反对中国”。“尼克松之流大谈所谓‘中国的威胁’, 公开叫嚷说中国是美帝的‘头号敌人’; 而苏修头目则鹦鹉学舌般地污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 来掩饰他们猖狂反华、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犯的罪恶行径”, “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帝的脚印, 往反华死胡同里乱钻”。“苏修还同美帝经营的一条从日本、南朝鲜到暹罗湾的所谓‘新月形防线’这一军事侵略部署相呼应, 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陈兵, ……美帝苏修串联亚洲各国反动派, 拼凑一个

反华军事包围圈的罪恶阴谋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帝苏修这两个‘核霸王’还越来越公开地结成了反华核军事同盟。”

(3) 6月27日以《苏修反华一再向帝国主义求援》为题，引用英、美报刊的一些报道，说苏修“作了很大努力来使华盛顿了解同中国日益恶化的边界局势情况”，“故意把向北京发出的一个措词强硬的照会内容转告给美国政府”，说明“紧张局势并不孤立于某些地区，而是边界沿线都如此”。苏“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它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三) 一再渲染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进行反华。这里只引用《人民日报》的几则标题就足以说明问题，如：(1)《苏修打起‘亚洲安全体系’破旗 拼凑反华军事联盟》(6月29日)；(2)《尼克松在走投无路中疯狂扩军备战，勾结苏联拼凑反华包围圈，在亚洲加紧侵略活动和战争部署》(7月3日)；(3)《美帝苏修大力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充当反华反革命急先锋》(7月8日)。

上述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但是，四位老师并不这样看。

四、四位老师《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

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

当前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1、中国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我党“九大”公开宣布：中国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广大革命人民共同战斗，直到“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2、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牌号的代表。一方面，他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敌视中国，散布中国“扩张”、“侵略”的谰言。但社会主义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外。中国二十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在反击印度侵略战争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并无任何“扩张”、“侵略”的意图。帝、修、反并不是真的担心中国会对他们发动武装进攻。他们最为害怕的，是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国人民革命，把他们送进坟墓。因此，美帝、苏修敌视中国，归根到底，是敌视毛泽东思想，敌视本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敌视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但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

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他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

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他们的互相勾结而使他们的矛盾有所和缓。相反，他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3、其他国家，或主要受制于美，或主要受制于苏，尚未形成匹敌美、苏的力量。他们基于各自的利害，在对中国的国家关系上，除少数追随美帝、苏修反华者外，多数采取不同于美帝、苏修的态度：或耍两面手法；或持旁观立场；或对中国表示友好，借以抵抗美帝或苏修的控制和压榨；或对美苏重新瓜分世界心怀不满，甚至公然反抗。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于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于找到反华的打手。

(二) 对反华大战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

1、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

(1) 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

(2) 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

(3) 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

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日本羽毛渐丰，佐藤之流叫嚣反华，实际是想利用反华发战争财，并借此向美、苏讨还失地，向南进行扩张，取得亚洲“领袖”地位，和美、苏争短长。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

因此，美帝不致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

2、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他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

(1) 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美帝对中苏矛盾故作超然，宣称不表态，不介入。实际上他在西边和苏修搞和缓，力求把苏修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使中、苏互相削弱，便于他乘虚接管东欧，甚至直捣苏修的老巢。

(2) 如果苏修决心大举进攻中国，它将力图速战速决；或仿效日本侵华的故伎，采取对中国逐步蚕食的作战方案，以便及时休整，随时观察美帝及各方动静，保持机动。但它一旦大打，我们绝不会让它速战速决，绝不会给它喘息的时间和行动的自由，而是按照主席的教导：“一直打到底”，形成地面持久战，这就造成苏修极大的困难：

第一，苏修反华大失人心。迄今它是以“防御”的口号欺骗人民。如它大举进攻中国，更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修多年来进行战争恐怖宣传，对它发动战争也有不利影响。

第二，苏修工业布局都在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补给困难，一切要从欧洲运来，只有一条铁路线，劳师远征，不能持久。目前苏修生活必需品已经奇缺，打起仗来更难维持。

第三，作战要有巩固的后方，苏修后方不巩固，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侵华战争必是长期战争，长期中必有变化，主要是它后方出乱子。前方未解决，后方祸起萧墙。一旦欧洲部分被美军突破，更使它进退失据。

(3) 我们认为，和美帝一样，苏修兵力东移，并不意味它的战略东移。苏修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东欧各国是他的主要市场和重要屏障，它不会掉以轻心。它的反华战争准备虽是真的，但它主要是想以军事体制维持其政治统治，镇压国内和东欧的反抗；并且摆出盘马弯弓的姿态，一面妄图从实力地位和我谈判，一面骗取美帝相信它真要和中国大打，求得西线安定，使美帝同意他组织反华包围圈，以此掩盖它向东南亚等地的扩张，把手伸向美、英的口袋，乘机重新瓜分世界。而美帝则要推动苏修打中国，乘虚接管苏修的地盘。

3、美帝、苏修会不会突然对我发动核袭击？我们对此要作充分准备。但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要使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把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

下，必然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而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因此，核武器救不了它的命。

4、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拣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

(三) 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1、苏修在建设上采取一条腿走路的方针，始而片面发展重工业，继而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它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帝陷身于南越，英帝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修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修还假借反帝的名义或利用反华的掩盖进行扩张。它往往从薄弱处下手，在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占领了一些阵地，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

2、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美帝不让苏修在中东最后站住脚。美帝并不相信苏修真会和中国大打，也不因此而听任

苏修扩张。

3、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4、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但它们不会知难而退。苏修在东边积极布置，在西边不会放松，在南边还要发展。美帝也还要扩张。它们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加剧。

5、欧洲和中东是美、苏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德国统一是欧洲问题的核心。西德力量日增，东欧原是德国的传统市场，而现在法国力量又有所削弱。在中东，阿、以战争已有美、苏间接交锋的性质。在欧洲，如果矛盾进一步加剧，发生美、苏火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此，应予密切注意。

四位老师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把我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力量，有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在对敌斗争中，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继续对苏修、美帝进行揭露和批判。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同美帝、苏修的斗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五、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师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10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师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概述如下：

(一)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1965年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对柬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挑衅，宣布与美绝交）。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舱溅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这一天，发生两件事：(1)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

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未公布），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2）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 6 月 17 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曼斯菲尔德乘美、柬复交转来信件，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总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二）据外电报道：（1）尼克松在出访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

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论，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

(2) 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以上各点，以及美国宣布在有关中国问题上两个“放宽”，新华社均未报道）。

(3) 原定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8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我代表团未带密码，八岔岛事件后，苏修在伯力搞示威游行，它们打电报要求回来。总理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位老师讨论时认为：(1) 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滥言，表明我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2) 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

脑会晤，尼克松迄未同意。苏要同我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不会当砧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3) 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等，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三) 四位老师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1) 8月13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 8月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把

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3) 8月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叛徒集团抛出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黑货”，“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4) 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8月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5) 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恶毒反华，诬我对苏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6) 8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但未公布。

四位老师讨论时，一致认为：(1)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2) 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3) 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

打算，我们拥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指出，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既定两手方针，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我军事包围，同时搞些假和缓姿态，意欲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我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姚广还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

陈总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四）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逝世。越南党和政府决定9月9日举行国葬和追悼会。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总理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9日在胡志明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回京。柯西金通过越方向我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

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主席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编者注），知我答复后绕道于9月11日上午9时许飞抵北京，周总理在机场同他会谈。新华社11日发布低调的简短消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月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总理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总理谈话的要点是：

（1）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办法。

（2）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3）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先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

施等问题达成协议。

此外，双方还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及改善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协议。周总理并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时，四位老师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三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五) 为时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甚嚣尘上。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有如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迷惑罗斯福。根据是：(1) 柯西金在同周总理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向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2) 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3) 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4) 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

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5) 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四位老师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

六、四位老师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和陈总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四位老师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

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深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

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而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

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七、四位老师疏散

(一) 9月17日，《人民日报》及各大报均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口号共29条，第二十二条口号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

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9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华社报道称：“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是伟大的动员令，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这个“伟大的动员令”发表后，报纸上相继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

1、9月21日，《人民日报》刊载：“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命令，授予珍宝岛自卫反击苏修挑衅的战斗中孙玉国等十同志‘战斗英雄’称号”。

2、9月28日，《人民日报》以《美帝二十年来疯狂反华遭到惨败》为题，刊载新华社的长篇报道，历数“二十年来美帝伙同它的帮凶、走狗顽固敌视、侵略中国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的惨重失败”。最后说，“如果他们胆敢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3、9月30日晚，周总理在国庆二十周年招待会的讲话中说：“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企图组织反华包围圈，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为了掩盖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反诬我们有所谓扩张主义野心，甚至影射我们要发动核战争”。周总理说，“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决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周总理在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说：“对于美帝国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4、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讲话。他说：“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林彪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都一字不易地将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国庆社论还号召“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5、10月4日，新华社报道披露：“1969年9月29日，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爆炸。在此以前，在1969年9月23日，我国还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同一报道还评论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这些新成就，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6、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苏联政府“在中苏边界全线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声明在驳斥苏方上述言论和阐明了中方立场之后，又简述了9月11日周总理和柯西金就两国边界问题等交换的意见及中国方面的建议。声明还宣布：“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中苏双方

就中苏边界问题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7、10月10日新华社报道，在北部湾公海上从事正常捕鱼的中国渔船，连续遭到美国军舰的炮击和美国军用飞机的扫射。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上台以来，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对我在公海捕鱼的船队连续进行猖狂挑衅的极为严重的罪行”。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受权提出“严重抗议”和“严正警告”。

(二)10月11日下午，四位老师开会，这是9月16日休会以后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四位老师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

陈总说，在加强备战声中，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观看体育表演的请柬，这倒是新鲜事，我想去看看。叶帅、徐帅、聂帅也接到请柬，老师们认为这和加强战备的气氛不大协调。

(三)10月17日，新华社报道：“北京革命委员会邀请在北京外宾两千多人，今晚观看了我国优秀运动员的体育表演。体育表演在新建的现代化的首都体育馆进行”。“表演受到了全场中外观众近两万人的热烈鼓掌欢迎”。报道最后提到，“观看表演的，有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王震、邓子恢、陈云、陈毅、陈奇涵、李富春、张鼎臣等”（徐帅、聂帅未参加。还有一些未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老同志观看了

表演，新华社未作报道）。

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把出席的老同志引入休息室。不久，周总理和政治局的几位成员来了，分批会见这些老同志。周总理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这些同志在20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其中，陈总到石家庄，叶帅到长沙，徐帅到开封，聂帅到郑州。总理已分别向各地第一把手打了电话，安排好住处，并由中办准备专机或专列。

10月18日上午，陈总邀叶帅、徐帅、聂帅以及姚广和我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帅、聂帅作了转达。陈总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四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陈总说，总理已作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陈总说，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聂帅说，他对郑州不熟悉，希望去邯郸。后经总理同意。

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报道说，“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八、中美关系终于打开

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

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

（一）华沙会谈翻开新页

1、1969年12月1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碰到中国驻波兰二秘和译员。美大使紧追不舍，向我译员说，他最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说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2、我驻波临时代办雷阳奉命于12月1日破天荒地邀美大使到中国使馆谈话，后又应邀去美使馆。1970年1月20日，雷阳与美大使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进行中美华沙谈判第一三五次会谈。美方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雷阳奉命表示，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两国间的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它渠道进行。

3、1970年2月20日，第一三六次会谈在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雷阳奉命告诉美国大使：“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

双方商定，第一三七次会谈定于5月20日举行。

（二）中美另辟联系渠道

1、1970年3月18日，美国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机，

策动柬埔寨右派发动政变，建立朗诺政权。次日，西哈努克由莫斯科抵京，中国仍以国家元首相待。4月30日，美国借口柬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庇护所”，派军侵柬，柬爱国力量奋起抗击。5月5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中国政府率先承认。5月18日中国宣布，鉴于美帝悍然侵柬，按原定日期于5月20日举行第一三七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不适宜，何时举行，另行商定。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强调“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6月底，美国政府被迫决定把美军撤出柬埔寨。10月初，尼克松向《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我死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国去”。但第一三七次大使级会谈并未举行，历时15年的华沙谈判到此结束。因为尼克松已另外开辟了同中国领导人沟通信息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2)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告诉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尼克松对华沙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但他“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三) 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事后，我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师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

我到301医院看望陈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总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四）中美发表《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恩来总理会谈。2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

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陈总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九、结 语

有的史学工作者曾提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先全面分析形势,提出论据,形成相关的文献。但从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期间,在毛主席的讲话、写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中,都没有为何要打开中美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相反,在作为权威文献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以及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的声明,都把美帝看作最主要的敌人,从中找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依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空白”?

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历史空白”,本文介绍的内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参证,我们再举出几段文字:

(一)《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0日刊载的《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8日刊载的《徐帅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中说：“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同几位老帅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日报》1991年8月27日所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高风亮节的陈毅同志，指出：“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

(四)《人民日报》1992年5月26日刊载的《聂荣臻同志生平》中说：聂荣臻同志“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可见，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

（共）

1935年到1937年初的国共关系

李海文 汪新

1935年秋是国共两党政策转变的关键时刻。首先是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余里转战后，于这年10月结束长征抵达发动抗日战争的前进根据地——陕北，并随之通过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其次，在这同时，国民党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也决定谋求与中共建立联系，进而谋求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以后，又经过近两年的时间，中国国内和平的局面才得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才得以正式形成，从而为发动神圣的、举国一致的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以下，本文将就1935年至1937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关键时期的国共关系，及国共两党政策的变化过程作一概述。

一、国民党重新考虑联苏的方针，蒋介石与苏联大使的谈话

1927年四一二反共事变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武力为后盾，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与苏联断交；对内发动反革

命内战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这一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加紧，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形势时，其实力人物蒋介石竟认为：如中国“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的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中国？”^①换句话说也就是抗战必亡。为了倾全力消灭工农红军，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向日本帝国主义拱手让出中国东北三省。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因得到东三省而善罢甘休，其目的是要征服全中国。因此占领东北之后继续步步南下，咄咄逼人，严重威胁到蒋介石所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蒋知道英美不会马上支持他抗日。而与日作战又无法避免，为了打破困境，便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苏联。1932年12月蒋介石采纳了宋子文、孔祥熙的意见，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蒋介石认为：“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之中国，独霸东亚。”“日本要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以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了的国策。”他说：“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在他的后方，俄国在他的右侧面，英国在他左侧面——南洋。最大最强的敌人

^① 《蒋总统集》(1)第795页，《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7年7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演》

都在他的侧背，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拿全力来征服我们中国？”^① 这表明蒋介石确曾寄希望于日本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西进美国，寄希望于爆发世界大战。但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日渐尖锐，蒋不能不致力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1934年夏，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带领一非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意在探询苏联政府的意向。当时，以蒋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存有两点疑虑：一是蒋介石上台后反苏反共，这能否取得苏方的谅解；二是新疆政局于1933年4月发生变化，盛世才攫取新疆大权后表现出亲苏倾向。以至南京不少人认为新疆已被赤化或被苏控制。

苏联为了不腹背受敌和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计前嫌热情接待了蒋廷黻一行。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疆问题便成为悬而未决的唯一障碍。特别是蒋介石认为：如果中日交战，“在三天之内日本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占领起来。”^② 那么战时中国就只能通过新疆从苏联得到军事援助。新疆对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新疆的地位及作用，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力如何，不能不成为蒋十分关注的紧迫问题。

为了进一步沟通中苏关系，蒋介石指派曾担任过他的参谋、侍从长达8年之久的亲信邓文仪担任了驻苏武官。邓于1935年春到达莫斯科。后又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于7

① 《蒋总统集》(1) 793—794页。

② 《蒋总统集》(1) 第795页。

月经塔城进入新疆考察。两个月后，邓文仪重新回到莫斯科并立即接到了回国叙职的命令。

通过邓文仪的汇报，蒋介石得知苏联积极支持中国抗日的意向，便于10月间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出：“如果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海路难以获得任何军需物资”，“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①

10月18日，蒋又接见苏大使，由孔祥熙担任翻译。蒋明确表示希望改变中苏关系。并暗示大使，他想同苏联签订保障远东和平的军事协定，这个协定应具有“不对外”的性质。

苏联担心南京企图加剧苏联和日本的冲突，而使苏陷于腹背同时受敌的境地。因而，鲍格莫洛夫大使问道：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和签订反苏军事同盟是真实的吗？蒋答：日本非正式提出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至于反苏军事同盟，中国不论在怎样情况下，都不会同意。

11月份，南京得到可以经新疆得到苏联支援的肯定答复。

12月19日，蒋再次召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大使转达了苏联政府的意见，同意同南京政府签订协定，并准备进行具体的讨论。

蒋介石马上提出：想以1923年1月孙文（孙中山）越

^① 《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第662页。

飞联合宣言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

鲍格莫洛夫知道孙越联合宣言的第一点即是“孙逸山博士以为共产党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斗转星移，今日中国已不是 1923 年的情况，大使在会谈前接到的指令是：要特别注意蒋介石同中国工农红军的关系，因而表示不能接受这个建议。

蒋介石心中明白便转换话题，声称对中苏关系中发生的一系列“误会”，特别对中共问题表示很遗憾。他说：他绝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象其他党一样有权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既然中国共产党把推翻中央政府作为自己的口号，他只好对它采取严厉措施。对苏联同情中国的统一表示高兴，他明白只有中国达到统一才能保证在反抗日本侵略中取得巨大成绩。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使达到这个统一，他是很高兴的。

大使回答：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将不起任何中间人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因为大使接到的指令是：蒋本可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同中共谈判。苏联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共产国际存在期间，苏联政府从不和各国共产党发生直接关系，以免引起外交纠纷，妨碍与各国政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各国共产党由共产国际领导。

蒋再次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但任何一个

国家都不允许政党有自己的军队。所以当中国政府抗日时，苏联需要利用自己的威望，以使红军承认现实的政府。如果苏联政府能这样做，这就表明苏联是南京政府的真诚盟友。

大使断然拒绝了蒋的要求。

同共产党谈判，因苏联不愿做中间人，蒋只好自己解决。1935年12月蒋急令邓文仪速返莫斯科。1936年初邓一回到莫斯科即展开活动。1月中下旬，邓文仪在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时说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①。邓并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讨论：1、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2、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3、国共两党间恢复1924年——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其它任何形式。在这种情形下，中共继续独立存在。将来抗战爆发后，内蒙古或西北部分地区成为红军根据地和活动区域。邓还认为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所有的海岸线，那时中国的武器来源不是英美，而是苏联。南京希望经过西北从苏联得到武器弹药。

王明答复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国共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

邓文仪将谈话记录毫不保留的整理成一个详细的报

^① 见《潘汉年的报告》。

告，派李副武官专程回国。他没想到的是李副武官身藏密件冒险经日本回到国内后却受到冷遇。从此，国共谈判事宜不再由邓文仪经手进行，续由陈立夫一手控制进行。

为同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讨论，蒋派陈立夫秘密到苏联。陈立夫偕张冲于 1936 年春到达欧洲，准备由此进入苏联。行前陈写好书信若干封，令夫人每过几日向亲朋好友寄出一封，以造成他仍在国内的假象。由此可见此行之保密的程度。

陈张在欧洲蛰居多日。蒋顾虑重重，认为直接去苏谈判的时机未到，又令陈张回国。由孔祥熙在南京同苏大使谈判。苏联为防止刺激日本，提出签订中苏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持续一年多，直到 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进攻上海后的 8 月 21 日，中苏才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才最后确立联苏的方针的。

二、蒋介石秘密布置陈立夫主持与中共的接洽

蒋介石既已预见到苏联在未来中日战争中作用之重要性，他为了赢得苏联的谅解才对国内共产党采取谈判的态度。

1936 年 1 月 22 日蒋同鲍格莫洛夫交谈，表示他在下列条件下可同中共谈判：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大使也介绍了苏联政府设想的关于预定签定之中苏协议的内容。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特别讲到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的规模问题，这应该由苏联政府自己决定，中国

感谢苏联在军事供应方面可能给予的任何帮助。应该说，谋求军事援助，这是蒋改善中苏关系的首要目的。

与苏联的谈判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蒋公开声称政府的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① 他更私下向日本大使田有吉表示：“对前述之原则，（即广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对此无任何异案。决心立即听取日方希望，进入具体商谈，以期从速付之实施。”“抗日运动决不会发生，本人根本不抗日”，表示希望日中亲善。他本人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调东北军从华北到西北，将加紧对红军的“围剿”等等^②。至于他布置的同中共接触一事，甚至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让知道，而将此重任直接交给CC系头子陈立夫。这当然也与陈立夫主张抗日联共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原来，陈立夫见日本之侵华日益加剧，曾找到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建议与日本洽商，“转移日本军阀之目标，使之北进或南进而不西进，以减轻我国之压力”。^③ 当遭到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的回绝后，便与其兄陈果夫密商，认为“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帮助中共扩展，惟兹事体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

① 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 1935年11月21日田有吉致日本广田外务大臣电报（第1291号）

③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

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请示领袖，（指蒋——笔者注）得其许可，而后进行。”^①

陈立夫受命后，不便亲自出面，交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办理。曾养甫经谌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上海特科系统的张子华。吕振羽于1935年11月底到达南京同曾养甫会谈。谌小岑于1936年1月3日到上海与张子华会面。

至此，国共两党的接触仍是限于较低层次。但是，决定政策的是国共两党的中央，建立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便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个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是通过宋庆龄的安排才得以建立的。

三、宋庆龄巧安排国共两党中央建立联系

1935年11月，上海特科因负责人被绑架失去了领导，也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1936年1月间徐光汉、徐强和董健吾商议是否可以通过宋庆龄的帮助到达陕北。董健吾与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与宋家相熟，遂由董出面向宋庆龄请求帮助，而董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到的王牧师。

当董健吾应邀来到宋庆龄家里，宋庆龄郑重地交给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行动方便，宋还通过孔祥熙给了董一个财政部委员的名义，并资助了路费，且一再叮咛要保存好信件，说成功了“益国

^①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

非浅”。^①

董健吾临行前，徐光汉又将张子华（未说明真实身份）介绍给董，与董结伴从上海出发。

张子华是上海的地下党员，1月3日他以中共长江局（当时实际没有这个组织）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惠中旅社秘密会见谌小岑。经过几次会晤，张子华了解到南京的意图，表示“愿为此事奔走”，并提出希望南京能派一个人到陕北去向中共中央传递此重要消息。谌小岑同曾养甫商议后表示：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有人为此事奔走。^②

最后，特科决定张子华到西北去。因为张是宁夏人。1935年9月9日，他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曾到陕北苏区巡视过工作，熟悉当地情况。

1月，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剿共”前线战事紧张，一连40天找不到办法进入苏区。只好铤而走险，董健吾拿着自宋庆龄的“护身符”——财政部的公笺，前去求见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这时张学良已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也就在1月下旬他与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举行了会晤并表示他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他还告诉李克农：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与红军各守原防，恢复红白区通

① 董健吾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及回忆。

② 谌小岑：《周恩来给我一封信的原委》。

商。^①张学良虽有这些举动，但内心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一旦被南京发现将惹祸上身。这时当他看到董健吾手持的财政部公笺后不由心中大喜，认为了解到了南京的确实意图，自己也可以放手同共产党联络了。2月19日，张学良和陕北中共中央通过电台联系后，派飞机将张子华、董健吾送到延安，再由当地驻军用骑兵护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2月27日，张、董二人到达瓦窑堡，在城外受到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领导同志的迎接。他们听了张、董的汇报后，十分欣喜，马上电告正在前线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

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回电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十分明显，这些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于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化。

3月，董健吾携带载明上述原则的密件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一一通报有关情况后，旋即赶回南京复命。当他在宋庆龄家中见到宋子文、孔祥熙时，做了认真、详细地汇报。

^① 《周恩来年谱》第300页。

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在宋庆龄的推动和安排下终于就此接通。

同月，张子华过黄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而后返回瓦窑堡。4月16日他又和冯雪峰同行南下。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张子华则数次往来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他在西安时常以南京来的客人身份活动，既躲避了特务的跟踪，又使张学良从中了解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络情况。张曾对属下讲：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国共两党的接触比较快地取得进展，决非偶然。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出于民族大义，都有携手抗日的愿望。从国际范围来看，此时，世界法西斯日益猖獗，英、美、苏都有抗击法西斯，支持中国抗日的要求。有利的国际背景也是重要的因素。

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明显落后于共产党，一则它是执政党，不易转变；二则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争权夺利，许多人并不是为了国家，优先考虑的是一己私利。而共产党将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将阶级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因而率先捐弃前嫌，联合抗日。

由于这段历史长期秘而不宣。抗战爆发后，张子华在延安受审查，失去自由直到1942年病死，他曾为国共谈判往返奔走的情况更是从此长期无人知晓。又因为张子华在这段时间里一度化名为“黄君”，因而不少人以讹传讹，以为是国民党广西派的黄华表或是中央系统的张冲奔走南京

陕北之间。其实，在西安事变以前，蒋对中共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之。”^①所以国民党在1935、1936年间与共产党接触的同时，一直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绝不敢派代表到陕北苏区去，而一直是中共方面的同志——张子华、潘汉年为此奔走。

四、从两河口会议到中共五五回师通电

中共一直高举抗日的大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两天，即由博古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加紧组织领导群众的反帝运动和武装反抗。在此之后，中共中央更是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是在长征途中，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共高级领导层仍注意收集消息，关注着民族的存亡。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了四川西部荒凉的两河口，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还专门听取了博古汇报从无线电中得知的日本向北平开炮的情况。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同时，加紧开展对东北军和其它白军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以加强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②后因战事频繁，未能再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因为已有过这种讨论，所以，中共中央一旦接

①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五十年经历纪要》第72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283—284页。

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马上就欣然接受。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考虑到自1934年夏起共产国际就和中共中央失去了通讯联系，为了尽早地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精神，会议还未结束，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奉派回国。1935年11月张浩经蒙古到达陕北，同长征刚刚到瓦窑堡的中共中央会合。张浩多次同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交谈，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精神及《八一宣言》的内容。^①

11月28日中共中央据此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抗日反蒋去，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相应地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1931年1月四中全会以来，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是连同富农一起反对。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主持下讨论了由李维汉起草的《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掠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为此，《决定》规定：“我们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

^① 笔者访问刘英记录。

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

这些文件都为即将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做了准备。

12月8日、13日，周恩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胜利之后相继回到瓦窑堡。中共中央遂于17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举行。会议确定“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周恩来发言特别指出了反对卖国斗争的重要性。

在讨论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要不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毛主席认为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他后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作了系统的阐述。博古却不同意，并引经据典地提出意见。毛主席对此尖锐反驳说：难道我对老祖宗（指马克思、列宁）不忠么？！不孝么？由于张闻天、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支持，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顺利地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①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新的任务，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这就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方向，推动民族反帝战争的发动，并领导人民取得胜利。

会后，中共开始着手加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专门做正在与红军作战的

^① 笔者1984年访问郭洪涛记录。

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任书记；还成立了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苏区周围地区的统战工作，张浩任书记；并派刘少奇到“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北平、天津一带开展工作，担任北方局的书记，开辟白区工作新局面。为了响应“一二九运动”推动全国抗日热潮进入高潮，中央决定红军东征，进入山西，争取直接与日军作战。

1936年3月，刘长胜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全部文件带到山西东征前线，周恩来、博古也很快赶到前线，中共中央随即于3月20日到27日在山西孝义、石楼一带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由于战事频繁，会址几次变动）。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发、博古、王稼祥、张浩、洛甫、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凯丰等。

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还听取了张子华、王世英、李克农的汇报，听取了有关国民党中央系以及张学良、杨虎城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最新动态：受北方局委派直接领导吕振羽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王世英，当他由天津赴陕北途经西安时，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四项协定；李克农则于2月25日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及张学良举行了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五项协定。张子华在汇报中虽然没有提到蒋介石、陈立夫的名字，但是中央根据他的汇报判断出“反革命内部即南京政府内部和一

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① 事态发展之快，已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料。

中共中央在东征前线举行的这次会议共分三个议程：（一）统一战线的问题。（二）当前的战略方针。（三）和国民党谈判的具体方针。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论述了世界大战的危险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并将抗日战争放在世界舞台上加以考察，指出：“一方面德、日、意接近，另一方面，英、法、美、苏接近。这种形势表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增加了，其一触即发之势时刻威胁着人类。”^② “蒋介石想在日本同中国红军、苏联之间‘渔翁得利’，是办不到的，只能是或者联日，或者联俄联共。”^③

张闻天在分析了中国各阶层对抗日的态度后，又初步预测了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前景，指出：“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正在形成，尤其在华北。那里成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地区。”^④

与会者同意洛甫的报告，博古也在发言中指出：蒋介石自己亦觉得“抗日而先剿共”的口号不能用。认为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在于“抵抗或投降日本”，应在此基础上组织人民统一战线。这证明博古的认识与前已有很大变化。

会议并研究了蒋介石的政治态度。

①②③④《张闻天选集》第85页、第83页、第84页、第85页。

周恩来在 23 日的发言中也分析了国民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他说：国民党领导已开始认识到日本将继续南下侵略全中国，并知道英美目前不会直接对日作战，因而寄希望于日苏战争。一部分国民党领导已认识到须要先有自己抗日才能真正做到联俄，先有国内的联合抗日，才能有国际的联合抗日，但是，国民党中也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牺牲苏维埃和红军的利益；至今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未定。他说：我们要抓住“联共”的口号，并用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建议不仅仅提出红军集中于华北，而且要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于华北”。他认为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①

为了推动全国抗日，会议决定采纳“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于华北”的口号。

3 月 25 日会议进入第二议程，讨论战略方针问题。首先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做报告，报告认为华北是矛盾的集中点，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在军事上是可能的。华北是未来的战场，因而我们要经营山西、陕西，主要是山西，以发展求巩固。毛泽东报告之后，

^① 《周恩来年谱》第 304 页。

周恩来又发言具体介绍了经营山西的计划并建议在晋南、豫北、直南、五台组织游击战。

会议进行到3月27日，开始具体地讨论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除中央负责人外，李克农、张子华等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这天的会议上分析了国民党的情况，他将国民党分为民族改良派与民族革命派，认为民族改良派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这些人，坚持反革命立场，但是这些人也想同溥仪、殷汝耕等汉奸划清界线。他们内部是不统一的。民族革命派又分左右两派，右派是由于日本的压迫与民众的压迫从民族反革命中分裂出来的，右派中的右翼如孙科、于右任等等。右派中的左翼如张学良、马占山、蔡廷锴等与蒋介石有较大的区别，主张抗日，但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不同意联俄联共。民族革命的左派是以宋庆龄为代表，包括军人的中下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左派坚决主张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之勇气。因而我们的方针不仅要把民族革命派和民族反革命区别开来，而且也要把民族改良派的左右两派区别开来。毛泽东指出：2月份中央军委关于李克农同张学良谈判的训令仍然适用，这就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针对国民党“取消苏维埃”、“取消暴动”的要求，毛泽东主张对此要提出“取消国民政府”、“取消国民党的压迫”以对抗之。他还强调不管任何

派别都可与之谈判，而且谈判都不应破裂。最后，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有关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军委，有关政党方面的统战工作应集中于中央常委。统战工作的全部工作均由中央常委指挥。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由常委和李克农、张子华、王世英等单独谈话，交待有关谈判事宜。

通过这次会议，中共中央进一步肯定和发展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明确了对待蒋介石的态度。虽然未获悉南京的谈判是由蒋介石首肯，但对蒋介石的认识已发生变化，由会议之初将他看成“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①改为认为他有抗日要求，将他划入民族改良派之列。

这就是三月会议的功绩。

同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进一步明确提出“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同一天，周恩来也与张学良在延安城里漏夜谈判。张坦率地提出应逼蒋抗日，称：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注意地听完他的意见，马上表示：“毛主席也有这个想法，我可以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毛主席。”^②

① 《张闻天选集》第86页。

② 1961年7月周恩来接见张学铭夫妇的谈话。

张的看法与中共中央的看法不谋而合，特别是张本人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的看法更为中共方面所重视，对中共确立逼蒋抗日方针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周回到瓦窑堡将谈判情况向其中央做了详细汇报。

这年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途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著名的五·五通电。通电中说：“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的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此时，中共中央已将蒋介石列为争取的对象。但是，在现实中，蒋仍派重兵“围剿”红军和苏区。十年内战的严酷现实也使中共中央深知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艰巨性。

五、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外出谈判

1936年3月21日，在董健吾回到上海之后，孔祥熙继续同鲍格莫洛夫会晤，秘密告诉苏大使：蒋介石已经同中共就统一战线问题开始进行谈判，他个人希望谈判获得成功。

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了全力解决两广事件，稳住西北，蒋对国共谈判采取和缓政策，提出的条件比较合理。

5月，陈立夫向曾养甫、谌小岑口援了谈判的四项条

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① 这四项条件由谌小岑分别转交给吕振羽及张子华，但陈交待只能说是谌个人的看法。

张子华携上述条件日夜兼程再赴陕北，终于5月中旬到达陕北大相寺一带向周恩来汇报。周代表中共表示欢迎国民党的转变，并于15日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来共同“商讨大计”。^②

7月份，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13日蒋在会上发表讲话，对中华民族的“最后关头”作了解释：“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此前国民党对日本在东北成立的伪满洲国一直未予承认，蒋这次的讲话进一步表明其走向抗日的态度。

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往来仍处于极端秘密状况，更不允许共产党利用谈判之机在社会上公开活动，扩大影响。当张子华提出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想法后，谌小岑出面说服张打消此念头，无成效后国民党就将张投入监狱。由于张在狱中坚持斗争，上海地下党也不断地向谌要人，国民

①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98页。

党才不得不将张释放，再由谌小岑将张子华护送回沪。

到今年 8 月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8 月 8 日，潘汉年经香港、南京辗转到达陕北保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汇报了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会谈的情况，并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此时中共中央已经获悉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获得了蒋介石首肯且由陈立夫主持。

8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潘汉年的汇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会议认为蒋介石由对日退让，镇压抗日救亡革命运动，改变为愿意谈统一战线，其同我党来往是为了得到群众拥护和迫使日本退让，以巩固其统治。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还是对国民党的抗日意向予以肯定，并决定继续维持国共谈判和对话。为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中共中央决定在确保对苏区和红军领导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苏区、红军的名称。这次会议还决定起草致国民党的信及关于对蒋政策的党内指示。由此便产生了 8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及 9 月 1 日《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颇有戏剧性的是在产生《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同一天，在中国远距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根据季米特洛夫在执委会发言精神也起草了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该电文指出“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还可以声明，一旦建立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苏区将纳入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将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实行为整个中国确定的民主

制度”。根据共产国际这一来电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5—17日，又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应该承认，西安事变前共产国际有关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对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立逼蒋抗日的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行动，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社会矛盾变化和中国国情独立做出和实施的。

在中国共产党屡次采取积极行动的同时，来自国民党方面也有一重要的积极信息，那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19日，国民党方面参与国共谈判人员之一的曾养甫曾致信周恩来表示：“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屏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曾还告之将由在武汉的电台和陕北建立电讯联系。8月27日，张子华带着电台联系的密码及曾养甫的信件第三次回到陕北。中共中央对曾养甫的邀请很重视，很快做出了和国民党的负责人谈判的决定。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回信，希望曾及陈立夫能“惠临敝土”（批陕北——笔者注）或将陕西华阴做为双方谈判地点。9月1日，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写信，希望他们向蒋“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①周在信中并再一次表示中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01页。

共方面早已准备随时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作具体谈判。

张子华随即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二陈的函件，日夜兼程赶赴广州。^①

为了推动国共两党高级会谈尽早举行，中共中央决定，可由周恩来外出谈判。为与国民党联络有关事项，周恩来于9月22日拟毕致陈果夫、陈立夫函，函称：“关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②24日，潘汉年身负重任离保安赴上海。他除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的信扎外，还带有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此时，西北“剿共”战争的气氛日益紧张。鉴此，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飞广州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作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内战，准备抗日。10月14日中央接到张子华从西安打来的电报，报告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并带去周恩来外出谈判用的护照。这四项条件较之陈立夫5月份口授的四条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关键的第三条表明国民党（起码是陈立夫、曾养甫）已考虑到允许共产党公开、

① 曾养甫此时已调任为广州市长。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03页。

参政的问题。

但是，由于蒋介石突然变卦，国共和谈又遇波折，周恩来的外出谈判未能成行。

六、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谈判

蒋介石变卦的主要表现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相忍谋国、挽救民族危机的主动行动，提出了这样一条不合理的谈判条件，即：“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来解决。”这是因为九十月间，两广事件已获解决，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解决西北问题，可以用军事手段一举消灭红军。并同时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问题。蒋还决定亲赴西安部署、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但是，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仍在要求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就在蒋动身去西安的前夜，冯玉祥向蒋提出了与共产党谈判妥协的问题。

蒋答复说：我考虑很久了，该问题包括三点：(A) 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成了对打的冤家，看来很难和解，这倒不是谁负责的问题，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B) 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例外，但他们带枪来是不行。(C) 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

冯说：如果红军不去，决心与你打个落花流水，全国

统一功亏一篑，对外面不易得手奈何？

蒋答：国际上要我们防共呢。我们现在如不打，问题很大。

冯仍坚持说：如红军能服从统一、服从领导，我们还是找办法与他讲妥协为好。

蒋介石最后只是点点头说：你想到办法，很好。^① 以此相敷衍。

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曾对人表示：目前红军处于困难的地位，所以极力要我们妥协。他的方针是乘机给共产党一个打击，将红军的力量压到最低限度，将红军压过黄河，然后谈判，好讲条件。西北战事迫在眉睫，国共两党已不可能举行高级人员的谈判。

10月14日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先由潘汉年做初步谈判。潘汉年遂由联络员成为谈判的代表。10月21日，周恩来将此决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

中国共产党是诚心诚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如周恩来在9月22日致函二陈的同时，致函蒋介石所表示的：“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自己的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

^① 潘汉年1936年11月16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而奋斗到底。”^①

就是在中共中央已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外谈判时，当得知蒋介石已到达西安的消息后，中共中央仍不放过这个机会，于10月17日训令张子华出而交涉，要求蒋介石派飞机接周到西安同蒋会谈。

10月26日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写了一封长信，陈述利害，再次表明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诚意。信中也正告蒋及其诸将领“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11月21日，因国民党胡宗南部尾随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穷追不舍以求一逞。红军一让再让，让无可让，遂起而自卫，在甘肃山城堡一举歼敌一个多旅。这一战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妄想，鼓舞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士气，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决心，推动了全国要求停战议和的热潮。

此时，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仍在不断地高涨，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冯玉祥等正在国民党内提议召开全会讨论恢复三大政策，并获得了颇大反响。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潘汉年也于11月初到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05页。

达了上海，在他由保安赴上海途经西安时，还会见了张学良，向张通报了中共中央目前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及与蒋交涉的情况。11月10日，潘汉年经张冲的安排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展开谈判。谈判一开始潘汉年先将周恩来给二陈及蒋的信交给陈立夫。

陈立夫问：你代表周恩来个人，或代表……？

潘答：我是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个人。随后，潘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①

此时，陈立夫的态度大不如前，他首先表明自己代表蒋介石，并傲慢地说：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而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的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以为红军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陈立夫没有想到潘如此熟悉情况，扭转话题：你我均

^① 条件内容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七辑第167页，刘昌亮所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潘汉年》。

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愿和周面谈。

潘汉年反问：这种条件，周恩来能出来吗？

陈立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不要报告蒋介石的条件。

潘汉年义正词严地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在激烈交战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①

由于双方距离太大，第一次谈不欢而散。随后又谈了一次，仍是无果而终。潘陈谈判期间从西北传来了红军山城堡大捷的消息，此役不啻给国民党内迷信武力“剿共”的人当头一棒，使之不得不重新考虑和审定与共产党谈判的政策。陈立夫在会谈中的态度也随之有所变化。在其第三次和潘汉年谈判时，表示同意将红军改编后的人数由3000改为3万。但是仍坚持收编红军的政策，同时只要求共产党让步，在国民党方面却不肯做任何保证和承诺。在潘陈第三次会谈中陈立夫提出的原则是：（一）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主义而奋斗；（二）取消一切反政府之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军事委员会的统辖，担任抗日战争之任务；（四）取消苏维埃组织，改为行政区，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②但是合作是平等的，妥协必须是双方的。中共中央研究了潘陈谈判的情况后，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原则，即：

① 参见潘汉年1936年11月16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②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国民党方面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候谈判结果。据此，中共中央于12月10日致电潘汉年，指出：至今蒋仍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我们“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的姿态”，必须坚持“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之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西安事变之前，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收编政策，国共两党谈判没有取得结果。周恩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说：“国民党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也必须看到迄至西安事变之前一年来国共双方的接触和谈判，为国共之间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加强了双方的联系，进而为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以及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还是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七、西北“三位一体”的初步建立

由于抵抗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一个举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鉴于国民党成分复杂内部派系众多的政治现实。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接触的同时，也注意到大力开展对驻防陕甘与红军邻近、而又属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长

期受到国民党中央的限制、猜疑和歧视，他们对南京政府的不满是一致的；作为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影响下，他们要求抗日结束不抵抗局面也是一致的。这两支军队的首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不仅都产生了联共抗日想法，而且都分别和共产党建立了联系，达成了协议，只是双方心照不宜互有防备。直到他们在中共帮助下互相沟通了想法，才撤除藩篱，彼此达成联共抗日的默契，并进一步加强联合，开始采取联共的一致行动。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针强大威力的结果。早在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刚刚进驻陕北，中共中央即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先后派刘鼎、王世英、汪锋、张文彬、叶剑英、朱理治等到西安具体从事此项工作。在推动张学良进一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尤其起到了突出的作用。1936年4月9日晚11时左右，按事先双方的共同安排，周恩来和李克农到了延安城里的教堂，会见张学良和王以哲。寒暄过后，李克农和王以哲在教堂外间交谈，周恩来和张学良则在里间会谈。周恩来首先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张学良马上说：我了解，我听老师张伯苓讲过。

周恩来很是诧异，问：何以张伯苓是你的老师？

张直率地说：我原来是抽大烟打吗啡的，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之，拜张伯苓为师。咱们是同师。

周恩来从这段对话中感到张学良是一个痛快的汉子，

敢于作自我批评，由此入手继续谈下去。谈话中张讲了一套法西斯可以救国的道理。对张的这一认识，周从剖析法西斯的本质入手，进行入情人理的分析，说：法西斯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是不可能的。

张听了，默然良久。从此他绝口不提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①

周、张会谈进行了约五个小时。张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他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直南、平汉路西的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使驻防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在云南的红二、六军团的活动则需取得中央军同意，但他愿为此事活动。（四）他特别讲到：蒋介石现在岐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他尚做不到反蒋，如蒋降日，当离开蒋。但在他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五）将派代表到苏联，中共方面的代表可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东北军的代表可由欧洲去。^②（后来中共派邓发经新疆到苏联，张学良派李杜携毛泽东的两个儿子经巴黎赴苏）。而当张学良谈到

① 参见1961年7月4日周恩来接见张学铭夫妇的谈话。

② 参见《周恩来年谱》第305—306页。

他对蒋介石对日政策走向的推论及相应考虑时，周恩来则郑重回答：毛主席也有这个看法，我可以将你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周张的会谈至第二天凌晨四时才结束。双方人员分手时，张学良又送给红军三万法币。

周恩来、李克农和刘鼎离开延安回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共中央十分满意。正在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得知后，也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领导从此全由周恩来主持并组织实施。

延安会谈后，红军停止了对东北军的军事行动，至5月23日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更明确决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①

7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统战工作，会议决定将扩大联合战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为了便于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决定将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概由周恩来统一领导。并决定派刘鼎、朱理治、叶剑英到西安，加强东北军工作，派张文彬到杨虎城处为代表。此时，中共已在酝酿同东北军、十七路军提出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建议。

六七月份两广事变期间，张、杨和红军联合抗日意图更加具体化，曾共同拟定了组织西北抗日联军的计划，以

^① 《周恩来年谱》第310页。

与红军的抗日行动密切配合；还草拟了一个纲领性的通电宣言稿（西安事变时张杨所发的八项主张通电，其中有些内容就是来自这个宣言稿）。^①张杨并着手整顿内部，培养抗日力量，在王曲联合办军官训练团，对中下级军官进行抗日联共的教育。

1936年秋，在西北地区已初步形成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局面。

八、中国共产党支持两广事变，加紧对各地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逼蒋抗日的艰巨性，深知只依靠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力量还是不够的，逼蒋抗日的力量越大，联蒋抗日的可能性才越大。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指出：在逼蒋抗日的同时“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因而，中共支持各地实力派一切抗日反蒋的行动、倾向。例如两广实力派反对国民党蒋系中央势力，主张抗日发动两广事变，中共就给予较高的评价并表示声援。

5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红二、四方面军，指出：两广事变的发动表示：“（一）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二）太平洋上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美积极参加反日的开始。（三）反动统治内一个重要部分转向抗日讨逆的开始。”中共中央肯定两广事变是抗日

^①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进步的，将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使其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时更加有所忌惮，从而有利于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对两广事变的政策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共中央还认为事变如不能深入发展扩大，有和南京妥协的可能，因而应加强作桂军的工作。

8月27日在保安，中共中央领导人热情接待了李宗仁、李济深等派来的代表钱寿康，并与之签定了抗日救国协定。后潘汉年携往南京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就是在此协定基础上修改而成。

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下，中共对各地实力派的联络工作进展颇为顺利。

驻在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刘子青为代表到西安，同中共建立了联系。

1935年初上海特科派中共党员张曙时到四川工作，结识了刘湘，得到刘湘的尊敬。1936年年11月中共派李永声^①又从上海到刘湘处活动，刘湘对中共的政策欣然同意，慷慨解囊，帮助上海地下党建立秘密电台。

11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到太原设立了办事处——彭公馆，和阎锡山建立秘密联系。同时，中共和绥远的傅作义也有了来往。

经过张学良向盛世才斡旋，中共代表邓发取道新疆到

^① 有人说李永声即是冯雪峰化名。

苏联。

以上活动不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发展、壮大了全国逼蒋抗日的力量,使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一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声势越来越大。

九、西安事变的爆发及中共确立和平解决的方针

西安事变的爆发首先是由于国民党中央相互矛盾的政策引起的。其要联共又要“剿共”的矛盾政策,不能自圆其说,只会加剧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蒋又亲自到西安督战,强迫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否则撤换张、杨两将军的职务,其势咄咄逼人。这不能不逼迫张、杨急谋对策不惜涉险。这种结果周恩来早就预料到了。1936年9月,他在致蒋函就指出:“先生如尚徘徊岐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①

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改组政府,停止内战,召开救国会议。并于14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杨任正副主任。

事变的当天,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蒋之反革命面目现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07页。

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并征询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对事变的发生感到既突然，又欣喜。马上做出两个反应。

第一、命令红军各部整装待命，准备随时南下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同时电告张学良，须部署部队抗击中央军的进攻。并提醒他“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官员”，以防其出意外变故。

第二，决定派周恩来来到西安协商大计。周恩来于15日出发，17日晚到达西安。随后中央又派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工作。这一决定是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后，才做出的。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西安事变后的第一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林伯渠等。会上，大家一致肯定西安事变并决定采取积极支持的方针。

首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言。他说：虽然事变是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其事；但是，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

毛分析了事变的三种前途：（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

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蒋的部下转到西安方面；（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

基于这种分析，他提出在政治上维护张、杨，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影响全国。召集救国大会，成立实质上是政府，名义上叫抗日援绥委员会的机构。虽然他也提出过在人民面前揭露蒋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过“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①等话。但他同时也认为：蒋最近的立场是“中间的立场”。这就表明他并未放弃蒋是可以争取的这一考虑。这同中共中央八九月间确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是一致的。毛泽东主张对西安事变的公开反应应是十分谨慎，他提出：“我们暂不发表宣言，但实际行动上，应是积极的。”这种弯弓不发的做法显然会使中共保持政治上的主动。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力量可能出现的对事变的种种反应，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说：日本可能在南京搞政变，在沿海地区增兵。这样，就会加剧日本和英美的矛盾，英美将支持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中间派。苏联则会在英美之后表态支持我们。

出于这样的分析，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而决定。对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的态度。他说：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

^① 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是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运动，巩固地联合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七省是南京的势力，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要争取他们抗日。

周恩来还提出：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但在实际上取领导作用。不取发号施令的形式，用群众团体的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参加。将来，西安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我们党应准备走上公开政治舞台，同时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发动群众运动。

朱德发言较短，他提出了中共在军事上的对策，即：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博古、林伯渠等相继发言之后，张国焘发言，他的发言基调则与其他与会者大相径庭。他对以西安为中心做了另外的解释。他说：我只说到关于西安建立政权问题。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的？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这个发言与中央逼蒋抗日方针是相违背的，自然受到大家的批评。博古在第二次发言中不指名地批评张国焘说：西安事变是抗日的旗帜，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他重申了周恩来的意见，在政权形式上，西安不与南京采取对立的

形式。

张闻天是较晚发言的。他认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是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提出了党当前的四项任务：第一，是巩固我们的力量，尽量争取时间，巩固自己的部队，把西安、兰州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与苏联打通。第二，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的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第三，组织群众，进行群众运动，武装群众，到处开始组织，大批地武装群众。第四，党的工作首先注意西安。现在有新的困难、新的矛盾，需要我们慎重考虑。这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 我们应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不要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与会者经过充分地讨论，看问题越来越冷静，认识越来越深入。

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他说：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敌我双方都要争取群众。他再次强调：为了争取群众，我们不轻易的发宣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鲜明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在西安建立不要政府的名义但实际上是政府性质的机构。他同意朱德、张闻天的意见：在军事上采取防御。

毛泽东提出的“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度”。这是中共中央这次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

中共中央漏夜开会的同时，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在保安不胫而走，人们欣喜若狂，欢腾雀跃。13日或14日下午，在保安召开了声援西安事变的群众大会。大会要求公审蒋介石。十年内战，血恨仇深，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少人主张杀了蒋介石，为被蒋屠杀的同志报仇；有的人则主张把蒋押到苏区来严加看管。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后来有人据此判断说中共主张杀蒋，这是不对的。看一个政党的方针政策只能以其正式文件为准。

中共中央一直严肃、慎重地对待西安事变，15日才以红军将领名义公开致电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电文指出：“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并呼吁：“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中共这里讲的渔人不是别的就是指的日本帝国主义。同日，中共中央电令潘汉年，要他在南京、上海“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周恩来也在15日这一天身负切实了解情况和争取谋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使命匆匆赶赴西安。

上述电文表明中共中央的主张又有所发展、变化。首

先电文没有将蒋交人民公审的文字，只主张“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国人，不仅包括工、农、红军、中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统治代表，凡是中国人都在其列。第二，强烈呼吁和平解决事变，防止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内战。

18日，中共中央接到周恩来从西安发来的长电，获悉了周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张学良向中共方面介绍了六天来局势的变化及国内外各方、包括苏联的反应。局势远比中共所估计的更为复杂。当前刻不容缓的是如何对付南京方面可能发动的严重的军事进攻和明确对蒋的处置方案。

中共中央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摸清各方面情况后，终于最后下定力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心，旋即公开发表致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9日又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进一步将召开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并倡议将拟议中的会议、会址由西安改在南京，改变了原来的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同日，中共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的方针：（一）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三）给张、杨积极、实际的援助，实现发动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四）准备在“讨伐军”进攻时给以严重打击，这种防御战是为促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

战争的发动。

至此，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基本达于完善。21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周恩来，批准了周拟就的同国民党南京方面谈判的方案。周恩来在西安继续为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而奔走。

十、西安会谈和蒋介石的承诺

22日，宋氏兄妹到达西安。与蒋会面后，蒋授意可由他们代表他与中共及西安方面谈判，对商定好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23日上午，举行第一轮谈判，张、杨、周同宋子文出席。首先周提出停战、联共等六项主张，同时表示：以上六项条件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则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这是周综合了中共和张、杨的意见提出的。

下午，第二轮谈判，仍旧是上述四人出席。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双方就过渡政府的具体人选交换了意见，原则上取得了一致。

张、杨、周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先成立西北联军，在张领导下准备抗日。宋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首肯，只是说转告蒋。

24日上午，第三轮会谈，除前述四人外，宋美龄也参加。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一）孔、宋组织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三）蒋应允回归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蒋停止剿共，

并经张接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去后发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这九条基本上同意了张、杨的八条通电，也承认了共产党、红军、苏区的合法地位，并答应由南京政府提供给红军抗日经费。

24日下午，周单独会晤宋子文，宋表示希望中共能成为他抗日、反对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此时，潘汉年正在南京、上海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奔走，中共中央遂指定潘为对宋子文的秘密接洽人。

会谈期间，周两次和宋美龄长谈，详细阐明了中共的立场、方针。这两次谈话，对推动蒋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24日晚，在张的陪同下，周与蒋会晤，蒋当场做了承诺。会谈后周和博古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蒋向中共承诺的内容：“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①这确是蒋的

^① 《周恩来选集》（上）第71—73页。

口头承诺。这封电报保留至今并已收入《周恩来选集》，公布于世。

可是，27日蒋回到南京后，即发表声明，意欲对前述诺言完全予以否认。

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将蒋在西安允诺的条件归纳为六条：（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办法；（六）其他具体的救国方法。

29日，杨虎城在给陕甘两省各县县长的信中公布了蒋在西安谈判期间答应的六项诺言：（一）明令中央入关各部队自25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材，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对外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副司令与虎城负其全责，并谓本日（25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委座自称）个人负责。

从以上三份历史材料可以印证：蒋的确做了承诺，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白纸黑字，历史文件俱在，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十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坚持与国内和平的实现

蒋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地扣押张学良，更派重兵压迫西安。在一番军事布置之后，向西安方面提出了甲、乙两种解决方案（甲案为东北军驻防甘陕，十七路军调驻陕西渭河以北，红军仍驻陕北，西安潼关一线由中央军进驻；乙案为十路军调驻甘肃，东北军东调安徽，红军仍回陕北，陕西大部及西安由中央军进驻）。力图以军事压迫、政治分化来达到瓦解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目的。

此时局势十分严峻。西安三方在军事力量上与南京相比处于劣势，如果硬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但如果三方联合一致，严阵以待，蒋想轻举妄动也不得不考虑其所可能付出的代价。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一方面在政治上，揭露蒋的背信弃义，同时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机，向国民党各方广为呼吁维护国内和平实现抗日救国，要求释放张学良，推动国民党走向联共抗日。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也防患未然、预做准备。经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王以哲等会商，西北三方制定了联合抵抗进攻的紧急部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以东连设七道防线，并由周 1 月 4 日电告中共中央，要求红军驰援关中地区。主力红军旋于 8、9 两日赶到三原、耀县、咸阳一带。虽然只有 3 万人，但是英勇善战，威名远扬。主力红军的配合是对抗日友军的极大支持，从而迅速稳定了关中的形势。蒋看到三位一体的力量，也不敢再轻易妄动。对此，张学良闻之曾欣慰地说：

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由于，张学良是维系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他被囚南京以后，西北三位一体很快出现了裂痕。首先是东北军群龙元首，内部早已存在的两派矛盾日益尖锐，逐渐变得互不相让，各行其是。

面对极为复杂的国内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① 鉴此，中共全力维持西北三位一体，坚决要求蒋实践其诺言。同时，南下关中的红军部队在所到之处，业已受命停止了打土豪。但是，周、叶、博在西安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预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做朋友式的劝告，引导方向，协调各方关系。他们只能利用一切场合，通过与上层人士谈话，出席东北军、十七路军会议，出席群众团体会议等，进行广泛细致的宣传引导工作，指出武装对抗对张学良反而不利，只要坚持三位一体，张终有一天能回来。特别是做东北军主战派工作，更是反复宣传要他们顾全抗日大局，坚持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因为情况的极端复杂，以及蒋对东北军实行的利用矛盾加强分化的政策，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孙铭

① 《周恩来年谱》第348页。

九、应德田、苗剑秋等终于铤而走险，在2月2日上午杀害了主张和平解决素孚众望的王以哲将军，并拟定了主要针对东北军元老派，但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名字在内的黑名单，准备进一步扩大恐怖行动。东北军内部矛盾顿时成为对抗性的，在前线的东北军师长刘多荃撤防回师向西安进发，西安则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对共产党实行兵谏。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代表周恩来处变不惊，不顾个人安危，一闻凶讯立即赶到王以哲住宅。见王躺在血泊之中，家里乱作一团，遂率刘鼎、李金德等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生者。消息传出后，使外界对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随后，周又赶到新城和杨商议善后。杨随即派人到潼关和中央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接洽。与此同时，周还派出中共党员刘澜波急出西安往刘多荃处向扬言要为王报仇并已进兵西安的刘多荃说明真相，陈述利害，要求他暂停军事调动、万勿同室操戈。在处置凶手问题上，周为维护团结、维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局，又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派刘鼎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使东北军元老派失去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也使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失去了首领，不致再有其他动作，进而防止了“二二事件”后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二二事件”后，东北军提前撤兵，中央军开进渭南，杨虎城避居三原。东北军的多数军长要求执行乙案，东开

安徽，并驱逐进步的年青军官，对十七路军武装戒备。这样，三位一体已难维持。此时，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在西安的周、叶等人的安全，曾特别电告“紧急时立移三原”。但是周恩来很清楚，能否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关键在于要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此举事关中华民族命运大局。为此，他决意不计个人安危留在西安，迎接顾祝同率中央军进城。国民党中央系部队在未发生武装对抗的情况下进入西安，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终于维持住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局面。这样，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中蒋介石即已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其后，他虽然扣押了张学良，但却仍不得不接受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当顾祝同率军开进西安后，曾参与国共谈判接触的张冲很快就衔蒋之命赶到西安，受命和顾祝同一起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中指出：这“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①新的历史一页揭开了，在日寇侵华图谋日甚一日，民族命运面临存续危亡之际，国内和平的实现，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抗日的准备阶段。

① 《周恩来选集》（上）第73—74页。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刘 风 梅

一、创 立 经 过

1、为什么要创办日本工农学校

1940年10月，在中国西北高原一座群山环抱的古城里，诞生了一所史无前例的敌军战俘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这是一所教育、改造日军战俘的学校。是为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而创办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产物。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不仅重视国内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也重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曾指出：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2、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3、日本国内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1938年5月，他又在《论持久战》中重申了这一思想。同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决议案也指出：“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我们党十分重视争取日军中广大士兵及下级军官觉醒，使他们脱离反动军队，进入国际统一战线中来。日本工农学校，正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创办的，它通过对日俘的教育、争取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达成思想上的转化，使其成为反侵略战争和为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坚强战士。并通过他们，争取大批日军士兵脱离反动军队，进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求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2、筹备经过

抗战初期，我军通过瓦解敌军工作和贯彻执行党的俘虏政策，争取了一批日军士兵的觉醒，他们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参加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积极投入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活动，在瓦解敌军，削弱敌军战斗意志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同时显示了党的俘虏政策在对敌斗争中的巨大威力。

1940年初，冈野进秘密来延安，打算经中国港口密航日本，赴日本国内具体指导革命运动。但由于此时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完全处于日本及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要实现这一目的是很难的。因此，冈野进采纳了我党中央的建议，决定暂时留居延安，并承担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下设之日本问题研究室的工作，具体组织领导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以指导我军的敌

军工作。在此期间，冈野进与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一起商议：把前线俘虏的日军士兵送到延安来，建立一所战俘学校，认为“这不仅是为了当前的宣传活动，而且对于战后建设民主的日本，也是极端重要的事情。”^①这个意见很快得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同意，并立即开始了筹备工作。

在此之前，延安已有两名日本俘虏（森健和高山），他们在我军的教育、争取下，思想得到了转变，已担任了敌工部日语教师。1940年8月，在延安的日俘增至7人，到10月间，又从晋西北送来6名。此时，建校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便在延安城中心地带的宝塔山腰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在学校正式成立前，关于校名的确定，人们曾提出过各种建议，但最后定名为“日本工（劳）农学校”。学校成立后，由林哲（冈野进的化名）任校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抽调了一些懂日语的同志担任教员。

在筹备工作就绪后，经过审查选择，挑选了11名学员，于11月20日正式上课。从此，我军对敌军俘虏的争取、教育工作便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3、开学典礼

1946年5月15日下午6时，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到会的有日本工

^① 见《野坂参三选集》第205页。

农学校全体师生、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及延安各界代表近2000人。大会主席台上，高悬着日本工农学校校旗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旗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巨幅标语。大会首先由傅钟同志致开幕词。其次由朱德讲话，他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工农学校学生能回国组织日本的‘八路军’，来与中国的八路军携手，共同为争取中日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同志也讲了话，他号召中日青年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并预祝日本工农学校能迅速地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接着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代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坚决表示：要“始终站在反战同盟的历史岗位上，誓与日本法西斯蒂奋斗到底。”大会宣读了从全国各地拍来的贺电与祝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宣读了他们发自肺腑的誓词。在大会后举行的游艺节目中，工农学校学员登台演唱了日本歌曲，表演了舞蹈及日语话剧《前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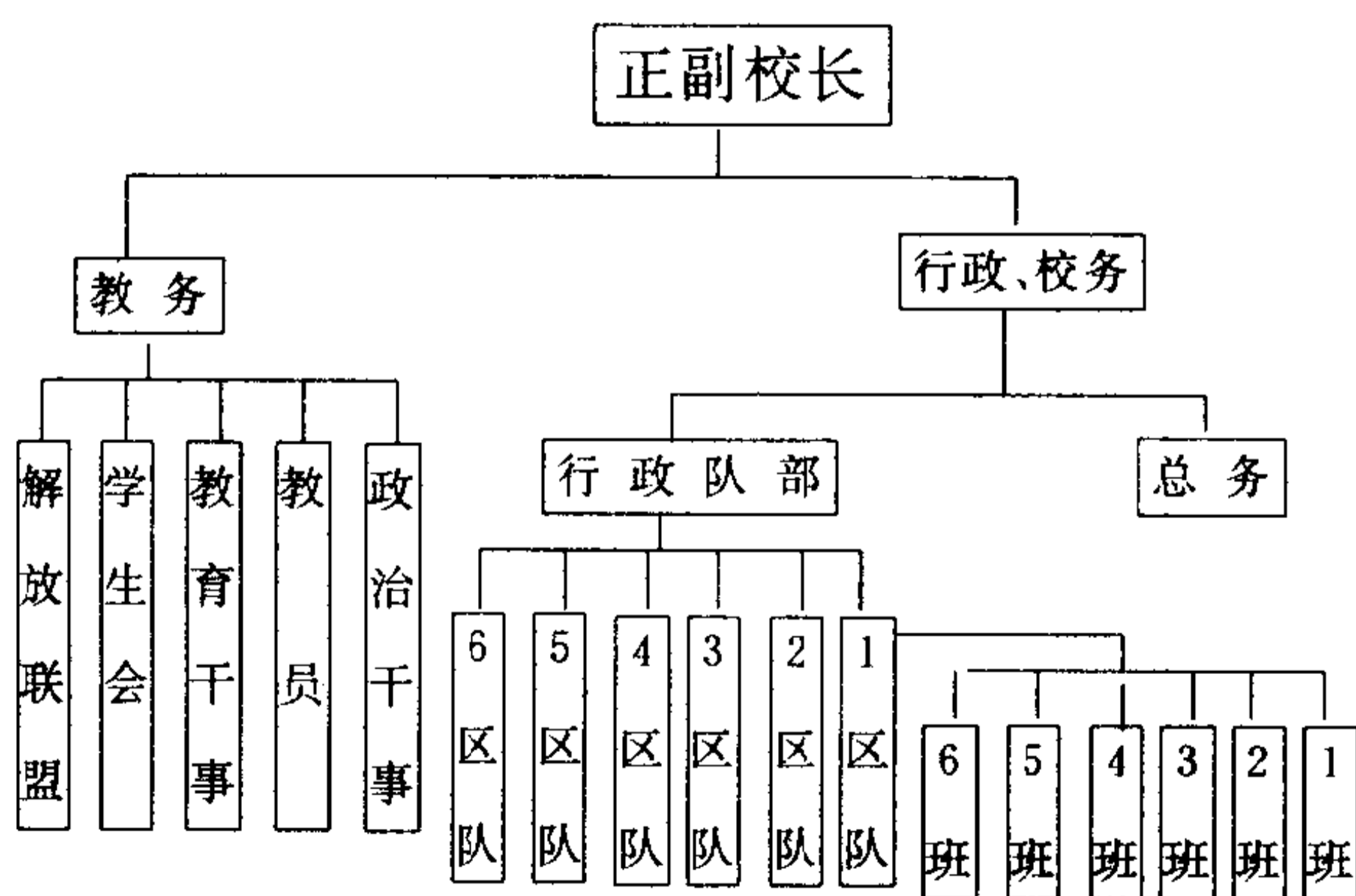
这次开学典礼，对学员的思想触动很大。学员千野在参加了开学典礼后说：“从此次开学典礼中，使我们更加了解八路军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和八路军的同志们利害相同，道路是一致的。”日本工农学校的成立，给广大日军士兵带来新的希望。在觉醒联盟负责人晚本一夫给工农学校成立大会的贺电中说：“日本工农学校的成立，给了我们无限的鼓舞。它将是吸引着前线穿着军服的日本工农走向革命道路的核心。”

二、组 织 机 构

在日本工农学校创办的初期，学校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整个学校的教学活动和行政工作分别在教务和校务处的领导下进行。

随着学员的不断增多和教育的不断深入，为了适应学校的教学活动，日本工农学校的组织机构也在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化。到后来又增设了宣传部和研究部，与教务处、校务处一起负责学校的全盘工作。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学校除设立各种组织机构外，还将学生分编为区队，在区队下又分编为班，在一般情况下，学生以班为单位进行教学活动。下边是日本工农学校的组织系列表：



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课外活动，学校实行由学生自治的原则，在校方领导及帮助下，主要由学生自己推选的学生会组织来负责。因此，学生会组织便成为学校的一个重要组织部门。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会的作用，在学生会内又分设了正、副委员长（委员长森健，副委员长小林），学习委员（正委员大山，副委员茂田江），文化委员（正委员梅田，副委员松本），图书委员（正委员山田，副委员役藤），经济委员（正委员中小路，副委员富田），编辑委员（正委员泷泽，副委员浅井）。

为了适应教学活动与工作，学生会的组织及人员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中，如1944年，学生会就经过三次改选，其组织和人员都有所变化：

第一期（1944年1月——2月15日）：学生会主席：重田，编辑委员：白鸟，文化委员：东，图书委员：冈部、后藤，经济委员：高木。

第二期（1944年2月20日——7月10日）：学生会主席：白鸟，编辑委员：上野，文化委员：谷川，图书委员：西村、夏川，经济委员：北村、田代。

第三期（1944年7月15日——12月）：特增设副文化委员1人，卫生委员3人，以加强文化及卫生工作。其分工如下：主席：水野，编辑委员：西村，文化委员：夏川、三木，图书委员：田代、松山，经济委员：石冢、山川，卫生委员：公文、相田、中村。

日本工农学校隶属八路军总政治部，其经费及教职学

员的日常用品和津贴皆由供给部按月拨发。校内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员由学校自己决定任免。

三、学员来源及其成份

该校的学员来源以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少数是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下自动投诚过来的。他们大都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从年龄上看，以青年人为主；从职业上看，以工、农等劳苦大众为主；从文化程度看，以中、小学程度者为主；从兵种上看，大部分为步兵，也有少数工兵、辎重兵、卫生兵和宪兵。1941年2月初，该校有学员18名，年龄最小者23岁，最大者36岁，而以24至26岁者占大多数；其中工人11名，农民3名，小职员和商人4名；大学程度者7人，中学（专门学校）程度者4人，小学程度者12人。1941年3月至6月底新入校的21名学员中，除1名年龄偏大外，其余均在30岁以下。其中工人11名，农民5名，职员5名；专业学校毕业者3人，中学毕业者3人，小学程度者14人，文盲1人。1944年5月15日，该校计有学员69名，其中24岁至29岁者占总人数的82.06%。农民占15.9%，职员占13.1%，店员占7.2%，商人占5.8%，劳动者（工人）占56.5%，渔夫占1.5%。初小程度者9人，高小程度者47人，中学程度者10人，大专毕业或肄业者3人。中学毕业以下者占全校总人数的80%以上。在

这 69 人中，步兵占 79%。属战斗被俘者 47 人，自动投降者 9 人，行军落伍者 3 人，其他 10 人。

四、入学条件及教育阶段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以教育、改造日俘，培养日人反战组织的干部为目的，因而进入该校学习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 (一)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出身；
- (二) 没有特务嫌疑；
- (三) 头脑不愚蠢；
- (四) 具有小学或小学以上程度的学历；
- (五) 身体健壮。

在具备以上五个条件后，还必须填定如下志愿书：“我进此日本工农学校，自当努力学习该校所教授之学科，并服从本校所规定之校规及纪律，若有违犯，愿受本校（规）则之处罚。”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凡刚入校者，首先进行为时一月的审查工作，看其是否有入学愿望，并考察具备与否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予科受教育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 10 个月。

五、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转化 学员思想而进行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中国共产党俘虏政策的精神，通过在政治上、物质上的优待和思想上的教育转化工作，达到学员立场世界观根本转变的目的。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初进校时，无一不表现出极端的顽固性。他们怀着盲目的敌对情绪，视八路军为“野蛮的共产军”，认为作了八路军的俘虏便是“最大的耻辱”。“不仅自己一生完了，就连家属也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唾弃与谴责。”因此，尽管学校多方体贴、关怀，但大部分人还是坐立不宁，自暴自弃，十有九个企图逃跑或自杀。认为只有杀身成仁，才不愧为日本的“勇士”，“才能对得起祖国”、“对得起天皇圣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以种种方式来表示反抗，如不起床、不洗脸、随地大小便；有的还以绝食来威胁，要求释放；有的甚至组织小团体与学校对抗；对思想稍有觉悟者，则进行攻击谩骂：“身为日本男子，却甘心做支那的走狗，像奴隶牛马般地被利用，还不如早些死了的好。”或者公开污蔑、攻击八路军是“用下等武器作战”、“吃鸟食（小米、玉米）”、“连一辆汽车、火车都没有的乞丐军队”，是“根本不可能战胜日军的”。1940年11月3日，在日本纪念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里，该校6

员学员，还偷偷地爬上山顶，面对东方，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他们把我们的教育看成是“赤化”、是“利用”他们来反对日本。因此，对学习心怀戒备。一到上课时间，就寻找各种借口，进行逃避。即使勉强坐在课堂，也抱着“下决心，不管教员们说些什么，绝对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的态度。学员们的这种顽固性，给教育争取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要转化学员的思想，首先必须消除他们对我之敌对情绪。在这个基础上，对他们再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得到提高，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才能达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也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育、争取日俘思想转化的根本经验。

1、优裕的物质待遇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物质生活上，给学员以优厚待遇。凡属新来学员，皆予以如下优待：“（一）第一月份发给津贴费 5 元。（二）被毡按实际情形补充之。（三）鞋袜各 1 双。（四）手巾及肥皂各 1 条。（五）牙刷 1 把。（六）牙粉及烟各 1 包。（七）旱烟袋 1 根。（八）碗筷各一。（九）单衣单裤各一。（十）衬衣衬裤各一”。并且每隔 4 个月，每人补充“（一）鞋袜各 1 双。（二）牙刷 1 把。（三）手巾 1 条。（四）肥皂两块。（五）草烟 2 斤”。当时，我八路军月津贴分为 5 等，即：士兵 1 元 5 角；排级干部 2 元；连级干部 3 元；营团级干部 4 元；师级以上干部，均

为5元。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按连级供给，即每月3元。在伙食上，日本工农学校除按一般地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殊供给：（一）每人每月猪肉大秤1斤。（二）粮食除按我军规定供应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拾斤（不扣米）。（三）如遇年、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给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大生产运动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每人每月也只供应小米1斗（每斗30斤），麦子2升，油15两，肉2斤。而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却以白面、大米为主。每人每月供给（节假日会餐补助除外）小麦2斗，另加10斤优待面粉，小米1升，肉6斤1两，油15两。为了搞好学员的生活，学校还设有学员们自己组织的伙食委员会，伙食委员会根据学员们的生活习惯制定食谱，指导炊事员做日本风味的饭菜。日本工农学校有着自己特别的厨房及饭堂。物质生活是相当丰富的，在当时（1944年）日本内地的一般人一月只能吃一次肉，军队伙食更是恶劣的情况下，该校学员却几乎每餐有肉。

这不仅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延安是很高的优待，而且与日本国内人民和日军士兵的生活相比，也是很优裕的了。

2、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给学员以优待，而且在政治生活上也给以充分的民主自由。如在精神上，尊重其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岗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和压服的方法管理学员，而是以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

法，启发阶级觉悟，提高思想认识，从而达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而对于已经觉醒的学员，还给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都参加了参议会会议的选举。当时要求从日本工农学校、敌军工作干部学校、鲁艺及抗日军政大学等4校推选出的3名候选人中选取1人为边区参议会会议员。按照选举规定，作为候选人，有权在大会上发表20分钟的竞选演说。4校约4000余人在延安机场举行了选举大会，在会上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候选人森健（原名吉吉青）作了长达40分钟的讲演，他从日本人民的立场出发，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希望打倒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介绍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各种活动。选举结果，鲁艺推选的候选人周扬得票最多，当选为边区参议会会议员。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候选人森健，得票1000余张，名列第二。但陕甘宁边区政府依据“三三制”原则，作为特例，吸收森健为边区参议会会议员。同时，日本工农学校学路静男也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会议员。他们直接参与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并有权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在生活管理上，学校采取学生自治的原则，由学生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组织、管理学生，开展各种政治、文娱活动，使学员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民主、愉快的气氛，促进了学习和思想的转变。对于思想和文化水平有了一定提高的学员，学校给予大胆的提拔和使用，如

让他们承担某些课程的教学任务，森健、杉本、梅田、高山进等许多学员都担任过课程的教授任务。梅田在任教期间，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还编写了一部较为系统的政治常识讲义。1942年秋，学校又提拔部分学员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中小路静男和大山光美被任命为正、副队长，森健被任命为政治干事，茂田江与梅田被任命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又提森健为教务主任（1944年被派往晋西北担任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晋西北支部长，教务主任职务遂由高山进接替），高山进为教育干事。中小路静男负责行政工作，杉本一夫负责政治工作。

政治上、生活上的优待，消除了学员的敌对情绪，使其逐步对我军及我党的俘虏政策有所了解，从而为政治上的接近和思想上的转化奠定了基础。学员们说：“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八路军把我们当作朋友、弟兄和同志加以看待。”，“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谢”（日本士兵大会、反战大会《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和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典礼上学员誓词）。

3、系统的政治、文化教育

为进一步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从根本上转变思想，学校还对学员进行了系统的政治、文化教育。这一工作，主

要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授课以及讨论会、报告会和各种专题讲座等辅助教学活动来完成的。

日本工农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话和文化课等。另外，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较低学员的日文水平，还设有日语训练班。

为了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从根本上转化思想，学校把教学内容与学员们的思想状况、文化程度等实际情况紧密联系，依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阶段，安排教育内容和形式。

学员初进校时，主要是学习文化课与政治课，使学员首先对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有所了解，明确国际形势以及我党我军的基本政策，对中国人民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从而揭穿日本法西斯军部的欺骗宣传，为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和转变思想奠定基础。1941年日本工农学校的课程安排是这样的：

（一）时事与日本问题。主要内容有：（1）明治维新；（2）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3）国际情势等。主讲人：林哲（野坂参三）。

（二）问题讨论（由学员自己组织进行）。主要内容有：（1）日本所说的“非常时”是什么？（2）自由与放纵；（3）我们看到的中国人；（4）东亚新秩序等。

（三）中国话。主讲人：赵安博、杨同志。

（四）社会发展史。主讲人：王学文。

(五) 政治经济学。主讲人：何思敬。

(六) 中国问题讲座。主要内容有：(1) 鸦片战争；(2) 太平天国革命；(3) 中法战争。主讲人：廖体仁、罗明达。

(七) 自然科学。内容有：(1) 日蚀；(2) 视觉与听觉等。主讲人：李初犁。

(八) 时事报告。内容有：(1) 中国共产党关于太平洋战端爆发的宣言和八项纲领；(2) 日美战争的简要战况等。主讲人：赵安博。

(九) 特别问题恳谈会。主持人：林哲。

(十) 听写及练习新文字（文化课）。由学委会负责进行。

随着学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的逐渐提高，教育内容也逐步由浅入深。由一般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进而提高到系统的基础理论的教育，以促进学员思想的转化。

如 1942 年学校课程安排是这样的：

(一) 日本国内问题及时事。主讲人：林哲。

(二) 联共（布）党史。主讲人：林哲，辅导：梅田。

(三) 政治经济学。主讲人：王学文、李初犁。

(四) 政治常识。主讲人：廖体仁、王学文、李初犁。

(五) 中文课。主讲人：赵安博、王学文、江右书。

(六) 文化课。主讲人：赵安博。

(七) 党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开设）。主讲人：李初犁。

(八) 时事报告。主讲人：李初犁。

(九) 其他活动。

在理论教育中，学校特别注重引导学员系统地深入地探其本源。如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首先引导学员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法西斯主义形成、发展的规律，进而进行透彻的剖析，揭穿日本法西斯的本质以及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日本和整个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从而促进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的迅速提高。又如，1942年时事及日本问题的课程安排了如下内容：

(一) 日本资本家势力的抬头；

(二) 日本的工业化及向远东浸透；

(三) 非人的劳动，罢工及镇压，反对战争的活动，社会主义运动及对它的空前大镇压，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四) 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发展；

(五) 经济恐慌及克服对策；

(六) 裁减职工及经济恐慌；

(七) 农业生产衰落及农村危机；

(八) 资产阶级的壮大及阶级斗争的激烈化；

(九) 工人的情况；

(十) 《共产党宣言》；

(十一) 工人为何要组织工会？劳资纠纷与抗议的根由；

(十二) 时事分析；

- (十三) 日本的现状；
- (十四) 国家机构；
- (十五) 枢密院、天皇、重臣、元老、军部；
- (十六) 军部的特权，军部的力量从何而来，军部与财阀，军部内的派系；
- (十七) 内阁、警察、监狱与法院；
- (十八) 时事：苏德战争、太平洋战况、国内问题、印度问题；
- (十九) 财阀与政党（着重讲授政党的历史）；
- (二十) 何谓政党，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特征，政党的兴衰；
- (二十一)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 (二十二) 日本法西斯发展的历程；
- (二十三) 大政翼赞会、联保组织、日本人民的生活；
- (二十四) 日本法西斯为日本及亚洲的人民干了些什么？法西斯主义给日本军部及大财阀一些什么？何谓法西斯军部？
- (二十五)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弱点，怎样打倒法西斯。

到 1943 年，由于学员不断增加，学校鉴于学员们年龄、阅历、入校时间及文化、政治水准的差异，遂将学员分编为 A、B、C 三个组，依据各类小组的具体情况，进行切合实际的教学。A 组，主要是新近入校的学员，这一组的教师为老学员梅田，教育内容是初步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讲由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解剖。B 组，是

由较之 A 组程度稍高一些学员组成的，他们大部分来到八路军已有一年之久。其主要课程是学习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问题，教师王学文。C 组，是由文化、政治水平最高者所组成，主要课程为联共（布）党史，教师冈野进。A、B、C 三组的共同课程为：日本问题和时事问题均由冈野进任教。A、B 两组学员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后，即可转入更高一级进行学习。为了使教学更加切合学员的具体状况和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在教学内容上也作了必要的变动。1943 年日本工农学校的课程安排又有如下变动：

（一）社会发展史。主讲人：赵安博（1——4 月）、梅田（9——12 月）。

（二）联共（布）党史。主讲人：林哲（结合党史读书会与大型党史讨论会进行）。

（三）日本问题及时事问题。主讲人：林哲、高山。

（四）修养讲座。主讲人：李初犁、森健、江右书。

（五）中国话与自然科学。主讲人：王斐、任。

（六）政治经济学。主讲人：王学文。

（七）其他。（1）中国革命史讲话，江右书讲；（2）告日本国民书，读书讨论会学习；（3）关于战争问题的报告，冈野进讲（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解体后，林哲公开身分，始改用在莫斯科时的曾用名——冈野进）。

其中修养讲座，就是根据当时部分新学员身上表现出的不良倾向（如轻视中国人、闹不团结等）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开展整风运动的新的政治形势而增设的。（在整

风中，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工是自愿参加的，但整风文件是统一学习的)。它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二) 思想意识的阶级性；

(三) 无产阶级的人生观；

(四) 思想认识必须取得一致；

(五) 什么是个人主义？怎样去克服它？

(六) 个人出身带来的思想意识特点：(1) 农民意识；(2) 商人习性；(3) 流氓习气；(4) 小资产阶级空想；(5) 工人的品质。

(七) 何谓“三风”；

(八) 主观主义：(1) 教条主义；(2) 经验主义；(3) 怎样克服主观主义？

(九) 宗派主义：(1)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2) 个人与党的关系；(3) 外地干部与当地干部的关系；(4) 部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5) 部门和部门间的关系；(6) 新老干部的关系；(7) 对党外的宗派主义；(8) 一切宗派主义都是主观主义。

(十) 我们的修养：(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2) 思想意识的修养；(3) 团结；(4) 斗争方法的锻炼；(5) 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6) 克服困难的锻炼；(7) 工作方法的锻炼；(8) 态度的修养。

(十一) 怎样进行修养锻炼；(1) 自我批评；(2) 批评。

通过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学员们了解了日本帝国主

义的内政外交动向与国际形势，认识了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和必然失败的命运，明确了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使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

4、各种辅助教学活动

为了帮助学员更加深刻、全面地对课堂所讲授知识的理解，促进思想转化，日本工农学校还组织学员在课外开展了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活动，如举行各种问题的讨论会、报告会和纪念会等。讨论会的形式分为多种，有“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及“读书会”等，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最为广泛。各种讨论会都以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促进思想转化为目的。讨论的内容都与学校教学及革命斗争的实际、国际形势等紧密配合，如“日本军队的内幕”、“劳动者努力工作为何贫困？”“八路军和日本军的比较”、“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为什么说日本军部是亚洲和日本人民的敌人？”“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是怎样产生的？”“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为什么说法西斯主义是脆弱的？怎样打倒它？”等等。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所学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了思想认识。为了加深理解和记忆，学校还举行了纪念会、报告会和讲演会。如“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纪念日本革命先烈的“三一五”惨案报告会、“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战争与美术”报告会、“苏联情形”报告会以及国际形势、战争问

题等报告会。

另外，还有抄读会和研究会。抄读会和研究会所研究内容与讨论会相似，不过它是学员为加强对课堂知识的学习和对有关问题的深入探讨，自己组织的学习和研究的形式。它研究的内容较为广泛，但主要是配合课堂教学和转化学员思想而进行的。

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使学员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懂得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资本主义由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必然性，明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本质区别，看清了日本法西斯欺骗和驱使劳动人民为其发动侵略战争充当炮灰的罪恶目的与失败的必然性，寻找到了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明确了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从而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质变。如学员初进校时，问他们“中日战争的原因是什么？”答：“中国做列强的走狗，日本为了自卫。”或“为了消灭赤化！”“为了圣战！”问：“日本和中国战争的目的是什么？”答：“使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使中国变成皇道乐土。”而在通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后，再问他们“你希望中日战争怎样结束？”答：“日本无条件的全部从中国领土上撤退。”或“日本进行战争的政府倒台！”“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把日军从中国赶出去。”问：“毕业之后你打算怎样呢？”答：“做革命工作。”或“到前线去，和八路军在一起。”许多学员还坚决表示，在修完学校的课程之后，“为了早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在日本建立和平、民主主义的人民政府，将要发挥最大的努力。”“就使是未全部完成学业，只要需要，不论何时，都有决心和八路军官兵肩并肩，同共同的敌人进行战斗。”学员大谷正在《我的转变》一文中这样写道：“过去仇视中国，愿为日本帝国主义牺牲一切的我，现在愿意这样宣誓：由于我正确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1941年10月26日，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曾在宝塔山顶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日本工农学校的6名学员，参加了八路军，并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决心为打倒“天皇”和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到底。至1942年6月，日本工农学校已有35名学员加入了八路军。

5、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仅十分注重学员的政治理论学习，而且相当注意丰富与活跃学员的课外生活，把它看成是促进学员思想转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根据学员的爱好与特点，开展了体育比赛、游艺、棋类、唱歌和参观等文体活动。为活跃生活，增强学员体质，每天早晨都要组织学员做军队式体操，每星期还有一天体育日。在体育日，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自己喜爱的体育活动，如棒球、排球及其他运动的竞赛。在学校内，还组织了延安唯一的棒球队。每逢节假日或革命纪念日，学校还组织学员举行各种游艺会，由学员们表演短剧、相声、魔术、唱

歌、口琴、笛子等文艺节目。为了照顾学员的爱好和习惯，学校还设立了俱乐部，在俱乐部内备有麻将、扑克、花牌、围棋、将棋（日本棋）等娱乐工具。规定每月举行一次竞赛，对优胜者给予奖赏。在平时，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学习中国的流行歌曲，同时也教唱学员自己创作的日本反战歌曲。在春秋两季，还组织学员到延安郊外、各机关、工厂和学校参观，以加强对边区的了解和活跃学员生活。由于学校注重了文体生活的开展，使学员们的生活丰富多采，活泼愉快。

学员们课外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读书。他们在努力学好规定课程的同时，还利用课外时间阅读各种图书，以增加、充实自己的理论和文化知识，扩展视野。仅1944年上半年，该校学员就在图书室借阅理论书籍81册，文艺及其他书籍37册。下半年又借阅理论书籍88册，文艺及其他书籍76册，全年共借阅各种书籍282册。

6、教学活动的补充——墙报

为了宣传时（事）政（治），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学校还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了墙报和壁报，刊登时事新闻和学员的学习心得以及对生活、时事的感受。

通过这些宣传和教育形式，不仅促进了学员们思想觉悟的提高，而且促进了学员们的工作和学习，同时锻炼、提高了学员的写作水平。因此，也可以说它是日本工农学校教学活动的的一个补充。

六、反战宣传和活动

日本工农学校不仅是一所教育、改造日俘的学校，也是延安日人反战活动的组织和领导机关，同时也是华北日人反战活动的总指挥部。日本工农学校教育、培养了一批日人反战战士，他们在延安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支部及本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支部等。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积极的反战宣传和活动。如举办了每月两次的壁报，编辑、出版了月刊《士兵之友》和每周两次的对日广播。通过报导有关时事问题、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报道日军士兵、侨民及日本国内的情况，向日本广大士兵和国内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宣传。为了向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1944年2月，日本工农学校举行了“日军暴行座谈会”，用大量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实质和罪行。1944年6月，日本工农学校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办了展览会，利用大量图表、照片、漫画和模型等，以日军士兵生活日渐恶化、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的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腐败的本质及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这个展览会仅展出的东西就有数千件，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毛泽东一连看了三次，并在展览会的留言簿上写道：“看了展览会，学到很多东西，展出的东西很好、很有秩序、很系统。”为了加强反战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学员们在校

学习的同时，还帮助八路军编写标语传单；出版各种日文教科书和宣传品；为八路军教日语等。“1943年发行传单32种，小册子及教科书14种，以上总字数达52万字。”一些学员还被抽调到边区印刷厂担任日文印刷等工作。学员们毕业后，分赴各条战线进行抗日工作。有的直接奔赴前线，如以学员小林为首的赴晋西北敌军工作团，就是日本工农学校派去的，还有学员高山、沈泽等也都率领学员奔赴前线工作。

日本工农学校不仅教育、改造了一大批日俘，而且通过他们争取了大批日军士兵脱离反动军队，加入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来，形成了一支反对侵略战争、瓦解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华北、华中组织了各种反战团体，开展了积极的反战活动。而这些反战组织，如：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日人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等组织，不但总部都设在延安，而且其主要负责人也都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仅组织和领导了在华日人的各种反战活动，而且一些重大活动，如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及1944年在延安召开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行委员会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和解放联盟的成立等重大活动，都是由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具体组织和筹办。因此，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实际上成为在华日人反战活动的总指挥部。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和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成员，还积极开展反战和瓦解敌军

的工作。如在我武装人员掩护下，深入到敌军堡垒附近，喊话、打电话，揭露日军暴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鼓动日军士兵尽快结束罪恶生涯，投向光明；并利用向日军士兵大量赠送装有生活用品和宣传品的慰问袋的形式，宣传反战、瓦解敌军，联络感情；逢年、节或日本樱花会之际，大量散发的完全日本风味的贺信片和慰问信等，更在瓦解敌军工作中发挥极为特殊的作用。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许多日本士兵纷纷起来与官长们的暴虐行为作斗争，有的甚至携械投诚八路军。使敌军士气低落，矛盾频起，自杀与逃亡事件屡次发生。许多日军士兵还来信感谢我们赠送慰问袋，并探听八路军及日人反战组织的情况，表示愿意和我们通信。日人反战组织的这些活动，引起了日军将校们的极端恐慌，他们说：“中国的反战文书，真是动摇了士兵的思想，指挥也困难起来了。”“中国军与武力战并行的思想战，其巧妙令人佩服。”随着我频繁的军事打击和敌军工作的加强，日军战俘及自动投诚者迅速增多。为了加强对日俘的教育、争取工作，1943年在晋西北、1944年10月山东，分别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分校。后山东总分校又创办了鲁中、鲁南和渤海等分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便抽派茂田江、小林等几位学员前往主持工作，担当起教育、培养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革命战士的光荣任务。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不仅在反侵略战争中是一支争取、瓦解敌军的重要力量，而且在边区建设上，也是一支重要

力量。为了保卫边区，打退日寇和国民党的进攻，1942年他们自动组织了以大山光美为大队长、中小路静男为副大队长、森健为政治委员的边区日人自卫军，他们庄严宣誓：“……边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不愿敌人踏进我们的第二故乡来蹂躏我们的慈母兄弟的一寸土地，我们愿流最后的一滴血，来保卫边区。”^①大生产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根据各单位工作性质的差异，实行了政府拨发其必须经费的一半或1/3，其余都由自己生产解决的规定，因此，延安各机关、学校均参加了生产劳动。而唯独免除了医院、保育院和日本工农学校的生产任务。这是我党从学员们的学习、身体和习惯等具体情况出发，作出的特殊规定。但学员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动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于1944年春，分别组织了农业、纺线、木工和玩具等劳动小组，投入生产。春季他们计划劳动时间占工作学习总时间的比例为5%，但至夏季已达到18%。这年农业组种地90亩，种菜15亩。除开荒生产外，他们还利用晚上时间进行纺线。有一个女学员一天就纺了6两头等线（1小时6钱），10几个学员到5月底纺毛线80斤零13两（旧制16两为1斤），棉纱34斤9两。木工组做纺车103辆，倒线车1个，倒线拐子15个，木桶14只。并帮助“团结”部合作社做点心、染色。这年学员劳动收入总产值为66石6斗小米。1945年，由于学员激增，原校舍已远远不能满足

^① 见1942年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

需要，学员们又提出“自己的学校，自己动手建设”的口号，自动组织了打窑、石工、木工和泥水工等组进行建校活动，扩充了校舍。同年，学员们还与南寨砭群众、边区测量队合伙打成水井一口。

七、踏上新的征程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延安时，久已守候在电台旁的学员们顿时欢腾起来，他们纷纷要求跟随八路军上前线，协助八路军解除日伪武装。该校300余名学员在经过半个月的热烈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于1945年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军委总部大礼堂，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支部、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本部、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支部等5个单位，举行了出发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除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师生外，还有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敌工部副部长李初犁以及美国友人等。大会首先由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议长杉本对几年来解放联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发展史作了总结，指出解放联盟在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部斗争中的贡献是民主日本建设史上的光辉一页。日本工农学校在教育、培养解放联盟的干部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对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人民的援助表示感谢。还“希望全体同志将解联和工农学校几年来英勇奋斗的精

神和传统带回日本去，继续发扬而光大之。”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冈野进在会上代表即将出发的5个单位感谢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几年来对他们的关怀、援助与培养，并向学员们指出：“谁要是真正下了决心，为日本人民服务，谁就会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冲破一切障碍，坚决勇敢地为建设民主的日本奋斗到底。只有如此，才是报答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唯一方法，也只有在那时，才有资格领得日本工农学校的毕业证书。”叶剑英、李初犁及美国友人也在会上作了热情发言。大会在通过了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致敬信之后，宣告结束。

会后，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全部开赴抗日反攻前线，在完成协助八路军解除日伪武装的任务之后，又返回日本，从此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日本工农学校不仅从侵略军营垒中争取到一支反战力量，扩大了国际革命统一战线，而且培育了一批为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革命干部，在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它将一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顽固战俘教育、改造成坚强的革命战士，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是极为鲜见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堪称一个成功的创举，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谋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远大目标的国际主义立场。

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策动与夭折

张 培 林

继 1939 年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 1940 年 1 月发动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又于 1943 年春夏，大作反对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舆论宣传，并调集数十万大军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准备举兵闪击延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抓住时机，发动了强有力的宣传反击，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终于制止了这次反共高潮。

(一)

1943 年春，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迫使希特勒停止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成为苏德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欧洲法西斯及日本帝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在国内，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已胜利地度过了 1941 年到 1942 年的严重困难，逐步恢复和扩大，局部地区业已开始对日反攻，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力量再度进入上升阶段。陕甘宁边区，也打破了国民党

的经济封锁，基本上实现了“丰衣足食、耕三余一”的目标，新民主主义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巩固。这无疑成为蒋介石攫取抗战胜利果实的严重障碍，所以他急迫的对陕甘宁边区策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3月3日，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及其军队。5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国际斗争新形势的需要，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蒋视此为取消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的天赐良机，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提出所谓国家统一的口号，污蔑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要求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主要是CC特务参加的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侈谈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打击、解散中共之必要。宣读事先拟就的给毛泽东的电文，提出所谓第三国际解散系为加强盟国团结，中共亦应解散，交出边区，以加强中国的团结。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竟对这一破坏团结、假造民意的所谓会议大肆宣传报道，称：会议“决定联名请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产组织，放弃边区割据。”此外，顽固派还在全国各地策动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印发所谓告边区父老书，造谣说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已被革职，挑拨人民群众与共产党的关系。这些煽动性的舆论宣传，显然是军事进攻的舆论准备。

早在2月，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即以绝密件向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即按此计划部署兵力。5月初，该部参谋处炮制了进攻边区的作战命令与计划。随之，重庆方面指示胡宗南：“如有军事行动，即按既定计划歼灭之”（指歼灭共产党领导之军队）。胡即令五十三师由韩城河防开赴洛川，接替暂骑二师防务，暂骑二师于17日集结耀县；当天，五十三师一部开郿县，抢占阵地，强拉民伕，修筑碉堡，埋置地雷，抢劫财物，捕杀边区乡干部。一六七师由河防开至邠县，赶运粮弹补充宜川、洛川、中部、宜君一带部队，并调查边区地形、工事、粮食、交通情形。还将淳化、耀县、栒邑、三原一带的10个营编为警备师，归属陕西保安系统。并调动工兵、炮兵等一批特种部队开至边区南线。23日，胡向蒋介石呈报具体作战计划，共分三期：第一期以陶峙岳、范汉杰分任总司令，在关中、陇东两地完成攻防准备，实行封锁；第二期加强关中地区实力，“收复”囊形地带；第三期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请派空军及二战区协助，“收复”马栏、关中、陇东全部。在此前后，蒋介石曾密电胡宗南：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当

时内定由三十八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三十七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后因三十八军镇压甘肃民众自发武装未能抽身，蒋遂令胡抽调三十四集团军所属第一军和九十军负责攻占囊形地带）。为避免过早暴露意图，胡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少量先遣人员，在大部队发起进攻前两日，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并预定7月9日为进攻日期。在此期间，边区西线北达三边，南至淳耀这一半月形地带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有增无减，陇东方面尤甚。

6月，情势更加紧张。国民党各部队频繁调动，辎重相继向洛川方向集结。9、10两日，胡宗南随1日到西安的何应钦、白崇禧赴耀县开作战会议。15日点验新二十七师及一六五师。18日，复随同陶峙岳、九十军军长李文及六十一师师长邓钟梅、暂二十五师师长刘英、新三十七师师长徐保等北上洛川，召开师级以上指挥官军事会议，决定调动抵御日军的部分河防军队，连同原有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约50万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日，第一野战军医院开赴洛川，九十军对八路军作战计划亦携至洛川交胡宗南。

到7月初，除原驻边区周围担任封锁的军队早已积极准备进攻外，又从抗日河防调至边区周围的部队有：第一军主力七十八师、一六七师，第九十军二十八师、五十三师，第五十七军第八师，第十六军重炮营，驻西安之炮兵旅等，赶赴固原、平凉、长武、邠县（今作彬县）、枸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洛川、宜川一线，使陈置于边

区周围的兵力，一时间竟达 20 余个师，尚有大批军队待命出动。千里河防仅剩第一师、预一师、预三师、一〇九师、暂二十五师等 5 个师兵力。咸榆公路、西兰公路、陇海铁路上兵车运输则络绎不绝。还在与边区接壤地区，新建飞机场、油弹储备库多处。陶峙岳也于 7 月 2 日限令各军于 8 日准备完毕，听候胡宗南手令动作。至此，无论是将河防部队大部撤出陈置于边区周围，还是辘重部队的配属、兵站的开设、通讯联络的调整、部队必需品的调补、战前教育的实施，都是空前的，表明反共军事部署已全部就绪。7 月 4 日，国民党一个营攻打郿县（今改富县）峪口村；7 日夜，一六五师炮击八路军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落弹 20 余发。此时，内战危机，已是一触即发。

（二）

在国民党军队欲闪击延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假如祸起萧墙，箕豆相煎，则中国人民 6 年浴血奋战创立的抗战大业必将功亏一篑。从民族大义出发，必须制止内战，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为此就要与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5 月 13 日，朱德致电傅作义，指出陈长捷、何文鼎率部南下，迫近八路军防区，“难免引起不幸事件，实于团结抗战大相妨碍”，要求予以制止。6 月中下旬邓宝珊途经延

安，毛泽东多次与之晤谈，针对蒋介石正在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阐述了中共政策，并希望邓给予合作。7月3、4两日，毛泽东又连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令转行将由渝抵西安的周恩来“就近向胡（宗南）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9日，周恩来抵西安，立即研究多方情况，至13日，分别会见了胡宗南、熊斌、邓宝珊、孙蔚如、彭昭贤，胡公冕等人，反复申明中共立场，并向中央提供胡的军事动态。4、6两日，朱德分别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揭露他们的内战阴谋，疾呼团结，避免内战，告诫他们：“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团结抗战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妨碍盟邦”。6日，肖劲光致电陈置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各将领，指出国内政治问题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企图采取闪击方式以压服共产党，绝无可能。9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抗议南线蒋军炮击关中分区，并指出有分9路进攻边区讯，请予制止。

边区各行业、群众团体纷纷发通电，各新闻媒介连日刊载专论、社论、时评，公开揭露、谴责蒋的内战阴谋，形成了来自边区内部强大舆论攻势，仅《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就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秦邦宪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以及社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

传》、《质问国民党》（毛泽东撰写）；边区抗敌联合会《为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告全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书》，《延安民众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等。对国民党顽固派取消边区、解散共产党的谰言予以痛斥，敦促蒋、胡命令军队返回原防，避免内战；忠告那些接受密令，准备内战的官兵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不要枪口对内。毛泽东更以典故“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劝告国民党立即撤退边区周围大军，开赴抗日前线，与中共一道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周恩来、董必武也多次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交谈，揭露蒋介石以陕甘宁边区为重心，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呼吁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制止内战。

中国共产党同时致力于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7月4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战事有于数日内爆发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你立即将此消息同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愈快愈妙”。5日，驻渝外国人士同时收到朱德的电函。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伟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纷纷起而质问部长张道藩。英美苏各国大使亦紧急开会，研究中国时局。他们唯恐一旦国共破裂，日军将从中国脱身，直接影响到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因而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美苏等国内舆论也纷纷著文，抨击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独裁政治。苏联中国问题专家罗果夫发表《中国内战的可能

性》、《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等文，揭露“中国之失败主义者准备投降与企图发动政治阴谋，即发动内战”。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冈野进也指示留延日人一致参加保卫边区的斗争。7月9日，中共中央又指示董必武：速将“七七”宣言、朱德致蒋、胡通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的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秘密印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派、文化人士，并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

边区留守部队也紧急动员秣马厉兵，开赴边界，严阵以待。兵力部署大体为：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分区、三五九旅驻防延属分区、警一旅驻防关中分区、警三旅驻防三边分区。对于肆意挑衅、制造事端者给予适度的军事上的打击。6月12日，国民党一骑兵团侵占关中柳林南之陈村，并向让马村进犯，兴修工事。八路军驻军即予以迎头痛击，俘其数名官兵。但为避免事态扩大，以利团结，随即将人枪退还。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边区各阶层、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则紧急动员起来，准备武装保卫边区，自卫还击一切挑衅和进攻。7月9日，延安各界举行了万余人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朱德、贺龙、林伯渠等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各分区、县、各系统亦纷纷开会动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边区的阴谋，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大计及保卫边区的办法。地处黄河之滨的神府分区党委还就保卫神府，打击顽固派

的进攻发出了紧急动员指示。

边区南线各县民众积极参加并设法筹集武器，均建立了脱产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基于自卫队扩大20%，人人有武器；普通自卫军扩大10%，均有刀矛、土枪等。中直、军直、边直等各机关学校工厂也成立了自卫军。他们积极进行侦察、引路、送信、清查户口、警戒、盘查捉拿坏人等治安保卫工作，并加紧战斗训练。

为保证前线部队的粮食供给，动员一开始，政府即进行夏粮征购。虽然产麦区夏粮歉收，却比往年完成得快。郿县、甘泉两县4100石公粮15天全部入仓；关中分区5县10天完成8000余石任务；同宜耀1200石粮食8天全部入仓，该县边境区布置当天全数入仓。

各级政府、民众为部队炒干粮，做军鞋，捐现金，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为上前线的军队代耕，为参战部队送食物。郿县群众不到5天自动送柴22万斤、菜3万斤；张村驿一夜动员120头牲口帮军队运输；甘泉县3天做军鞋1000双；郿县、甘泉群众7天为军队炒干粮10万斤。延安中直、边直各机关、各界争相捐薪金、食物、日用品，集市商民仅半小时就捐物资约值10万余元边币。

7月4日，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通报“胡进攻边区之部队已经集结完毕，部队的动员、粮弹的准备，均已完成，只须待命进攻，胡将河防部队大部撤出置于边区周围，这是历来所未有。”8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

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各地响应延安的宣传，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给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顽固派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消息不胫而走，激起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义愤。各地根据中央指示立即行动。13日，晋察冀边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各界民众大会，并发出通电；一二〇师全体官兵、晋冀鲁豫文化界也分别发出通电。15日，太行2万军民举行声援边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示威大会。广大民主人士也群起谴责。如国民党元老、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等人，通电全国，呼吁“发动舆论，制止内战，挽此危局”。并致电林森、蒋介石，要求立即制止内战，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部队，枪口一致对外。

(三)

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计划已定，而大部队尚未就位时，采取了一系列反击性措施，在国内外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使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特别是朱德对国民党的通电中“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更是击中要害，从而在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运动，使蒋介石顽固派四面楚歌，政治上极端孤立。又由于边区军民紧急动员，全力投入战斗准备，准备给来犯者

以沉重打击。这样，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使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得不暂时搁置进攻计划，于7月10日，令胡停止行动；11日，蒋、胡均复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边区，说是误会；12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14日，九十军军部由孙家沟一带返回韩城竹园村；15日，暂二十四师、二十六师由前线撤至邠县县城集训；17日，第一军直属队由兴平返华县；18日，二十八师由石益镇退回郃阳南和堡；23日，七十八师由邠县返赤水；六十一师返薛家坪。至此，第三次反共高潮偃旗息鼓，内战危机逐步缓和。8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正如毛泽东在这年7月13日给山西前线的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指出的，“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应该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关键点。

天津郊区的土改运动及 对全国的影响

徐 行

解放初期天津郊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开展较早、情况复杂、政策特殊以及显著的成就，构成了全国土改运动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大城市郊区及全国的土改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

解放初期的天津所辖郊区的范围比现在要小，计有 67 个自然村（合并为 36 个行政村），共 156312 亩土地，津郊四周为河北省所辖天津县地域。土改前，津郊农村有几个突出特点：

其一，阶级成份错综复杂。当时津郊人口共约 143200 人，纯农业人口为 49005 人，农民只占全郊区人口 30% 左右，其阶级状况较一般农村复杂得多。属剥削阶级的有地主（包括经营地主）、富农、农业资本家、高利贷主等，属

被剥削阶级的有雇农、贫下中农、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等等。不论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兼业情况都相当普遍，郊区的农民往往同时又是小手工业者、小商贩、临时工，而地主往往又兼营运输业、工商业兼高利贷主。纵观当时津郊阶级构成的特点是：纯地主富农少，中农亦少，贫农也不占多数，而占多数的是农民兼商贩和小手工业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城郊农村正处于向城市转化过程中。

其二，土地占有的多样化。与其他农村一样，解放前津郊土地占有极度不合理，占人口 11.2% 的剥削阶级占地 70% 以上，而占人口 88.8% 的被剥削阶级耕地不足 30%；与其他农村不同的是，津郊土地并不仅仅集中于地主富农之手，而是被形形色色的剥削者分割侵吞了。官僚、买办、旧军阀、资本家、封建慈善团体、教堂都在津郊霸占了大片良田沃土，据统计英法等 19 国共占津郊土地 4460 余亩。此外，同乡会馆、清真寺、私立学校也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土地占有的多样化，又导致了其使用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

其三，剥削手段狠毒、层次繁多。津郊地主放租常用“死租”（即预付地租）和“活租”两种形式。死租在种地前半年交，地租额按一般收成定（约为 50%），不论水、旱、虫灾照收不误。活租又叫“三大堆”，即收获后分三堆，地主取一，农民取二。按此推算，地主剥削率在 30% 以上。不仅如此，津郊农民还要受到城里商业资本家、高利贷主、经

营地主及反动政府的层层盘剥，因此所受剥削程度较一般农村更为严重。

除此而外，津郊农村与全国同类城郊相比，面积较小，人口稠密，这样，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愈显突出。

上述特点，造成了津郊各种矛盾的激化，大量自耕农纷纷破产，劳动人民贫困不堪，急切盼望着推翻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二)

天津郊区的土改与天津县的土改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费时较长，先后进行了三次才最后完成。

(一) 近郊第一次土改

当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火正旺，中央尚无暇对大城市郊区工作做统一布置，而津郊迫切的土地问题又急需解决。鉴于当时市郊情况复杂，春耕又已临近，如大张旗鼓，势必延长时日，影响生产，因此只能没收一部分剥削程度较高的大地主的财产，以免影响生产的迅速恢复。

1949年3月，天津市委、市政府抽调30多名干部，以民政局为主组成土改工作团，分七个组深入农村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天津军管会于3月28日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市郊农田土地问题暂行解决办法的决定》。该决定共14条，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所有土地，废除二地主中间剥

削；富农自营土地不动，出租土地征收；凡用机器耕作之农田不动，雇工待遇须予改善；没收征收之地归政府所有，继续由农民耕种。此决定公布执行两周后，市政府根据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做了若干修改、补充，又以人民政府名义发布了《各区土地问题解决办法》，改原规定“全部没收地主所有土地”为“出租土地全部没收，雇工耕种部分不动”，另补充了工商业用地、国民党政府征地、预付地租等问题的处理措施。

两个文件发出后，津郊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土改高潮。市政府派出工作团直接领导了这场运动，步骤按调查登记、评定成份（群众评议、政府批准、张榜公布）、陆续分租等项依次进行；方法是通过小组会诉苦、讲政策和宣传法令，启发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斗争。经土改工作团的努力，津郊农村于3月底完成了调查登记，在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农民土地委员会。接着，又于4月初进入评议阶段，为加快进度，采取了陆续评议、陆续上报区、市两级政府审批的方法，以公告方式公布地富成份名单及对其土地的处理。分租工作也于4月底开始，因郊区人多地少，村干部说服暂能维持生活者自动让予特困户，实行少地者少分，无地者多分，够种不给的方法，并对烈军属适当照顾。

到同年6月，津郊第一次土改基本结束，共没收了209户地主的土地31877亩；另征收了36户富农的多余土地1262亩、还没收其他各类剥削者土地29628亩，共计土地62767亩、占郊区土地总数40%强。市政府还发放了3553

万元农业贷款，有重点地扶助新分到土地的农民发展生产，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工作复杂，这次土改遗留问题很多，如经营地主雇工耕种之土地仍未没收、中小地主漏划不少、若干特殊占地问题（教堂、寺庙、族田、公共社团土地）等，皆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二）第二次土改

第一次土改过后，天津市长黄敬，副市长刘秀峰联名向周总理写报告汇报了春季土改情况并请示特殊土地问题处理办法。1949年12月7日，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军管会根据华北局发出的《新区今冬明春完成土改的指示》，作出了《关于解决市郊农田土地遗留问题的决定》，决定趁冬季农闲时间，彻底解决津郊土地问题，并决定组成新的工作团，分三步完成土改。

第一步，深入调查，先搞试点。1950年1月5日工作团分赴七个试点村，了解去春土改情况，充实农民土地委员会，着手解决遗留问题，创造经验，以便推广。

第二步，拟定具体方案，各村全面铺开。1950年1月13日政务院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对天津工作予以肯定，并规定了解决市郊土地问题的13条方针。为贯彻政务院指示，2月13日天津市政府作出了《今年春耕前完成土改的决定》，该决定并于10天后被中央批准。为落实这一决定，由市民政局等11个单位抽调人员，参加八所大学的140名师

生，充实扩大了天津土改工作团。全体团员集中学习政策后，分赴各村开始工作。3月10日天津市政府又拟定了《关于解决市郊农田土地遗留问题的补充决定》，该决定及附件经政务院批复：“基本同意，准如拟办理”，成为津郊第二次土改明确的政策依据。由于准备充分，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到3月中下旬全郊区土改工作基本结束，共判定地富400多户，没收土地4万余亩。

第三步，征收地主多余房屋。所谓多余房屋，系指地主出租及空闲房屋和地基。天津市政府于4月10日颁发了《关于处理市郊地主房屋的指示》，确定与市区毗邻村庄的地主房屋不动，离市区较远的征收，所收之地主房屋归政府所有，先留作公用，尔后分给无房少房的农民。经两个月努力，远郊28村地主多余房屋征收工作胜利完成，共征收各类房屋1993间，并征收房基地119亩。

两次土改后，津郊封建的生产关系基本被摧毁，郊区各阶层劳动人民计40271人，共分得土地50170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初步得到了改变。

（三）“土改补课”

1952年4月，天津县划归天津市。原天津县虽搞过土改，但由于在一些边远、偏僻村进行得不彻底，影响了这些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因此，天津市委决定在1954年底到1955年初，集中解决落后村土改时漏划地富及镇反中漏掉的反革命的问题，对内称“土改补课”，对外叫“改造落后村运动”。

1955年1月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土改补课”办公室，抽调各区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各落后村，清查、处理了一批漏划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并结合改造落后村整顿了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到同年2月底，“土改补课”工作基本结束，共处理漏划地、富等1370户，没收、征收土地47270亩。通过“补课”较彻底地清除了封建残余势力，扫除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的障碍，至此，津郊土改运动胜利结束。

(三)

土地改革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天津政治、经济的发展。

首先，大大促进了郊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津郊土改的胜利完成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密切结合起来，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土改后的农民起早贪黑，精耕细作，农事活动提前许多，施肥量亦大大增加。因此，解放后津郊虽屡遭天灾，但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逐年增长，1949年天津粮食总产量46551万斤，1950年提高到72551万斤。1952年则达到111705万斤。

除粮食外，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明显增长，1949年津郊蔬菜总产量为2337万斤，1950年提高到40595万斤，增长幅度达73.95%。闻名全国的小站稻1949年总产量为

9137 万斤，1952 年达到 15717 万斤，增长了 72.01%。经过土改斗争，农民政治觉悟亦显著提高，这就为以后津郊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土改的胜利完成对市区工商业改造和经济发展也影响很大。津郊土改中实行的保护农村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大大有利于市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天津市市区与郊区的经济、政治联系十分密切，许多地主在城里有企业，许多资本家又在农村有土地。对此，市政府在制定土改政策时特别强调在郊区凡工商业所需用地均不没收，田里有先进设备的亦予保护。由于津郊土改中严格区分了没收与保护的界线，斗争地主时又认真执行了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使城里的资本家放了心，对共产党的信任大大增加了。1956 年天津工商业改造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胜利完成，这与此前天津郊区土改政策搞得较好不能说没有关系。

由于郊区经济是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郊区工作的好坏对市区有直接影响。津郊土改的胜利完成使津郊农业生产飞速发展，这便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的日趋活跃，促进了市区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津郊土改中所实行的土地国有政策，也适应了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解放以来市政府在近郊兴建了不少新工业区和住宅区，而扩建工作在征地时较为顺利，这与津郊土改时地权政策的正确制订和实施也可以说有一定的关系。任何事情都不会尽善尽美，津郊土改的杰出成绩固然不可忽视，但整个运动

中也确有不足之处，如工作中曾照搬老解放区经验，犯了一些“左”的毛病、运动中有过急过粗的现象等等。不过，这些偏差同其成绩和重大影响相比，则是次要的了。

(四)

津郊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老解放区比进行得不算很早，但就全国大城市郊区来说，还是走在了前面的。1949年春，津郊开始土改时全国许多大城市尚未解放；同年底，津郊第一次土改已告结束，而全国仍有3亿人口的地区土改工作尚未展开。鉴此，天津土改为国内其他大城市郊区的土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50年1月13日政务院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这是中央第一次对城市郊区土改工作做出明确指示，这个指示是参照天津和北京两大城市的土改经验制定的。其说明中提到：“由于城市郊区在经济上与市区有密切联系，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解决城市郊区土地问题又必须考虑到建设城市与发展工业的需要，故郊区的土地改革应与农村的土地改革有若干区别，兹参照京津两市的若干经验，规定城市郊区土地政策若干办法如下。”北京解放比天津晚，土地改革也比天津晚。北京土改前的情况、土改的过程和经验大致与天津同，但比天津迟了六七个月。政务院指示中关于地权政策、没收与分配的政策均与天津郊区土改中制定实行的政策相吻

合，继天津以后解放的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成都等大城市，虽然情况各异，但关于城郊土改的一些主要政策都是依据政务院指示进行的，天津郊区的土改为中央制定大城市市郊的土改政策提供了经验和依据，从而也就间接地影响了其他城市的土改运动。

在天津土改经验中有别于一般农村的政策、方法主要有五点：

其一，地权上：土改后土地归国家所有，而非农民私有。农民只予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只发土地使用证，不发土地所有证。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适应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的需要。

其二，没收上：区别对待，酌情变更原有政策。根据津郊复杂情况，没收地主土地和没收其房屋财产分两步进行。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土地，对其雇工耕种部分不动，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对特殊土地（如工商业用地、宗教团体占地、外国人占地、会馆、坟地等，则分别予以没收或保留。制订和实行这些政策，是从当时全国尚未解放、春耕又已迫近的客观情况出发，考虑和决策的结果。

其三，土地分配上：没有采取平分政策而采取了统一分配政策。津郊人多地少，需要统筹兼顾，不能象一般农村那样打乱平分，于是采取了在照顾原佃原种情况下，由政府统一分配的政策。具体方法是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好坏搭配，优待军烈属及最贫困户。

其四，成份评定上，采取了划一头或划两头的办法。津

郊没有象一般农村那样普遍划成份，只划了地主及其他应处理土地户，或再把应分土地户划一下。这样做一是为节省时间，迅速恢复生产；二是由于郊区纯农民较少，暂不宜将中农、贫农划开，统称农民可更广泛地团结群众。但地富必须划出来，以期土改时变而不乱，其他阶层不致恐慌。

其五，关于土改的基层组织：没有成立农会，只成立了农民土地委员会。这样做仍是基于郊区兼业复杂、纯农业人口较少的情况考虑的，这种组织形式是群众选举和政府聘定结合产生的，在土改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上述区别于一般农村土改的独特做法，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天津及北京在中央定出统一的城郊土改政策前的勇敢实践，形成了独特的京津经验，为政务院制定全国大城市郊区的土改政策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而贯穿于津郊土改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如加强党的领导、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等）至今仍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新中国反封锁、反禁运史实述略

林 谷 良

1950年12月,美国杜鲁门政府借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侵略,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从那时起直到1971年4月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结束美中两国之间禁止贸易法令的20年间,围绕禁运与反禁运、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严重政治对抗反映在经贸领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重大斗争。

一、杜鲁门政府反共“遏制政策”溯源

早在二次大战结束前的1945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指出:随着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更多地意识到胜利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但他同时坚信,只有美苏合作,才能建立起巩固而持久的和平。^①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副总统哈里·杜鲁门于当天继任美国总统。在二次大战后的东西方关系上,杜鲁门是奉行“冷战”政策的始作俑者。杜鲁门入主白

^① 转引自《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第167—168页。

官,从称霸全球的战略出发,推翻了罗斯福的对外政策,逐步推行对东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1945年12月,他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声称,“我们所取得的胜利给美国人民加上一个负责领导世界的经常负担。”他宣称必须有“铁拳和强硬的抗议来对付苏联”^①。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所谓“杜鲁门主义”。他要求美国人在全球承担起反对共产主义的义务,公开宣布要对东方共产主义实行“遏制政策”。他宣称杜鲁门主义可以作为对遏制政策的本质的说明,要求国会批准美国政府对发生革命的近东各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政界和杜鲁门本人信奉的信条是:不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赤色分子”取得胜利,都将自然而然地使苏联受益而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曾就此评论道:“杜鲁门主义的反共思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以压倒一切的优势形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② 1947年7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负责人乔治·凯南也提出,必须“在各个不同的经常变化的地理据点和政治基点上,灵活机警地(对苏联)采取反措施。”他号召修筑堡垒,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封锁。

1948年4月,美国杜鲁门政府批准“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以经济“援助”为名,渗入欧洲国

① 转引自《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第172页。

② 富布赖特《跛足巨人》,转引自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第56页。

家,以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并建立反共阵地。其中包括要求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削减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作为先决条件。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相辅相成,构成美国政府反苏反共对外政策的核心,杜鲁门称之为“一个核桃的两半。”

为了在经济上“遏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发起组织“向共产党国家出口统筹委员会”(COCOM,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专门检查和管制西方国家对苏联及其东欧集团的贸易,规定禁止“战略物资”输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禁运货单分为:(1)属于绝对禁运者,如武器和原子物质,称Ⅰ号货单;(2)属于数量管制者,称Ⅱ号货单;(3)属于监视项目者称Ⅲ号货单。先后参加这一组织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挪威、丹麦、卢森堡、西德、加拿大、葡萄牙、希腊、土耳其和日本,以后“巴统”又与澳大利亚、瑞典和瑞士订立了合作协定。”

在亚洲,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公开禁止美国向中共控制的地区运送武器、药品和其他物资。1949年3月,杜鲁门政府批准了一项“对华贸易政策”(NSC41),认为“只有在对华经济关系的领域内,美国才拥有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武器”,拟议中采取的是:对军用物资实行禁运,并对可能转手出口到苏联及北朝鲜的有战略意义的物资予以审查控制,对中国采取较苏联及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小的 A 类物资实行管制。^①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相继占领南京、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后,1949年6月,美国指使蒋介石集团封锁中国一切沿海城市,包括永嘉、宁波、天津、青岛、上海、秦皇岛等,不允许任何商船通过,驶往中国大陆港口的商船不断受到拦截和武器袭击。1949年6月23日晚8时,埃及货船“苏彝士之星号”在长江口被蒋介石集团炮舰轰击,中弹8枚,被迫就地抛锚。次日不得不改驶日本神户。1949年9月5日,美国驻日武装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提议使用美国空军帮助蒋介石集团封锁和摧毁中国大陆沿海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杜鲁门政府采取的政策是“通过孤立进行遏制——这是对付共产党中国的办法之一”,即:“政治上不承认、经济封锁和反对自由世界与大陆之间的几乎一切形式的联系。”^② 杜鲁门政府认为它有必要执行更严厉的经济政策,以便“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在经济上日子不好过”。1949年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上海港及其航路是一危险区域,美国船只不应冒险驶往该地。”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凡把船驶往国民党封锁港口的美国船主,皆可丧失其航行许可证”。1950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了《战略物资管制办法》,被管制的范围包括机器、交通工具、全属制品及化学原料物资等共达600余种,声言:

① 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9页。

② 见《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1958年10月。

凡“战略物资”出口，必须具备许可证。4月，美国务卿艾奇逊在其就对华禁运问题写的一封信中称：原则上同意“应该把共产党中国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来对待，对向该地区出口的控制应与适用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原则相一致。”^①7月17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巴统”对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北朝鲜。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撤废美国货轮驶往新中国的出口许可证，持有人要一律缴回。11月，美国商务部又将“石油及石油产品”列入战略物资正表，至此，美国宣布管制的“战略物资”已由600多种增加到2100多种。

二、美国政府挟制联合国以售其奸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6月27日，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关于武装干涉朝鲜的非法决议，并于7月7日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中愿意“提供军事部队和其他援助的国家将该项部队和其他援助交由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请求美国指派该项部队的司令官”，授权联合国军统一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帜。”^②

由于美国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和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还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地区，直接威胁新

① 富布赖特《跛足巨人》，转引自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第296页。

② 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10—111页。

中国的安全。为了抗击美帝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开赴朝鲜作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12月8日，美国宣布《旧金山执行港口管制法令》，无论何种货物“经由美国口岸转达中国旅顺、大连、香港、澳门者，均须卸下，如要装运，必须特别许可。”在此期间，美国还同英国、荷兰、日本、菲律宾、加拿大以及香港频繁交涉，让它们也参加对新中国封锁的行列。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驶往中国港口。对于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所谓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12月25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决定管制和清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财产，立即冻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美国公私银行的公私存款。

1951年2月1日，五届联大通过了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除号召全世界所有国家与当局对美国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在朝鲜的侵略行动给予一切支持和援助外，还要求成立一个“额外措施委员会”，其“任务是想出措施来补充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专门施行对新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封锁与禁运。参加“额外措施委员会”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

缅甸、加拿大、埃及、法国、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英国、美国、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5月14日，“额外措施委员会”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决议草案，报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即政治委员会）。5月18日，五届联大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非法决议^①。该决议“建议每一个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当局控制下的地区实行禁运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原子弹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有用的物资；确定从它的领土输出的商品中何者属于禁运范围，并实施使禁运办法获得实施的管制；在它的管辖的范围内，使用一切办法防止任何逃避其他国家依本决议实行的货运管制情事；同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此项禁运的目的。”在表决这一决议草案时，投票赞成的国家是：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丹麦、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岛、伊朗、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利比里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南非联邦、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也门和南斯拉夫，还有仍

① 联合国宪章第24条把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责任赋予安全理事会。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为履行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责任而授予安全理事会以特定权力。关于禁运问题属于宪章第七章，第七章的13个条文只提到安理会。没有提到大会，而美国绕开安理会，直接由联合国大会做出禁运决议，显然是违法的。

在联合国窃据中国席位的台湾蒋介石集团。

联合国的非法决议通过以后，“送达联合国会员国和27个非会员国，其中有些是和中国没有任何贸易的。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且积极地实施着。”1951年6月16日，英国答复联合国，英国已采取措施，禁止下列13大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输往或再输往中国”：一，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二，原子能材料和器材；三，石油产品，原油和石油产品；四，运输器材；五，金属、矿物及其制品；六，橡胶及橡胶产品；七，化学品；八，开发矿藏和矿石所用化学品；九，制硝酸用触媒；十，化学和石油工业器材和设备；十一，电子（包括无线电和雷达）器材；十二精确和科学器材；十三，其他……各种机器和附件。1951年7月5日，法国通知联合国，法国政府禁止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品清单种类如下：一，工作母机；二，化学工业（器材和化学制品）；三，石油生产装置及石油产品；四，电气器材；五，工业器材及某些贵重物品；六，空中、铁道、公路及海上运输器材；七，电子器材和精密仪器；八，金属；九，武器和弹药；十，原子研究和生产中使用的器材和产品。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资料称：明确宣布参加对新中国禁运的主要国家除美国外，尚有英国、法国、希腊、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加拿大、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意大利、日本等国和香港地区。

1951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联合国大会5月18日通过的非法决议发表声明指出，“这

个非法决议,赤裸裸地证明美国政府为了挽救其侵略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所遭受的严重失败,正逼迫其帮凶国家拿出更大的赌注投入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对中朝两国人民实行禁运是美国政府企图扩大侵略战争的一个严重步骤”,“美国政府正利用这个……非法决议,破坏世界市场的正常关系,压低某些原料市场价格,以便将这些原料单独占在美国军火商人手中,并操纵这些原料的生产国家的经济命脉。”事实是,美国政府这种损人利己的政策给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带来严重的损害和困难。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仍然以港、澳为基点与中国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 1952 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向中国输入了价值 2770 万美元的中国货物。对此,美国国会于 1951 年 10 月 26 日,通过了《1951 年互相防御援助法案》(即《巴特尔法案》)规定:接受“美援”的国家如将“军械、弹药、战争工具、原子能物质、石油、有战略价值之运输器材,以及用于制造军械、弹药及战争工具之重要性战略性物资”输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就“立即停止供给其全部军事、经济或财政援助。”^① 1952 年 4 月第一届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以后,中国同英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冲破了美国制造的束缚而有所发展。美国便于 1952 年 9 月在“巴统”范围内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作为执行对中

^① 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614 页。

国禁运的专门机构(参加“巴统”“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国有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巴统”所有成员国均享有临时会员资格),还专门制定了封锁中国的“特别货单”,美国并坚持要同日本签署一项秘密双边协定,以使日本的对华贸易管制保持在“巴统”的水平上。

三、杜鲁门政府封锁禁运政策的破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侵略和经济封锁与禁运,曾给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造成了物资供应的严重困难。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自1950年12月4日起停止对美国、日本、加拿大、菲律宾等国的结汇输出,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改用“先进后出”为主的易货贸易方式。1951年1月15日,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为了逐步改变对外贸易上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局面,会议明确提出在尽可能扩大内销、争取在国内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扩大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按照彼此需要,酌量改组生产,以适应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需求。^①1951年5月28日,中央财政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美帝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对我实行禁运案后对各项工作的指示》,指出:“自美帝5月18日操纵联大通过禁运案,对我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后,总的趋势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困难将越来越多,危险将愈来愈大。”根据上述情况,中财委作如下部署:贸易方

^①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38、39页。

向,工作重点将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事实证明,把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是打破美帝封锁、禁运、克服物资供应困难的重大决策。1952年,中国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仅占进出口总额的33.5%,1951年增加到65.4%,1952年又增加到81.3%。“一五”期间,中国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全部进出口贸易的77.7%,其中对苏联的占56.3%。中国进口的成套设备主要是苏联供应的,到1957年底已有67套投入生产。东欧国家也提供了37套成套设备。这些设备对于中国奠定现代大工业的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供应许多重要机械设备和其他物资,如各种工作母机、各种精密大型机械、各种优质钢材、有色金属、电工电讯器材、科学仪器、交通运输器材和大量石油。这些物资都是为美帝封锁而又为我国经济建设所急需的。

由于封锁、禁运,自195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追随者的贸易关系几乎陷于停顿。以中日两国贸易为例,1949年、1950年两国贸易总额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24%)的水平。但从1951年起,由于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对华封锁禁运,中日贸易总额不及日本外贸总额的1%。由此,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联系,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趋缩小,

从而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特别是加剧了美国同一些原料产地国家的矛盾。

英国的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对华贸易。中英两国贸易，1950年曾达到7300万美元。1951年5月，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封锁禁运的政策，当年的对华贸易便下降到3500万美元；1953年对华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率只相当于1938年的1/4。难怪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惊呼，英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已触痛了英国自己。1953年2月，英国通用电器公司经理加美兹在香港说：“我们尽力要求政府取消对中国的出口的限制……因为这样，我们活不下去”。^①

上述事实证明，冲破美国损人利己的政策，要求恢复与扩大对华正常贸易，完全符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这种呼声日益高涨，为中国打破封锁禁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1951年10月27日至28日，各国经济界人士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集会，成立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委员会，其中中国委员4人。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52年4月3日，第一届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以南汉宸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经过全体大会和小组会议的讨论，认为需要改变由美国推行对中国等国封锁、禁运政策所引起的国际经济关系不正常状况。

^① 见《中国建设》1955年2月号，所载冀朝鼎文章，《扩展中英贸易的巨大可能性》。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分别同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芬兰、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尼、巴基斯坦等 10 个国家工商界人士签订了贸易协议，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2.23 亿美元。

莫斯科会议之后，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所发展。同日本促进中日贸易的团体两次签订了贸易协议。1952 年 6 月，中国进出口公司的代表同西德企业界代表在柏林签订了贸易总额为 1.5 亿卢布的民间贸易协定；同年 10 月 23 日，同智利贸易公司签订了中智贸易协议；1953 年 1 月，同埃及签订了“棉花交易合同”。1953 年 6 月 5 日，同法国工商业贸易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贸易总额双方各为 1000 万英镑的贸易协定，同英国工商界签订了贸易总额为 3000 万英镑的商业协议；1953 年 4 月间，比利时贸易代表团到中国签订了价值 10 亿比利时法郎的定货单。截止到 1953 年，新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贸易额比 1952 年增加了 52%，接近 1952 年的水平。至此，美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的政策开始破产。

1953 年 1 月，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继续执行杜鲁门的敌视、孤立和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的封锁和禁运。1953 年上半年，美国政府所遵

循的政策首先是使其“盟国对共产党中国施加经济压力。”^① 虽然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认为完全中断同新中国的经贸关系并非明智之举。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封锁、禁运政策一直遭到它的西方盟国的非议和不满,杜勒斯承认:“美国与它主要盟国间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歧,成为新政府1月间就任以来就遭到的多方面困扰的问题之一。”^②

1953年上半年,朝鲜战争边打边谈。为了增加谈判筹码,美国政府对其盟国收紧“缰绳”。纠集英、法等国强化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措施。1953年3月2日,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发表的关于美国侵朝政策的演说中,提出了把“联合国……加紧(对中国)经济制裁”,以及对朝中方面使用原子弹等内容在内的7项办法,做为可供美国及其盟国扩大朝鲜战争时选择的方案。因此,有1953年3月的美英外长会谈和美法外长会谈。3月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华盛顿会谈。英国方面决定采取新措施“制裁”中国,即“对于在联合王国和殖民地注册的船舶实行新的许可证制度,使英国船舶不能载来自英国的战略物资前往中国”;“载运战略物资前往中国和苏联集团或东欧其他国家的船舶不(得)在英国加煤。”^③ 3月28日,美法外长在华盛顿谈判,法国方面决定采取同英国类似的措施,此后,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意大利、日本仿效

① 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380页。

② 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第二辑,第1380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103页。

英法，屈从美国强化对华封锁、禁运的措施。美国本身也于7月20日改变租船条件，使装运美国航运署货物的外国船舶，在前往台湾60天内不得驶往共产党中国港口，否则将丧失运费的一部分；对任何前往中国港口的外船、飞机，加紧燃料和粮食控制。^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半岛实现和平。要求恢复与扩大同中国经济贸易的呼声日趋高涨。1954年，不顾美国的阻挠，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其中双方政府订立的协定和合同有17个，贸易额比1953年增长40%，就是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德等国家的对华贸易也有所增长。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更比1953年增加2倍多。

1955年8月1日，中美国两国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9月，中国大使王炳南向美国明确提出取消对中国禁运的问题。1956年8月21日，中国方面在谈判中就禁运问题提出中美联合声明草案，草案说：“为了逐步改善中美关系和缓合国际紧张局势，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约翰逊大使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认为，应该各自采取主动措施来消除目前阻碍他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的障碍。”由于美国方面没有诚意，以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为双方谈判的先决条件，拒绝讨论中国方面提出的声明草案。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383页。

1957年4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根据“美国的一些盟国曾一再要求它把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放松到适用于和苏联集团同样的水平”,美国决定解除对运往共产党中国的某些和平用途项目的管制,但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对于同共产党中国贸易一事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将继续单方面禁止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贸易。”^①

1957年5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宣布,决定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即把非战略物资的禁运范围放宽到对苏联集团的管制水平。美国方面无可奈何地表示“非常失望”外,又一次表示,“至于美国自己,它不打算改变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实行全面禁运的政策”,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本人则表示同情英国的政策,也就在这一天,英国海军宣布,“英国军舰准备保护任何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商船”。

1957年7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这样,美国纠集的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集团中的日本(日本属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这里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上的概念出发考虑,不是指地域上的概念)最后也冲破了美国的束缚,“巴统”内的“中国委员会”就此名存实亡了。1958年9月,美国国务院杜勒斯宣布,美国在“战略物资”方面的“货单”可放宽一些。

由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敌视的政策,也由于中国内部的一些情况,美国单方面“制裁”中

^① 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2480页。

国的禁运封锁政策不可能根本取消，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末。

从 1969 年起，美国尼克松政府先后 7 次宣布放宽对中国的禁运。1971 年 3 月 15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1971 年 4 月 14 日，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达 20 年的中美两国间禁止贸易的法令。1972 年 2 月 11 日，尼克松又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放松对华贸易关系的一整套新建议。此后，所有美国可以卖给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商品，同样可以卖给中国。这样，从 1957 年日本冲破联合国 1951 年 5 月非法决议起，又经过了 15 年，美国才终于与其西方盟国开始站在同一条对华经贸关系的水平线上。

人民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

杨 万 青

初 建 航 校

1947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东总）任命参谋长刘亚楼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校长。

航校1946年3月1日成立于东北牡丹江，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骚扰，当年11月迁至东安。当时航校有日产“九九”式高级教练机20多架，可供一个期班的飞行学员开飞训练；隼式战斗机5架，只能由少数人驾驶。在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之前的3个月，航校发生了一名教员驾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企图叛变投敌误入苏联境内被迫降落的事件。接到报告，刘亚楼赶往东安，亲自调查处理了这件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航校干部明确提出：对飞行人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纪律教育，要把有限的飞机器材和油料用来培养过去经过考验的、今后在创业中能当骨干的干部。

10月，东北局和东总派刘亚楼到航校检查工作，并要

他“物色适当人选，建立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东安，刘亚楼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系统地掌握了航校的基本情况。他兼任航校校长后，成立了以吴溉之为书记的党的临时委员会。

在航校党临委的领导下，航校调整、充实了处级领导机构，并组建了两个飞行大队。接着，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使航校人员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办校方针，改善了干群关系、教学关系，清除了个别的不良分子，纯洁了组织，大家斗志昂扬，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了航校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其后不久，刘亚楼回到哈尔滨，以主要精力协助林彪、罗荣桓部署和指挥辽沈战役。

锦州、长春解放后，刘亚楼立即指示航校迅速派出得力干部分赴两地，并准备人员进驻沈阳，做好接收国民党遗弃的航空人员和器材设备的工作。从而争取了一批国民党航空人员和较好地保存了一批航空器材。

在平津战役中，刘亚楼在指挥部队作战时，时刻把航校的工作记挂在心上。东北野战军（以下简称东野）第三纵队攻克了南苑机场，航校训练处长吕黎平和飞行二大队队长方华根据刘亚楼的指示及时组织人员冒炮火、乘暗夜，从南苑机场的停机坪、机库里缴获了几架略加修理便可飞行的P—51、B—25型飞机和不少整包整箱的航空器材、设

备。第五纵队攻占西郊机场后，方华带领人员又收缴到了大量的航空物资。为了做好被国民党军队遗弃的航空物资和人员的接收工作，刘亚楼还指示吕黎平等及时与负责接收的政府部门取得了联系。1月10日，东野第九纵队攻占了天津以东的张贵庄机场，一架即将起飞的P—51飞机被我军缴获。刘亚楼又立即指示吕黎平火速前往接收。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刘亚楼更加感到自己身为当时全军唯一一所航校校长的重大责任。1月31日，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在刘亚楼的亲自过问下航校接管人员于2月1日进驻北平。北平城内，一架原准备在1月25日载运傅作义一批军官从东单简易跑道上起飞的C—47飞机，以及中央、中国两航公司的职员，便成为航校接管人员首批接收的对象。

进城之初，刘亚楼下榻于北京饭店。2月下旬，他在听取了吕黎平、方华关于辽沈、平津地区接收情况的汇报后，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目前，正在拖延时间，妄图凭长江天险据守。因此，我军要积极准备渡江作战。航校是否可以组建一支飞行部队参战，为渡江战役作出贡献？”

吕黎平，方华由衷地佩服刘亚楼的胆识和谋略，但事出突然又事关重大，一时拿不定主意。刘亚楼没有要他们马上答复，只是说：“你们回去后具体计算计算，研究研究，

限三天向我汇报。”

两天以后，刘亚楼收到了吕黎平、方华送来的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上写着：航校接管处临时党委认真研究了刘参谋长关于组建飞行部队的提议，认为是航校为全国解放战争作贡献的好时机，机不可失；目前航校原有的和最近缴获的能参战的飞机已有40多架，具有作战经验和经过短期训练参战的飞行人员有50余名，可组建两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轰炸机中队的混合大队。经每人20小时的突击训练，从4月份开始至5月底结束，可达到作战技术水平，然后飞赴济南、徐州机场待命，以支援渡江战役……。

刘亚楼听取了吕黎平、方华的详细说明，与他们一起讨论了空军参战的可行性和计划后，说：“这个计划与报告，要经过‘东野’首长同意后再报中央军委批准，才能行动。”

此后，刘亚楼向东野首长汇报了组建飞行部队支援渡江作战的设想，并发报请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迅速到京。常乾坤、王弼赶来北平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召开。为使党中央、中央军委了解东北航校建设的情况，也为了使航校建设直接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报请参加全会的东野首长同意，派常乾坤、王弼去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听取了常乾坤、王弼的汇报后，称赞航校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并提出为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训航空人员，为创建空军作准备，应该成立一个全军的航空机构。3月17日，中央军

委命令成立军委航空局，刘亚楼和有关人员商定，常乾坤、王弼筹建军委航空局，副政委薛少卿留校主持全盘工作，吕黎平主管全校训练并负责组建参战部队及其改装训练。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同日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内开始办公，局长常乾坤，政治委员王弼。4月上旬，中央军委指示航空局，立即准备航空干部参加整编委员会，负责对国民党空军的改编工作。据此，东北航校的许多干部被调到北平，又分赴全国各地，组建空军参战部队的工作遂被搁置。

3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改称“四野”，刘亚楼被任命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正当刘亚楼准备率十四兵团挥师南下，参加解放中南广大地区的战斗时，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留在北平组建人民空军。此后，他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

赴 苏 谈 判

根据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的形势，中共中央认为，解放全国大陆指日可待，而解放台湾、海南岛则要费较大气力。渡海作战的关键是空军、海军和内应。但现有的空军力量难以担当如此重任。因此，应该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7月10日，毛主席在写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意向。7月11日，周副主席召见刘亚楼就正式建立空

军问题进行了交谈，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的建议和领率机关组成的方案。

刘亚楼受领任务后，与常乾坤、王弼等同志研究，提出了一个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人员组成的初步设想，并以此请示了罗荣桓、聂荣臻等有关领导后上报党中央。

当时，刘少奇正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7月26日，中央书记处给少奇同志发去专电，电文说：为准备在一年左右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订购飞机、聘请专家，请代表团向斯大林作初步交谈，如对方原则同意，拟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员）率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同日，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的首要任务……空军领率机关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

次日，刘少奇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拜见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提出了建立空军、订购飞机和聘请专家等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斯大林的积极态度经刘少奇电告中共中央后，周恩来通知刘亚楼：“中央决定你、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四人8月初赴苏，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还说：“你和王弼、吕黎平3人7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接见你们并作指示。”

受命组建空军以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催

促着刘亚楼忙碌于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当他接到周副主席通知的当天，立即找来王弼、吕黎平，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与他们就组建空军的设想，再次深入进行了研究。他说：“在战争环境中建立空军，看来应从陆军基层干部中挑选飞行学员。以国民党现有的8个飞行大队、330架飞机为作战对象，以每个参战的飞行员需要150—200小时的速成训练，每个航校驻1个机场，1期训练60—80名飞行学员来计算，还需要新建5个航校，训练1年的时间才能支援渡海作战。这就是我们设想的初步方案。我们以此为基础，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

7月31日下午4时，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准时来到中南海。朱总司令首先接见了他们。朱总司令扼要地概述了华东、华南、西北战场以及即将向西南进军的简况，接着便关心地询问起东北航校训练的情况。刘亚楼汇报说：“已经训练出60名我们自己的飞行员，目前还有50名学员在训。”

朱总司令高兴地说：“好啊！你们为建设空军培育了第一批种子，现在就象老母鸡抱蛋那样，一窝一窝地抱下去了。我们的空军也会同陆军一样，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你们受中央的委托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的近期的也是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台湾。因此在谈判中要掌握好两条：一是培训能参战的空、地勤人员的速度要快，不能影响中央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二是培训出的飞行员，要以能压倒国民党空军为目标。希望你们圆满完成任务。”谈话间，

康克清同志来了。她听说刘亚楼等人准备去苏联商谈组建空军的事，高兴地说：“多少年来就盼望有自己的空军，希望你们早点把空军建设好！”

下午5点左右，刘亚楼等3人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办公室。周副主席交代行程安排后说：“因为毛主席要亲自接见，同你们详细商谈建空军的问题，我就不多谈了。”

5点半左右，叶子龙把刘亚楼等3人领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离开办公桌，和他们一一握手。刘亚楼向毛主席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选送到新疆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人既有地面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机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的三位一体呀，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员的缩影吧！”

毛主席让刘亚楼等人坐下后，告诉叶子龙：“我要同他们研究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的问题，时间可能长一点，谈完以后我请他们吃晚饭，你告诉大师傅准备4个人的便饭。”

毛主席坐在藤椅上，点燃一支香烟，亲切地谈了起来。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到长期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进展的革命形势，到蒋介石日暮途穷、企图在台湾负隅顽抗，从我军解放台湾的历史重任到空军建设的重要地位，毛主席谈得的十分深远。之后，毛主席说：“中央建设空军的方针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

于是，刘亚楼把航校现有的“家底”和建立空军的设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仔细地听着，一边吸烟，一边用笔记下一些数字，有时还插上几句话，询问一些不大熟悉的航空用语。

刘亚楼汇报后，毛主席说：我看就以你们的方案作为意见同苏联商谈。把我们研究的意见归纳为两条建军方针：第一，以一年为限，建立一支歼击、轰炸机部队，协助渡海作战，解放台湾。这条方针叫做：创建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的经济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你们这次去谈判，请专家、买飞机、购器材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要贯彻勤俭建军、厉行节约的方针。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刘亚楼当即表示说：“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到莫斯科后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主席的指示，谈判的情况及时向主席、中央报告。”

毛主席看看表，时针已指在晚7时30分。笑着说：“刚才说了，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饯行。走吧！”

刘亚楼等3人跟随毛主席进了他的小饭堂。在一张四方桌旁，刘亚楼请主席坐在上方，然后依主席坐于左边。王弼居右，吕黎平便在主席对面坐下。炊事员把4菜1汤摆好之后，毛主席让取瓶葡萄酒来，给每人斟满1杯，说：“亚楼同志，中央派你们三个同志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你就是全权代表。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

的空军干杯！”

刘亚楼赶忙站起来，举杯说：“衷心感谢主席的关怀与款待。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嘱咐，尽快把空军建立起来，协同陆军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敬祝主席健康长寿！”

8月11日刘亚楼一行到达莫斯科，下榻于郊外一座疗养院。

8月12日，刘亚楼等来到莫斯科城里中共中央代表团住处，向刘少奇、王稼祥汇报了毛主席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刘少奇表示同意。次日，刘少奇、王稼祥带刘亚楼等拜会了苏方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并参加了双方的第一轮会谈。

会谈中，刘亚楼详细地谈了我党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与方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

接着刘少奇回国，以后的会谈就由刘亚楼全权代表。

此后，刘亚楼等与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又深入地会谈了3次并草签了苏联向我出售飞机434架、派遣专家和顾问878名、帮助开办6所航校等项内容的协议书。随后，刘亚楼等又访问了苏联空军司令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瞻仰了列宁墓、列宁故居，还游览了莫斯科市容，参观了地下铁道等。

9月中旬，王弼为筹备接待苏联专家事宜先行回国。9月21日，当刘亚楼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消息并从毛主席宣布的“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

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告诉刘亚楼：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已经批准，第一批专家很快便可动身。

10月18日，刘亚楼、吕黎平等回到北京。刘亚楼随即详细地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周副主席高兴地说：“中央认为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6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毛主席特地嘱咐说：“空军的基础好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从中南海出来，刘亚楼直奔灯市口。他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对航空局的同志们说：“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下一步就要看我们如何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这台戏唱红！”

敲 起 锣 鼓

就在聆听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当晚，刘亚楼亲自起草了一份征求工作分配志愿的表格，要航空局立即印发所属在京的处以上干部填写后报他。第二天，他即开始找

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各航校领导干部的预选对象个别谈话，逐一考核。

刘亚楼考核干部的方法有独到之处。在听了一般情况介绍后，总要问：“他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他最不会做什么，为什么？假如你来提分配工作意见，他最突出的成绩是什么，是用什么方法取得的？他做什么工作最合适？”“三最一假如”地提问，又随时记下其中的要点。几天后，划归空军管理的上百名团以上干部的德才表现已印入脑际，6所航校办校的人选，开始在头脑里形成。他的笔记本中，在刘善本、刘风、陈熙、吕黎平、方子翼、安志敏等同志的名下，分别写着类似的话：懂飞行，会管理，有经验，政治上强，可充任校长。不久，中央军委任命上述6位同志为第1至6航校校长。行政干部解决了，尚缺合适的政治委员。刘亚楼起草了选调6名优秀师级政治干部的报告呈毛主席。毛主席很快批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各野战军提出3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后来，中央军委在19名预选对象中选中姚克祐、李世安、王学武、李发应、王绍渊、张百春、罗野岗7位同志分别为第一至第七航校的政委^①事实证明，空军第一批航校的领导班子，来源于五湖四海，重视了用人所长，体现了任人唯贤，为空军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

^① 为了充分利用老航校的技术人员和航空设备，中央军委批准，1949年11月18日成立第七航校，校长魏坚。

里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有各野战军的支持，也渗透着刘亚楼的心血。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自此，新中国年青的空军脱颖而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历史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9年10月24日，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校的首批专家23人乘火车到达北京。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组织考察组认真考察后，刘亚楼报请军委批准，确定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和北京南苑为空军第一至第六航校校址。

中央军委根据刘亚楼的建议，向各野战军下达了为航校选调第一期空地勤学员的指示。经过9、10两个月的选拔，1672名政治条件好、身体健康、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18~24岁，经过战斗锻炼的连排干部，先后到达长春；从苏联进口的145架飞机和相应的器材设备，已全部分配给6所航校。

10月30日下午，刘亚楼在航空局会议室召开第一次校长会议。会议研究了东北航校的整编、空军的建军思想、我方办校人员与苏联专家的关系等问题。末了，刘亚楼以斩钉截铁般的语气宣布：

“解放台湾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我们把空军建设好。当前，一切为了办好航校是空军力量使用和工作安排的一个原则。我们受命开办航校，一天一小时也不

能耽搁。按通常速度起码要三四个月的筹备时间只能给1个月。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1949年11月11日便成为人民空军的誕生日。

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刘亚楼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领导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和干部部。同时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至此，空军领率机关也已就位。

刘亚楼一手抓航校施训，一手抓机关建设，方针是“先航校后机关”。为使航校如期开学，他精心规划，具体指导，夜以继日地操劳着。眼熬红了，身体累瘦了，但精神却异常饱满。工作忙，但不放松学习。他常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日理万机，比谁都忙，仍挤时间学习，以忙为借口不肯学习是不对的。”早晨洗漱时，他一定听广播；外出开会乘车时，他一定看报纸或资料。他常常一边吃饭，一边听取工作汇报。也常常指定些书目、杂志叫秘书看后扼要讲给他听，说这叫“一人读书众人受益”。

12月1日，6所航校如期开学了。刘亚楼陪同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

为了缩短航校的在训时间。12月1日，他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在长春、杭州、成都成立了空地勤人员入伍生预

科总队。12月1日，他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呈报了《航空学校政治教育计划》，提出了培训航空人员的标准：一、忠实于祖国，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党。二、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三、钻研掌握进步的航空业务和技术。四、具有政治坚定的、自觉遵守纪律的、集体主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准确敏捷的作风。航校开学了，机关建设的地位突出了。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机关建设上来，亲自指导各部制订规章制度并狠抓落实。对进入空军机关的干部他亲自过问，原则是“宁缺勿滥”。他提出机关工作必须有预见性、彻底性、及时性、高效率。还强调，干事业没有干劲不行，没有好作风不行。

刚刚诞生的人民空军面临着既要组建部队准备参加解放台湾作战，又要担负要地防空这两大任务，原定的培训计划已感有些不大适应。1950年春，毛主席当面指示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刘亚楼和空军其他领导同志研究认为：新增辟航校，短时间难以奏效。如果将原有的航校加以扩充，增加培训名额，既可缩短筹备时间，又可节省经费。这样做，虽有困难，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办到的。刘亚楼向毛主席建议获准后，两所轰炸机航校由训练两个团的人员扩大为训练4个团的人员；4所歼击机航校由训练5个团的人员扩大为训练7个团的人员。扩大训练规模后所需的干部、学员以及器材、设备，经刘亚楼报请中央军委后得到了及时解决，从而保证了训练任务的完成，仅1950年一年之内，刘亚楼就指导航校三次扩大训练规模，迅速

增加了空军力量并培养了一批指挥干部，为空军发展准备了骨干力量。

3月28日，刘亚楼主持召开第二次航校校长会议。他在听取各校的工作汇报后说：一个月的时间筹备开学了，第三个月开飞了，第四个月有了一个样子，看来可以完成任务，现在担心的是能不能打仗的问题。这批学员多是连排干部调来的，虽然掌握了技术，但缺乏领导工作的经验，指挥一个团、一个师，有很大的困难。不久，他趁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机会，向毛主席建议：选调90多名符合条件的营团干部学习飞行，以组建未来的空军团师领导机构，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一建议，当即指示各大军区迅速落实。实践证明，这是空军建设史上一项极其重要的组织措施。

加 紧 建 军

为健全党的组织，保证党对人民空军的绝对领导，1950年4月3日，刘亚楼、肖华联名报告中央军委，呈请批准空军部门建立党委（7月12日总政批复，成立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刘亚楼为书记，吴法宪为副书记，委员由常乾坤、王弼等15人组成）。

4月15日，毛泽东为《人民空军》创刊号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刘亚楼说：这是毛主席赋予人民空军的光荣任务。同时，他以“题词”为根据，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对空军的任务作了具体阐述。

号召空军指战员兢兢业业做工作，拼死拼活干事业，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自觉性，完成毛主席赋予空军的历史任务。

为了在空军范围内建立业务系统，明确工作方针，刘亚楼指导空军机关先后召开了参谋、机务、通信、机要、政治等一系列工作会议。他说：健全机构、明确职责、改进方法，提高效能，是机关近期的奋斗目标。每次工作会议，他都就具体业务工作在空军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表讲话，并针对不同的业务部门提出不同的要求。

机关的业务工作有了头绪，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任务又提上了日程。4月1日，刘亚楼就空军部队组编计划上报中央军委。6月19日，以航校速成班第1期学员为主，由歼击、轰炸、强击航空兵团队组成的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7月6日，刘亚楼就混成旅的建设方针与该旅政委李世安交换了意见。刘亚楼指出：第四混成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必须有正确的方向。他要求李世安等旅的领导一定要把部队建设好，一定要带出好作风。谈话间李世安不解地问：“第一支部队为什么要命名为第四旅呢？”刘亚楼回答：“第一、二、三旅，可以视为荣誉称号，留给有战功的部队使用；叫四旅的另一用意，还在于激励所属人员继承与发扬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

7月，美国扩大了侵朝战争，战火向鸭绿江边蔓延。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1月，刘亚楼着手组建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不久，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志愿军空军

司令员。

我年轻的人民空军入朝参战，对手是老奸巨滑、颇有作战经验的美国空中强盗，如何使用我空军力量，空军领导机关认识并不统一。刘亚楼从实际出发，提出“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意见并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当即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妥的办法为好。”此后，刘亚楼指示参战部队边打边建，在战斗中成长。当志愿军空军与美国混合机群打了几次大规模空战之后，刘亚楼觉得解决空战战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亲临安东（今丹东）机场，参加空战指挥，参与战斗讲评，反复与参战指战员研究，草拟了歼击航空兵“一区两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下发部队讨论并在战斗中试行。以后在表述形式上改为“一域多层四四制。”他解释说：“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同批同梯队机群以4机为单位，按不同间隔、距离、高度、采取层次配备，构成小编队、大纵深的战斗队形，按照统一的作战意图，以长机为核心，在目视和战术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一域，相互协同作战。刘亚楼强调：“四四制”战术，是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战术思想在空战战术中的运用。发扬集体主义是实践这一战术思想的关键，保持一域，是战术思想的核心。为了使飞行人员加深理解，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可以在飞行员中把领队长机形容为一群蜜蜂的蜂王，机群内其余飞机则应象是蜂子，蜂王向哪里飞，蜂子就向哪里飞，任何时候都不分散。”空战战术

原则的提出，是我人民空军空战战术从实践到理论的一次飞跃。它有效地提高了我军的空战能力，对人民空军战术思想的形成和战术理论的发展发生了深远影响。参战部队运用这一战术，双机攻击双机掩护，屡屡取胜。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王海大队”的空三师第九团第一大队，与敌空战 80 多次，击落击伤敌机 29 架。在两年 8 个月的抗美援朝作战中，我人民空军共击落击伤美机 425 架，击毙美国空军“王牌”驾驶员少校戴维斯，击落并生俘美国空军“双料王牌”上尉飞行员费席尔，严重挫败了不可一世的侵略朝鲜的美国空军，涌现了王海、刘玉堤、韩德彩、张积慧、赵宝桐、孙生禄等一大批战斗英雄，促进了年轻的人民空军的成长。

建军伊始，以明确的建设规划指导空军的建设实践尤为必要。为此，刘亚楼组织部分人员反复论证并经空军党委研究，拟制了《建设人民空军的四年（1950 年～1953 年）计划大纲》。《大纲》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和空军担负任务的需要，绘制了空军近几年发展的蓝图，为空军初期发展提供了依据。至 1953 年底，除组建部队总数和个别指标因情况变化有适当调整外，基本完成了上述大纲，从而为空军发展打下了基础。

刘亚楼还注意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建设空军的思想统一空军干部战士的认识。在 1950 年 12 月召开的空军第一次机务工作会议上，刘亚楼明确提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基本原则。他说：空军建设不以陆军为基础将

是极大的错误，然则忽视其特点也不能把空军建设好。在1951年2月20日空军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就“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是空军建军的总的原则”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并针对空军的特点，提出了技术为人民服务，而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技术干部与非技术干部相互尊重、相互负责的问题；提出了“为飞行服务”的口号^①。当他发现有些同志掌握了飞行技术，流露出瞧不起步兵和陆军时，严肃地批评：“这是忘本思想，要知道飞机上不了刺刀，飞机抓不了俘虏”。接着撰写了《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一文于同年8月1日在《人民空军》杂志上发表。

在人民空军建设史上，从1949年7月到1950年11月这一段，刘亚楼称之为“摆开摊子，敲起锣鼓”的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工作，刘亚楼说：“没出什么岔子，外界反映也还好。对航校、部队，以鼓励为主，调动积极因素；对领导机关，则应多看问题，进一步提高效能。”接着，他指出了机关存在着“慢、拖、粗、浅、窄”的现象。“所谓慢，就是效率低，不及时；所谓拖，就是办事情不干脆，解决问题不彻底；所谓粗，就是工作粗糙，不细致；所谓浅，就是看问题肤浅，不深刻，工作皮毛，不深入；所谓窄，就是考虑问题狭窄不宽阔。”他说：“领导机关看问题、想事情，应该深一点，广一点，多看几步棋。”他号召，转变作

^① 《关于建军思想与领导关系的报告》，1951年2月20日。

风，提高效能，要同上述5个字作斗争^①。

1951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培养新中国的女飞行人员。刘亚楼指示空军训练部迅速落实。4月，55名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选调的女飞行学员途经北京进牡丹江第七航校学习时，刘亚楼接见了她们，勉励她们刻苦学习，战胜困难，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人民空军女战士。这批学员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比男学员学飞行更大的困难，如期毕业了。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这批女飞行员被安排作飞行表演。7000多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50多位外国驻华大使的夫人和中外记者在西郊机场参观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盛典。刘亚楼陪同朱德总司令以及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等检阅并接见了女飞行人员。朱德总司令，邓颖超讲话说：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是新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这次飞行表演获得了圆满成功。3月24日，刘亚楼带领女飞行员到中南海，接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看到一个个英姿焕发的女飞行员，毛泽东主席关切的问：她们都成器啦？刘亚楼回答：都成器啦，能够独立执行飞行任务了。

1951年6月，人民空军已经培养出一批自己的飞行教员，苏联顾问陆续回国，航校进入了“自办阶段”。大家的

^① 刘亚楼《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0月5日。

积极性很高，但只求多飞、不顾质量的急躁情绪也很严重，飞行事故增多了。为迅速转变这种状况，刘亚楼很快指示司令部召开会议，采取措施。这年年底，在军区空军和航校领导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上，刘亚楼指出：飞行不同于地面走路，摔倒了可以爬起来再走，空中飞行那怕是发生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事故。因此，航校教学要注重质量，实行“稳步前进，不赶不拖”的方针。当时，新组建的航空兵部队也存在着跳跃课目、简化练习、事故严重的现象。1952年9月，刘亚楼主持召开空军第一次安全会议，他提出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切实按章办事，认真作到“一切为飞行服务”、“为安全负责”。1953年7月他又主持召开空军第二次安全会议，明确提出航空兵部队飞行训练的方针是“稳步前进，提高训练质量，完成训练任务，保证飞行安全”。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上，刘亚楼把训练方针概括为“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1958年“大跃进”时，有些同志也想在飞行训练中搞“大跃进”，提出要把“稳步前进”改为“稳步跃进”。空军党委适时召开训练会议，刘亚楼耐心地说“稳步前进”与“稳步跃进”一字之差，却有着千里之别。因为跃就是跳，如人走路，双脚为步，单脚为跳，跳则不稳。跳跃课目、简化练习，只求进度，不顾质量，势必惹出乱子，欲速则不达，飞行训练只有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才是贯彻总路线精神的最好办法。终于说服了存有模糊认识的同志，使“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得以持续贯彻执行。由于较好地处

理了飞行进度和质量、安全的关系，安全形势逐年好转。空军飞行事故万时率^①由1950年3.35下降到1955年的0.44，1964年又降至0.249，创空军历史上安全飞行的最好水平。

为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1952年7月1日，空军党委根据刘亚楼的提议，作出了《关于加强文化学习的决定》。《决定》指出：空军是技术装备复杂的军种，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是学习和掌握复杂军事技术的必要条件。因此，文化学习是除作战任务以外压倒一切的任务。据此，空军各部门，各部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化培训，大大提高了空军人员的文化素质，适应了空军发展的需要。

1953年年初，刘亚楼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志愿军空军的作战情况。毛主席指示：加紧战斗锻炼，加紧抗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多多培养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注意保存有战斗经验部队的战斗实力。刘亚楼组织空军党委常委反复学习、领会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并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落实措施。一方面，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安排更多的空军部队轮番参战，更多的机关跟班见习。截止于1953年7月，到志愿军空军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见习的空军人员已达1727名，这对积累经验、培养作风，推动人民空军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刘亚楼提出将一批有战斗经验、有组织能力、有培养前途的师团领导干部选送苏联红

^① 平均飞行1万小时发生严重飞行事故的次数。

旗空军学院深造，并将设想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非常重视这一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报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苏联政府接收中国政府派去的军事留学生。从1953年到1960年，空军党委先后派遣6批50人赴苏学习，著名的战斗英雄刘玉堤、赵宝桐、杨振玉等，都曾赴苏学习。留学生出国前，刘亚楼总是亲自与他们谈话，讲意义、提要求，希望他们克服困难，不辜负中央军委、空军党委的重托。学习期间，刘亚楼亲笔写信，鼓励他们学习进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每逢出访苏联，刘亚楼总要到莫斯科东郊70多公里的莫尼诺（红旗空军学院院址）看望在校的中国留学生。一批批赴苏学习的同志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胜利归国，大都成长为空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在空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3年1月，刘亚楼在听取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刘放关于志愿军参战部队卫生工作的检查汇报时，对汇报中提到的飞行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食欲不振、睡眠不好、体重减轻、体质下降的情况极为关注。当即指示：飞行员每年疗养、休假一个月；平时每天保证不少于30分钟时间的体育锻炼；在食物摄取上，坚持营养第一、兼顾口味的原则；空勤灶要配备营养护士，讲究营养卫生。他还指示空军疗养院要以“恢复疲劳、增强体力，以便提高工作效率为宗旨。具体做法就是搞好伙食、加强锻炼、进行

医疗。”^①

建设院校

空军创建走的是一条先开办航校、后组建部队的道路。随着空军部队的发展，刘亚楼看到，单一的航空学校已经不能适应空军全面建设的需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与空军编成相适应的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势在必行。在他的提议和领导下，从1954年开始，先后成立了空军后勤学校、空军政治学校、空军领导的解放军气象专科学校、空军通信学校、空军卫生学校、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等院校。他主持设计了空军指挥干部三级培训体系——航校、高级航校、空军学院。在空军学院开学仪式上刘亚楼指出：“把实践中零碎的、局部的个别的东西总结提高上升为普遍的、综合的理论，用以指导实践，指导我们的建军、训练、作战，这就是空军学院的总任务。”他要求空军学院：第一“不能在政治上出毛病”；第二“要在战役战术方面，为空军建设搞出一套东西，培养一批人才”。他主张，办好院校，一是选好办校人员，二是明确指导思想。他说：“搞学校工作的，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又需要不断改革。教学改革最重要的是教材。什么少而精、短而

^① 刘亚楼《与青岛疗养院领导的谈话》，1953年7月6日。

少，教材不搞好，都是空话”^①。他还特别指示，有外训任务的学校，“要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②。在空军党委第八次全会上，他提出空军政治学校以培训连队指导员为主要目标。他说：连队工作是整个部队工作的基础；连队指导员是连队的当家人；连队指导员的工作，不仅影响一个连队，而且影响整个部队。政治学校两三年内培养出四五千个指导员，连队就会起变化，空军部队就会起变化。当第1期指导员训练班毕业时，他亲临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鼓励学员们下到部队，搞好基层政治工作。到1965年，空军院校已有29所，一个门类齐全、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已初步形成。

空军创建初期，使用的条令、教材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空军的。这一方面为人民空军迅速上路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顾我军特点的消极作用。抗美援朝后期，刘亚楼就感到我军有许多成功经验需要空军加以总结和发扬。1957年他又指示空军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着手编写和修改条令教材，以适应空军建设的需要。但这项工作开展不久，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开始起来，编修条令教材的工作也就停顿了下来。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叶剑英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刘亚楼看到这一指示后十分重视，很快组织落实。1959年1月，刘

① ②刘亚楼《接见一航校团以上主要领导同志时的讲话》。1960年11月16日。

亚楼在杭州主持召开了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进行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彻底地修改不适用、不合理的规章制度。”1月16日，空军党委发出《关于编写条令、条例和修改规章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把编写条令教材的工作列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11月，空军党委6次全会确定了以刘亚楼为组长的，有曹里怀、常乾坤参加的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刘亚楼就条令教材编审工作强调说：“编写我们自己的条令、教材是空军建设的百年大计，要舍得‘投资’，下决心把最有能力的干部抽出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把这项基本工程拿下来，借口忙不给人，甚或派出‘二把刀’搪塞，是很不负责任的。”他还说：“空军党委分工我来管这件事，我一定管到底。如果我中途死了，请你们把编好的条令、教材放到我的坟墓上。”在刘亚楼的直接领导下，空军分期分批地从机关、部队、院校抽调了1112人，专门从事条令、条例、教材的编写工作。1960年3月，编审小组和办公会议的同志集中于杭州工作。刘亚楼倡议先就编写的方针原则作出规定。在广泛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之后，他将其归纳为四条：（1）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依据，以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空军10年来的经验为基础，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编写；（2）体现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3）既写具体要求、规定，更写方针、原则、指导思想；（4）尽量简明、精炼、确切，便于理解、记忆和使用。同年5月，空

军党委二届七次全会正式通过了上述原则，并向叶剑英和罗瑞卿等军委领导作了汇报，得到军委总部首长的批准。编写工作开始后，他又对编写工作的步骤、用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完成一本条令教材，看来要经过五个阶段。第一，汇集材料，研究内容，列出纲目；第二，读书拉条，列出细目，拟写初稿；第三，查漏洞、查重复、查矛盾，拾遗补缺；第四，统一用语，精炼、修饰文字；第五，审查验收。编写人员在阅读材料时，他提出不能“游山玩水”，而要“上山采药”、“沙里淘金”。在审阅《飞行练习教程》纲目时，他提出将“练习教程”改名为“操典”，是“备载操法之书”便于同原理教程的区别。在审阅“空中教学法”一章时，他在“及时地提示与帮助。提示的语言要简明清晰，帮助的动作要准确柔和”下面画了一横道，在“及时”二字下画了个问号。他问：及时是不是不能晚的意思？有关同志回答说“是”。他说：“这就值得研究。应该是当早则早，当晚则晚。当早不早会危及安全，当晚不晚不利于掌握技术。”说罢，把“及”字改为“适”字。在座人员无不惊服。他认真的作风和严肃的态度，深深教育和影响着周围的同志们。在刘亚楼亲自参与、具体指导和编写、编审人员的努力下，至1965年共编写出空军的条令、条例、教令、操典、大纲、教程306本。这些条令教材总结了十多年来空军建设的经验，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初步形成了一个性质区分清楚、内容完整衔接、相互关系明确、具有中国空军特色的条令教材体系、有力地

指导了人民空军的建设。

随着空军院校数量增多，专业种类日趋复杂，校址分布遍及全国。刘亚楼看到，院校工作全部由空军直接领导的体制已与院校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1959年11月，刘亚楼主持空军党委开会研究，作出了《关于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院校在建制上直属空军，在管理上由空军与军区空军分工领导。空军主要负责确定训练方针、任务、学制、制度、计划，掌握学员补充、分配和干部的选拔调配；军区空军主要负责学校地区性的党政工作、日常行政工作和后勤、机务保障工作。1961年，刘亚楼亲自指导空军军校部^①调查并研究空军院校的学制问题。他指出：学制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训练期限问题，而是院校的一项根本制度，涉及到调什么人入学，训练成什么样的人材。1962年初，在空军党委直接领导下，从空军领导机关26个部门和院校抽调87名干部，组成10个学制工作小组，进行调查研究，经过3年多的努力，初步完成了116种培训对象的修订学制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了空军各类干部的培训体系，为通盘规划院校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有远见、富于创造性的基础建设工作，其基本内容和主要方法，至今仍在空军院校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 1958年空军党委决定将空军军事学校管理部改名为空军军校部。

智 歼 “U—2”

1957年2月21日，中央军委作出了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的决定。3月26日，中央军委公布了合并后的空军主要领导干部名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5月16日，中央军委又批准了新的空军党委组成人员：新的空军党委常委由王秉璋、王辉球、刘亚楼、成钧、吴法宪等10人组成，刘亚楼为书记，吴法宪、王秉璋、成钧为副书记。

1958年，国民党空军依仗美国提供的性能优越的高空侦察机加紧了对大陆的侦察活动。中央军委命令空军严惩空中强盗。为此，空军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刘亚楼、成钧指导这支部队完成改装训练后，便开始了与国民党空军斗智斗勇。他们时而将地空导弹部队部署在华东，时而将部队调往华北、西北，摆在敌机可能经过的地方。翌年9月7日，这支部队在华北地区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1架，开创了用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先例，迫使国民党空军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不敢到大陆上空侦察骚扰。

一手抓部队的思想建设，一手抓部队的战备工作，这是人民空军初见规模后，刘亚楼为空军确定的工作方针。

1961年1月，美国以当时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

装备国民党空军，美蒋并随即恢复了对大陆的侦察活动。对此，刘亚楼指示有关人员加紧研究U—2窜扰大陆活动的规律。此后，他指示将导弹部队部署在南昌外围，并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转南昌以南之樟树，以诱敌就范。9月9日6时，国民党空军U—2飞机一架窜入大陆，经福州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刘亚楼在空军指挥所里用电话询问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吗？”岳振华肯定地回答：“在标图桌上看到了！”刘亚楼命令：“把它打下来！”8时24分，敌机经九江左转直飞南昌，32分进入我导弹火力范围，被我一举击落。

我人民空军击落U—2飞机轰动了世界。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祝贺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9月15日，首都各界1万余人举行庆祝这一重大胜利的大会。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9月21日，刘亚楼带岳振华等同志去中南海向中央首长汇报，又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的亲切鼓励。当刘亚楼把二营营长岳振华介绍给中央首长后，毛主席紧紧握着岳振华的手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从1963年3月开始，国民党空军U—2飞机为逃避我地空导弹部队打击，在机上加装了更为先进的预警设备。并多次深入我西北战略要地上空侦察。刘亚楼、成钧发动导弹部队指战员研究对策。不久，二营演练出一套“近快战

法”^①。6月，刘亚楼到上海听取岳振华汇报后说：“这很好，完全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运用这一战法。11月1日，二营又将窜犯大陆的一架U—2飞机击落。

从二营再次击落U—2飞机的事迹中，刘亚楼受到启示。不久，在空军召开的训练作战会议上，刘亚楼提出：“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的精神，要落实到干劲、用脑、标准三个方面。”关于干劲，他说：没有这一条什么政策也无法实现，什么方法也不能落实，什么工作都搞不好。关于用脑，他说一切主意都是想出来的，任何成功的点子，都是用脑思索的结果，一个不用脑子的干部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干部。关于标准，他说：低标准只能麻痹自己，高标准才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为打击国民党空军对我沿海地区的窜扰，空军组织地空导弹部队再下江南。5月，刘亚楼亲自对岳振华口头指示：“你这次出去，一定要把敌机击落。如果把李南屏^②击落就更好了。这可是振国威、扬军威的大事，你要亲自担任营指挥员指挥。”^③不久，二营进驻漳州地区设伏。在气温高、湿度大、雷雨多的条件下，突击训练，密切协同，于

① 把开天线后要做的14个动作中的9个动作改放在开天线之前做，把必须开天线后才能做的5个动作，争取在4—8秒内完成。这样打开天线后，敌机预警系统收到信号也来不及逃窜。

② 李南屏是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曾驾驶U—2飞机12次深入大陆纵深上空侦察，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数度被国民党授予“英雄”称号。

③ 1964年3月1日，岳振华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7月7日将入侵的一架U—2飞机击落。驾驶这架飞机的正是国民党空军号称“空中飞虎”的李南屏。7月8日，刘亚楼赶到前沿阵地，帮助二营总结经验并上报党中央、中央军委。收到刘亚楼报告时，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议论工作。毛泽东主席看后十分高兴，说：“真想见见这支部队。”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不久，周恩来总理向刘亚楼传达了毛主席想见见这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的意向。刘亚楼指示岳振华带二营回到北京。7月23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二营全体指战员。当刘亚楼再次把岳振华介绍给中央首长时，毛主席说：“认识，认识，岳振华同志嘛！”毛主席对刘亚楼风趣地说：“美国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言传身教

在长期的空军建设过程中，刘亚楼经常强调，空军驻地辽阔，人员分散，技术装备又较复杂，空军建设，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他要求行政、技术干部要做思想工作，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要成为思想工作的组织者、指导者、实践者。

1951年10月，刘亚楼到志愿军空军第三师检查工作。空三师是一个入朝作战不到10天，便击落击伤敌机8架的

英雄部队。当刘亚楼问到该师有什么经验时，该师政委高厚函说：“要说经验，就是一条：我们，包括飞行员在内，多数来自陆军，都是打过仗的，有作战经验；飞行员驾驶新式飞机，如虎添翼，所以升空作战非常勇敢。”刘亚楼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赞同。他说：“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经验，这就是叫敌人闻之胆寒、使我军茁壮成长的重要法宝。”他要求空三师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并摸索和创造适合于空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形式，进一步鼓舞士气并不断提高技术战术水平，提高作战能力。空三师不辜负祖国人民和空军党委的希望，他们深入开展三评（评指挥、评动作、评纪律）和杀敌立功活动，从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参战86天，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毛泽东主席在刘亚楼呈送的战报上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

1956年12月11日，在空军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刘亚楼讲话说：“政治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政策。这种宣传，主要靠两个方面。一是用嘴巴讲。这就要求政治干部多学一点，学好一点。二是靠表率作用，这就要求政工干部以身作则，有很好的形象。谁都难免有缺点，有了缺点要接受批评，注意改正。”同年，在空军党委召开的第十四次扩大会议上，刘亚楼诚恳地请与会同志对空军党委和他本人提出意见。他主动揭露自己的缺点——锋芒毕露的态度和工作中的急

性病。他说：遇事不够冷静，容易冲动、对工作要求过急，容易发脾气，对同志态度生硬，不够热情是主要表现。并深挖了根源，表示要在党的监督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彻底改正。刘亚楼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给与会同志以教育和启迪。1957年空军部门开展整风运动时，在空军政治部大字报里，有一张是批评刘亚楼的。大字报写着：刘司令员批评人太尖刻，有时令人难以接受，给人的感觉不是冬天的太阳，而是夏天的烈日。刘亚楼站在这张大字报前，久久没有离开。他看了一遍又一遍，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批评很中肯，应该改正，应该改正！”后来在党小组会、支部大会、党委会上，他多次检查自己批评人的态度。他说：“批评好比种花，看病。给花浇水、施肥，若是过分会把花淹死烧死；看病吃药是为了恢复健康，如果药量过大，效果适得其反。”在刘亚楼身边工作的同志常听他说：“我主张有话说在明处，当面可以骂娘，背后不要捣鬼。我最讨厌那种当面拍肩膀，背后动家伙的人！”

1958年秋天，一架从新疆完成训练任务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随机带来了新疆驻军捎给空军首长的哈密瓜。刘亚楼知道后，对秘书高晓飞说：“第一，拣最好的送给中央首长；第二，剩下的分给空直各个单位，尤其不要忘了印刷厂、打字室、司机班、警卫连的同志；第三，至于空军首长要和大家一样，每家一份。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其他领导同意的话，就这样办。”这一意见也获得了其他领导的赞同。刘司令员亲自“分瓜”一时在空军机关传为佳

话。

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以后，国防部行政管理局按规定准备把他乘坐的“吉姆”车换成“大红旗”。刘亚楼听说后制止了。他说：“房子越住越宽敞，汽车越坐越讲究，不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我坐的车很好，没必要再换。”不久，他去杭州开会，那辆“吉姆”车也送厂翻修了。刘亚楼返京时，“吉姆”还没修好，办公室的同志便趁机要来一辆“大红旗”去西郊机场迎接司令员。刘亚楼走下飞机，一眼就看到了停机坪上的“大红旗”，车里坐着一直给他开车的老司机王佐，心里明白了七八分，问：“这车是怎么来的？”办公室的同志说明情况后，他说：“汽车翻修可以派别的车嘛，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这是什么作风？你知道领导干部如何才能带出好作风？你知道工作人员怎样做才叫作爱护首长？下午要召开现场会谁要的车谁做检讨。”说完，坐上王秉璋副司令员的车回去了。

当日下午，在空军司令部召开的小型现场会上，刘亚楼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万别小看这些‘小事’”。

1961年2月，刘亚楼对空政文工团副团长张双虎说：“为克服困难，激励斗志，你们文工团多唱一些革命歌曲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从5月开始，文工团全团动员，边创作边排练，演唱革命歌曲。刘亚楼号召在空军工作的红军干部贡献革命歌曲并亲自安排顺序、指导排练，亲自定名《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八一”建军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十一”国庆节在民族宫公演，轰动了北京城，

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给予高度赞扬。此后，刘亚楼指导空政文工团排练的《年青的鹰》、《江姐》、《女飞行员》也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热情称赞。

为动员空军所属人员在国家经济困难面前端正姿态、做好工作，1962年年初，刘亚楼提出：“自力更生，顾全大局，咬紧牙关，过苦日子”的口号，有力地指导了空军的工作。

5月，刘亚楼去福州军区空军检查工作，途经杭州时，住在丁家山空军疗养院。当晚，俱乐部放映电影，疗养院领导关照工作人员照顾好司令员等空军领导。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在俱乐部正中间位置摆上了沙发。开映前，刘亚楼走进俱乐部，看到这个场面，他问：“怎么把中间的椅子撤掉了？”院长解释说：“这不是专给司令员准备的，哪位首长来这里都是这样。”刘亚楼说：“不管谁来坐过，我是不坐的。同志哥，这叫整首长，叫我们出‘洋相’，把我们拿出来‘示众’，好心办坏事啊！”院长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刘亚楼踱了几步，说：“若是真正关心我，就把沙发撤掉，把椅子摆上，让我和群众坐在一起看电影吧！”从此，丁家山空军疗养院俱乐部放电影时，再没出现过摆放沙发的现象。刘亚楼对院领导说：“不论职位多高，都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居功，不特殊，平等待人，这是党的群众观点的表现和伟大力量的所在。”1964年3月5日，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刘亚楼又针对加强整顿空军

机关的作风这一问题，明确要求：一方面要树标兵、学先进，把更多的人员带动起来；另一方面要注意促后进。他赞成司令部机关党委提出的批评“三虎”干部（政治上迷糊，工作上马虎，生活上非常在乎）的作法。他说：“对雷打不动、屡教不改、干劲不足、玩劲很大的干部要‘摊牌’（公开批评其缺点）；总体上是以表扬为主，但内部会议上要重视缺点。”

鞠躬尽瘁

1964年8月18日，刘亚楼随同李先念副总理经卡拉奇赴罗马尼亚访问。出访期间他腹泻、腹胀严重、但仍坚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回国后，他面色苍黄，浑身乏力。9月21日在协和医院检查，发现肝脾明显增大且质地偏硬。经空军党委研究并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刘亚楼暂时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

毛泽东主席看到刘亚楼患病的报告，十分关怀，亲笔写信嘱咐他好好医疗。信中说：

“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①

手捧毛主席的亲笔信，刘亚楼非常激动。毛主席关怀、教育的往事，又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① 见空军党委《刘亚楼同志患病和治疗经过》。

1936年年底，“红大”第一期学员毕业。半年时间的学习，刘亚楼觉得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正当他准备重返部队一展身手时，却接到了留在“红大”担任训练部长的通知。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眼看着同志们一个个整理行装重返部队，他心里堆起了一个不小的疙瘩。毛泽东听说刘亚楼对留校工作还没有想明白，便决定找他谈谈。他象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拘谨不安地走进毛泽东办公的窑洞。毛泽东对刘亚楼说：办校是一项根本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相信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几句话使刘亚楼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他立即站起来向毛主席表示：安心工作，把事情办好！从此，安心于“红大”建设事业并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抗大”（1937年初“红大”随党中央领导机关迁往延安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举行运动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宣布：罗瑞卿任“抗大”副校长，刘亚楼任“抗大”教育长，训练部长由许光达继任。不久，罗副校长通知刘亚楼搬到凤凰山下的窑洞居住，以就近到“抗大”工作。

凤凰山下刘亚楼的新居距毛泽东的住处很近。早早晚晚常常可以见到毛主席，有直接接受毛主席教育的便利条件。一天，刘亚楼被叫到毛泽东办公的窑洞，毛泽东询问他在“抗大”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嘱咐他好好读读《实践

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说有什么感受可随时谈谈。此后，刘亚楼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毛泽东则断断续续的向他详细讲述了党内几次左倾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危害，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及其推行者李德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失。

1938年4月初，中央军委通知刘亚楼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几天后，毛泽东向他交代：到莫斯科把党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当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这时，刘亚楼才明白，几个月来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关系到这一重要使命。他向毛泽东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毛泽东告诉他，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4月下旬，刘亚楼告别了“抗大”，和卢冬生、谭家述、杨至诚等一起，经新疆出境，踏上了赴苏学习的行程。一到莫斯科，刘亚楼顾不得欣赏优美的环境和奇异的建筑，很快认真而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代的任务，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作出支持我党的政治路线、支持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决定提供了条件。

……想着想着，刘亚楼禁不住热泪盈眶。

他的夫人翟云英把亚楼扶到床边，帮他擦干了眼泪。刘亚楼强撑着走到桌前，拿起笔，工工整整地给毛主席写了回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一定战胜病魔，好好工作……”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刘亚楼得的是不治之症，病情一天天加重。

11月26日中央卫生部批准，邀请北京、上海著名医学专家10人会诊，确认病情严重。11月27日，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

刘亚楼到上海后，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当即进行了研究，指定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负责组成治疗小组认真会诊，积极治疗。治疗小组全面检查后采取了保肝、护脾、补血和密切观察为主的医疗措施，要刘亚楼充分休息，加强营养。然而，刘亚楼在病情沉重直至最后弥留之际，头脑里萦绕着的仍然是空军的工作。

1965年1月3日，刘亚楼与姚克祐谈话，就空军即将召开的训练会议，针对安全、普及尖子等问题作了指示。1月7日，他在病床上签发了《关于再次击落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向罗总长杨副总长的报告》。1月9日，对空军贯彻军委有关安全问题的指示提出了意见。2月13日，与姚克祐、夏梨谈话，对空军准备召开的政工会议提出了要求。3月9日接见各军区空军政委，就干部的团结、重视缺点等问题，现身说法，深入进行了交谈。并说：今年的工作主要是狠抓落实，明年、后年要提出些新东西。3月15日，召集王平水、姚克祐^①等同志说：“一、空军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

^① 王平水当时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姚克祐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干部的级别宽严不一，总的方面是卡得太死，不合理的现象非常严重；二、过去衡量干部有两个工具，即军衔和级别。现在取消军衔，要利用这个机会适当地加以调整，有利于工作，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三、要搞一个起跑线。起跑线的标准就是德、才、资，具体标准就是服役年限，按年限来衡量不是排辈数。”

4月7日，医疗专家们就刘亚楼的病情做出了肯定地诊断，即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肝癌，而且是弥漫型。此后，国务院卫生部增调北方、天津、上海肿瘤专家3人组成新的治疗小组，做出了最大努力，不惜重金从香港进口药品，服用仍不见效。4月23日刘亚楼病情迅速恶化。此后，空军党委将刘亚楼的病情每天一次报告中央军委，两天一次通报空军师以上党委。

就在刘亚楼病情显著恶化的4月23日，他在审阅一本条令后，还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这本条令应有一个内封，不然看书的人包上书皮后使用很不方便……”同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探视他，他一定要工作人员为他洗洗脸，整整衣服，坚持将总理迎送到门口。

长期的病魔的折磨，使英武的刘亚楼骨瘦如柴，十分虚弱。医护人员都想以周密的服务减轻他的痛苦，但他自己却是那样坚定、乐观。就连大小便这类生活问题，他总是坚持着走到厕所。

4月23日以后，刘亚楼出现昏迷现象，而且日趋严重。渐渐的，昏迷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一天，刘亚楼把

姚克祐叫到床前，断断续续地说：“秘书长……我的话言中了……条令编出来，上八宝山……送给我……”“秘书长”是姚克祐在空军条令、教材编写组的职务。姚克祐深知刘亚楼不称他为副参谋长而称他秘书长这里面的苦心。但此刻，姚克祐呜咽着，喉咙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是不住地点头，眼泪一颗颗的往下掉。

一天，他看着坐在床前的夫人翟云英，默默地看着。是呀，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静静地看看自己的妻子了。他们自从1946年相爱，1947年结婚，婚后刘亚楼很快便匆忙地投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了，又全神贯注地献身于人民空军建设事业。刘亚楼想到这里仿佛有许多话要对妻子说，但他深知妻子是了解自己、深明事理的，又仿佛不需要说些什么，象当年离开家里，奔赴前线，只是又一次暂别一样。但这次毕竟不是暂别，他还是向翟云英轻轻地说出了四个字“……父亲、孩子……”翟云英知道，自己的丈夫出世不久，母亲死于产褥热，是刘德香收养了小亚楼，省吃俭用地抚养他。就是这位养父，宁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下田做活，却要让亚楼进学校读书。亚楼长成以后，又送给革命队伍……如今刘德香已是80多岁的高龄，丈夫却要先走一步，这是让自己替他尽些孝道；至于孩子，翟云英拿出了孩子们的照片，一一摆在丈夫面前：煜南、煜奋，穿着崭新的军装，已经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煜滨正在读书，却长得高大英俊；煜鸿、煜珍年纪尚小，珍珍年仅3岁，长着一双黑黑的大大的眼睛。

刘亚楼看着孩子的照片，眼睛也模糊了。他望望翟云英，深情地说：“都交给你了……我没有留下什么，只有一颗……对党……对人民忠诚的心……”翟云英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一滴滴的热泪滴在丈夫干瘦的手背上。

5月3日，罗瑞卿总参谋长、杨成武副总参谋长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专程赴沪看望刘亚楼。当他们来到医院时，刘亚楼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坚持着要工作人员把扶他坐起来，用微弱的声音对罗瑞卿和杨成武说：“感谢中央首长……关怀，请中央首长保重……”说罢，又陷入了昏迷。

5月4日下午，罗瑞卿总参谋长在上海锦江饭店召集空军吴法宪、王秉璋、曹里怀、徐深吉、张廷发、王辉球、余立金等开会。罗总长说：“刘亚楼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战士。今天病到这样程度，对我们是个巨大损失。谁都不愿意他离开我们，但这是没法子的事，只有按照共产党人的办法，化悲痛为力量。”^①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刘亚楼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刘亚楼逝世了，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我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但刘亚楼参与开创的人民空军建设事业，却继续发展，不断前进，党和人民也永远铭记着他的功绩。

^① 见《罗瑞卿总参谋长关于刘亚楼同志治丧问题的指示》。

关于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 行军路线的考察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肃北县委党史办公室

从1936年10月25日起，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红四方面军所属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21000多人于11月10日先后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临泽县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突围，由梨园口撤入祁连山，14日到达肃南县石窝山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余下的部队和伤员共2000余人兵分三路，在祁连山分散游击。部队深入祁连腹地，历尽千辛万苦，按照党中央指示，终于从肃北县的大龚岔口冲出祁连绝境，于4月底到达甘、新两省交界的星星峡，结束了艰苦的历程。

解放以来，原西路军的部分指战员，对这段艰苦卓绝的西征历史，曾经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回忆。近年来，不少热心党史、军史的工作者和文学家，怀着对革命先辈无比崇敬的心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千里迢迢，不辞劳苦，沿着西路军当年的战斗足迹，重访西征路，撰写了一批有史学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西路军从靖

远虎豹口渡过黄河，血战河西走廊，战胜祁连天险，到达星星峡，结束悲壮西征的全过程，弥足珍贵。但存在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对西路军在祁连山中 43 天的艰苦历程，特别是石窝分兵后的经历，只有情景上的描述，而几乎没有指出一个具体地名，这就使西路军的行军路线出现很大一段空白。究其根源，大致有以下四点：一是西路军多系南方人，初来河西，人地陌生，昼夜行军打仗，匆匆而过，印象不深；二是兵败祁连，时值寒冬，到处冰天雪地，大部分地段荒无人烟，无暇考究经过详细地点；三是当时战斗激烈，条件艰苦，没有留下记录，时隔数十年，记忆更加淡漠不清；四是千里祁连，山高水深，地形复杂，现在仍有许多地段没有公路，不通车辆，致使这段红军路，半个世纪以来无人亲身经历考察过。现在若不抓紧考察，再过几年，西路军老战士和当地知情群众将会更少，要想弄清这条路线将更为困难。因此，我们怀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以红军长征的精神，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组织了这次考察活动。

一、考察的方法

（一）考察的准备

我们的考察准备工作，是从 1986 年初开始的。

首先，我们对原西路军指战员撰写的回忆录，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研究，基本搞清了从靖远虎豹口渡河，到星

星峡结束西征的整个战斗历程。

其次，对西路军在酒泉地区行军路过的重要乡镇和战斗地点，如肃北县的大龚岔口、石包城、安西县的蘑菇台、王家营、白墩子、红柳园、直到星星峡，进行了实地走访和察看，并广泛征集了西路军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后历次战斗的有关资料。

第三，对流散我区的西路军老战士进行了全面地调查访问，征集到一批“活资料”并且找到了现居住我区祁连山中肃北县盐城湾乡的老红军何延德，得到了第一手口碑资料和线索。

第四，通过召开知情人座谈会，如通过和当年曾在祁连山中为红军带过路，提供过物资、食品的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等人的亲属举行座谈，了解有关情况。

(二) 考察的路线

在做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我们又进入祁连山进行了实地勘察。在确定具体勘察路线时，我们把西路军在祁连山中的大致行军路线，按现在的行政辖区，划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甘肃张掖地区的临泽县梨园口进入祁连山，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大岔牧场一带；第二段是从东岔大坂进入青海省境内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托勒牧场；第三段是甘肃省酒泉地区范围内的肃北县疏勒河上游，到石包城大龚岔口出祁连山。然后，本着先易后难，先近后远的原则，我们先从本区范围内开始考察，即从红军出祁连山的大龚岔口开始，沿着西路军行军路线的相反方向走，一直走到红

军进祁连山的梨园口结束。

（三）采取的方法

在考察的具体方法上，我们根据不同地段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一是有资料提供线索的，我们采取资料线索与实际地点对照相结合进行核实的方法；二是无资料线索的，我们采取沿路走访知情人、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进行确定的方法；三是采取把回忆资料、地图资料 and 实际地形、重要通道相结合进行审定的方法。以上方法全面综合考察分析，尽量做到符合实际，准确可靠。

由于我们做了较充分的准备，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法，又得到了沿途有关组织和知情群众的大力协助。因此，我们这次西征路线考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考察中获得的新资料

为了弥补许多回忆资料中，对石窝会议后左支队在祁连山中行军路线比较粗略的缺陷，我们在考察前和考察中，走访了原西路军的部分指战员和当地党史部门、知情干部群众，获得了许多“活资料”，这对我们考察的顺利进展起了很大作用。现将这部分新材料摘要如下：

1. 肃南县委党史亦在《红西路军在肃南活动情况》的资料中写道：1937年3月12日，红西路军进入裕固族居住区。先后进行了著名的灰大坂、马场滩、西牛毛山、康隆

寺和石窝战斗，给敌以沉重的打击。3月14日石窝会议后，左右支队连夜同时出发。3月15日，右支队一部分人行军到达祁连山脚的红湾寺（现肃南县所在地）藏族居住区，后来分散向北活动，不久就被敌搜山部队冲散。大部分人随王树声等同志向南行动，越过九个大坂，两天后到达甘青两省交界的黄番寺时（现名黄藏寺，在青海祁连县西北的黑河边），与敌马彪部遭遇，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歼敌百余人。在敌众我寡悬殊的情况下，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一部分同志突围，向东分散活动，以后陆续回到陕北。

左支队在李先念的率领下，经过长干河、八字墩、托来、鱼儿红、石包城等地，在祁连山深处一路上爬冰卧雪，克服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顽强地前进。1937年3月22日，左支队行至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时，用仅有的一部电台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按照中央的指示向新疆方向前进，于4月10日到达安西山口，月底抵达甘新边界的星星峡，悲壮的西征宣告结束。

石窝会议后，裕固族青年牧民儿尔目，不畏风险，爬山涉水为西进新疆的红军带路，从长干峡到八字墩，往返行程400里（长干峡系小长干河到边麻沟的峡口，从此处过大岔垭豁，翻东岔大坂，即从肃南的大岔牧场到青海的野牛沟谷地。这里是黑河上游，河南是终年积雪的托来山，河北是走廊南山，东一段的走廊南山又叫八字墩山）。

2. 肃北县委党史办在《蒙古群众援救红军》资料中写道：1937年4月中旬，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1000

余人，翻过祁连山的乌兰大坂，进入肃北县的考克赛。长期受国民党和马家队伍反动宣传以及被煽动的蒙汉牧民，纷纷向三个岗等地逃避。红军先头部队到达考克赛时，只剩下了诺尔布藏木、艾仁青、诺尔布特力等几户贫苦牧民。……诺尔布藏木给红军当了向导，他带领着左支队从考克赛出发，沿疏勒河，经过查干布尔嘎斯，翻过塔龙乌苏，进入野马河，又从野民河出大粪岔山口到了石包城。

3. 现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区红石窝村的西路军三十军八十九师通讯排长易明清同志在座谈中说：西路军从梨园口进祁连山，沿梨园河朝西到榆木庄，又朝南入大肋巴口，沿大肋巴河到马场滩、牛毛山，打了一仗，又从柏树沟西的塔尔沟退到康隆寺打了一仗，又退到石窝山。石窝会议后，兵分三路，连夜行动。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同志带领左支队，从石窝山到长干河、大岔牧场，出边麻沟，过野牛沟、热水大坂、托来，到安西再进新疆。

4. 当年营救过红军干部徐以新的肃南县牧民屈大成在座谈中说：红军从梨园口进祁连山，经大瓷窖口、马莲沟、臭牛泉、芦沟、康隆寺到石窝。石窝会议后，李先念，程世才率部向西，经九个泉、热水泉、分水岭，翻雪山到肃北盐池湾，越崩坤大坂到安西。

5. 肃南武装部铁占新政委（裕固族）根据他以往了解的情况谈：红军在康隆寺打了一仗，在红石窝村肖家沟梁打了一仗，石窝会议后，从石窝山顶向东南方向翻过夹儿沟，到长干河，然后向西顺小长干河，经大岔牧场，翻过

东岔埡豁（大岔顶），进边麻沟，朝野牛沟往西走了。

6. 托勒牧场蒙古族老猎手依黑牙、藏族老牧民俄日在座谈中说：红军从肃南过来，经野牛沟、热水大坂、托来到乌兰大坂口，向南经五个山埡口到苏里，又向西从硫磺矿方向去了新疆。

7. 肃北县盐池湾蒙古族牧民哈青、劳代在座谈中说：红军从托来河到乌兰大坂，翻过五个山，到疏勒河，经扎尔马柯向西走了。

8. 肃北县盐池湾乡原住牧在考克赛一带的蒙古牧民熬斯尔、毛合尔（毛合尔是我们这次考察的向导之一，是为红军带过路的牧民诺尔布藏木的妻弟）在座谈中说：红军从乌兰坂、五个山过来，经黑刺沟到考克赛，当时我13岁，红军在考克赛时吃了我们家的羊，后来由诺尔布藏木带路到了安西的蘑菇台子。

9. 留住肃北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通讯员何延德（我们考察的向导）告诉我们：石窝会议后，左支队在祁连山中向西走了几十天，经过乌兰大坂、扎尔马柯到了肃北的考克赛，由诺尔布藏木领路，从花儿地、硫磺矿，翻过查干布尔嘎斯到野马河，出了大粪岔口，由石包城去了安西。

从以上考察、访问收集到的新材料，我们得知西路军余部在祁连山中的行军路线是：右支队离开石窝山后，一部分到了红湾寺，一部分到了黄番寺，与敌多次遭遇，大部分牺牲或被俘，个别指战员突围后向东经过长途跋涉，历

经艰险，陆续回到延安。左支队离开石窝山后，经过夹儿沟、长干河、小长干河、边麻沟、大岔埡豁、大岔牧场，翻东岔大坂（即大岔顶），过野牛沟、八字墩、热水大坂、托来、乌兰大坂、五个山埡口、苏里、黑刺沟、扎尔马柯、考克赛、花儿地、硫磺矿、查干布尔嘎斯、野马河、大龚岔口出祁连山，到石包城、安西、新疆。

三、考察的结论

经过我们这次实地考察，对祁连山中的地形、地貌、山川、道路、风物、有了具体的感性认识。特别是通过对几个大山系、大河流、大通道的亲自勘察，使我们对红军走过的一些必经之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茫茫祁连山，高耸甘、青两省边界，横贯河西走廊，绵延千里，巍峨挺拔。长年积雪的冰川高入云霄，深沟大河纵横其间，真是山重水复，悬崖绝壁，道路崎岖，行程十分艰难。特别是大部分地段没有人烟，一些地方至今没有正规道路，想雇牲畜雇不到，就是有牲畜，遇到悬崖峭壁，深沟陡坡，也得牵着走。每逢阴天，即使夏季，山脚下雨，山头落雪，条件十分艰苦。考察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这里八九月早晚水都结冰，我们一路还需穿皮大衣。可以想象，红军在数九寒天，大雪封山季节，深入祁连腹地一个半月时间，道路崎岖漫长，人员负伤病残，缺衣少食，还要一边打仗，一边行军，爬冰卧雪，历尽艰辛，饱尝了世

上一切苦难，经受了人间最严峻的考验。正如许多西路军老战士所说的，祁连山中40多天的历程，经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在四川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许多倍，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从我们实地考察的情况看，虽然祁连山地形复杂，道路艰险，但是，毕竟山有山路，水有水路，路是由人走出来的。只要勇往直前，结果总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钢铁的红军英雄汉，抱着为了革命事业不怕千难万险，勇于牺牲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终于冲出绝境，走出祁连，奔赴新疆。

我们沿着这条红军路，经过26天的实地考察，从肃北县石包城乡的大粪岔口入祁连山，到临泽县的梨园口走出祁连山，行程840多公里。沿途召开座谈会6次，走访老红军、知情人14人次，绘制草图七张，拍摄各种照片资料504张，作考察笔记3万余字，基本搞清了红西路军在祁连山中的行军路线，特别是石窝会议后以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同志为领导的左支队的行军路线。

根据我们考察所得的大量资料和祁连腹地山水地形的实际情况，西路军在祁连山中的行军路线，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大体可分三段。第一段是：大部队从临泽县的梨园口撤入祁连山后，沿梨园河向西南方向到肃南县的白银乡，入大肋巴口，沿大肋巴河向南经马场滩、西牛毛山、柏树沟到康隆寺，再沿大草滩河向东南到石窝山顶。石窝会议后，左支队向东南过夹儿尔沟到长干河，沿长干河向西，经

小长干河、长干峡、边麻沟、大岔埡豁、到大岔牧场，然后向西南翻过东岔大坂顶进入青海省野牛沟黑河上游谷地；第二段是：由野牛沟向西北方向，沿八字墩山和黑河前进。到热水大坂（黑河与托来河的分水岭）翻过托来山，从黑河谷地到托来河谷地，向西行经过青海省海北州的托勒牧场，再向西到五个山和乌兰大坂。然后折向西南方向，由五个山埡口（托来河与疏勒河的分水岭），翻过托来南山，从托来河谷地到疏勒河谷地；第三段是：沿疏勒河向西北行，经苏里、尕河、肃北县盐池湾乡境内的考克赛、花儿地、硫磺矿，再沿疏勒河支流查干布尔嘎斯，到达野马河谷地，然后由大雪山西侧向北行，翻过龚岔大坂，从肃北县石包城乡的大龚岔口走出祁连山，到达安西、星星峡，结束悲壮的西征。

以上路线，仅是西路军大部队经过的一些主要地点。部分被敌人打散的部队，还走过一些别的路线，我们没有逐一列出。而且由于红军在祁连山中路径不熟，开始一段方向不明，再加大雪封山，昼夜兼行，有时迷了路，在大山中来回往返，走了不少弯路和重复路线，所以实际行程比我们现在计算的行程不知要长多少，也无法进行估量。

中央苏区首次“八一”纪念活动

方世藻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举行了南昌起义。从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1933年6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次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明令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同年，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举行了首次“八一”建军节纪念活动。

7月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发了《关于“八一”纪念活动的决议》，规定了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二、“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

三、“在区苏土地部与乡苏（维埃）之下，组织红军公田管理委员会，管理红军公田的生产收获，及收获品保管等事宜。在区苏（维埃）土地部与内务部的共同管辖下及在乡苏（维埃）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

决议公布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印发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八一”纪念口号》31条、《“八一”纪念标语》16条。7月2日，又召集了瑞金和中央直属各党部联席会议，商定了宣传鼓动工作的要点。

（一）“最广泛地进行口头宣传，解释‘八一’示威纪念的意义，抓住群众的切身问题和每个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来鼓动群众”；

（二）“一切宣传品——宣言传单、报告大纲、画报等，必须尽量通俗扼要，失去了时间性的旧标语要完全洗刷，并规定红校编辑一个红军战斗历史的小册子。反帝拥苏总同盟编辑一个关于‘八一’的”；

（三）“有准备的来举行晚会，利用新剧活报唱歌游戏等各种方法来吸引广大的群众”。

（四）“在示威大会中，要运用敏捷的宣传鼓动方式，把示威的组织性提到最高度，避免繁琐的长篇演说。”

此后，“八一”宣传鼓动工作便在中央苏区大张旗鼓开展起来。

《红色中华》报在“纪念‘八一’，红军成立万岁”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新的形势与新的任

务》、邓颖超的《战斗的来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纪念》、何长工的《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欧阳钦的《为学习和提高军事技术而斗争》、氓的《南昌暴动的故事》。在该报《赤焰》文艺副刊上刊登了识云的诗《我们的斗争日》，韩进的独幕剧《揭破鬼脸》，津岛的小说《伟大的开始》及歌曲《八一歌》。

洛甫同志在红军学校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八一’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专题演讲，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驻地瑞金各区委开展了“八一”宣传鼓动工作的竞赛，表示要在全县组织宣传鼓动队 325 个；在“八一”活动中每乡平均演新剧开晚会一次；完全洗掉老标语，新刷标语 880 条，木板标语 1500 块；8 月 1 日，全县动员 10 万群众参加武装示威游行。

在进行广泛宣传的同时，中央苏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拥军扩红活动。

少共中央局号召青年红色战士，打大胜仗来纪念“八一”，打大胜仗缴获凡万枝新式武器送给少共国际师的新战士。地方要做 20 万双草鞋，慰劳方面军与少共国际师、工人师。

反帝拥苏总同盟号召盟员和反帝拥苏连加入少共国际师和工人师，以创造 100 万铁的红军（这一指标实际上并不能完成——编者注）。在地方普遍实行帮助红军家属秋收。

工会号召工人用一切力量来帮助工人师的组建，使该师在“八一”正式宣告成立，誓师出发。在各地则应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慰劳红军与工人师的运动，征收5万双草鞋、套鞋送给工人师与前方红军。每个工会会员与会员的家属都要进行慰劳红军的工作。

互济总会也号召会员踊跃参加红军，帮助红军家属和红军公田秋收秋耕，检查区、乡政府执行红军家属优待条例的情况，慰劳红军伤病员，并征集了3万双草鞋送给前方红军。

江西全省均开展了大规模的慰军运动，各县都组成了10至15人的慰问团，分别慰问了红五军团、三军团、二十三军、二十二师等单位。其中兴国、胜利、石城、广昌等地及省级机关共集中了布草鞋、麻草鞋、套鞋计13503双、毛巾1374条、牙粉牙刷621件送给了红军。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红军家属给前方的红军战士还寄去慰问信，勉励他们英勇杀敌，做到“不要想家，不要开小差”。

闽西上杭群众送给红军草鞋4287双、军帽200余顶、干粮袋149个、雨伞212把、斗篷7顶、稻草鞋1206双、毛巾60条及银洋等。

广大红军战士则以英勇杀敌、苦练军事技术的实际行动来庆祝自己的节日。红军之一部于7月2日进攻了驻安远重石之国民党军队张枚新部一旅，将其击溃，缴获手枪、步枪、机枪及钢盔无数。红军学校在7月份军事训练中涌现出了500名百发百中的特等步枪射手、255名手榴弹投

掷 40 米以外的特等投掷能手、446 名特等对空射手。各部队也都开展了攻防演习、拼刺刀、实弹射击、攻破堡垒、水雷爆破等项军事技术训练。

7 月 31 日晚，工农剧社举行了纪念“八一”文艺晚会，毛泽东莅临晚会并于开始前深入浅出地讲演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

8 月 1 日凌晨，在“八一”示威大会总指挥委员会指挥下，中央苏区首次“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

凌晨 4 时，瑞金城郊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火把通明，隆隆的礼炮声拉开了庆祝大会的序幕。首先进行的是阅兵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首长骑着战马，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检阅了全副武装、军容严整的红军行列，并发表训词，向战士们祝贺“八一”建军节。

其次是红军战士进行宣誓。誓词为：

一、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

二、我们是红色军人，要保证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并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模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爱护工农的利益和自己的武器，使他不遭损害和窃夺。

三、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的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卫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武装拥护苏联，

完成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

四、现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拿我们刺刀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拿我们头颅与热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

五、我们为着阶级利益遵守革命纪律，服从上级命令，如若违犯和不忠实，甘受革命纪律制裁，愿听同志们指示。

谨誓

宣誓完毕，进行授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新成立的工人师（中央警卫师）授予军旗，向红军学校授了校旗，向红军中有特别战绩的指挥员授了红星奖章。

当党、团、政府、工会的各代表作了简短激昂的讲话后，庆祝游行队伍依次通过主席台。走在最前面的红军队伍全副武装，高呼“我们愿意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口号，接着是少共国际师、工人、农民、学生的队伍。检阅时间长达1个多小时。

庆祝大会在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红光普照大地之时圆满结束。

同日，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的广场上，破土动工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等革命纪念建筑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项英、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凯丰等领导同志分别为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纪念。

关于张庆孚《我的革命生涯》一文的补正

钱 听 涛

一、《中共党史资料》第40辑第72页“1921年，我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同年考上了上海大学英文系”。按：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师改组而来，张庆孚考上上海大学的时间可能有误，或考上时仍是私立东南高师。

二、第81—82页：“杜国痒（林伯修）担任组织，李春番（柯柏年）担任宣传。”按：“杜国痒”应为“杜国庠”，“李春番”应为“李春蕃”。

三、第82页：“后来，临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竹声叛变。”按：李竹声确曾担任临时中央组织局局长，但他1934年6月叛变前已担任上海中央局（即白区中央局）书记。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二辑

作者 =

页数 = 275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